

目 录

丛书序	(良)
序言 柏拉图的愿望	(良)
第一章 从“愚昧的邪恶”到庄严的职责	(良)
第二章 人类发明的最无意义的职务	(国缘)
第三章 有先见之明的总统	(国缘)
第四章 华盛顿的光环和杰斐逊的阴影	(国缘)
第五章 法国 朋友还是敌人	(国缘)
第六章 战时手段,自由演说,国家权力	(国缘)
第七章 美国的风景画	(国缘)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国缘)
结论	(国缘)
大事记	(国缘)

丛书序

美国的总统政府机构

总统是美国政治秩序的中心角色。这似乎有悖于美国建国者们的初衷。他们对英国糟糕的君主制记忆犹新,故而创立了分权制度。其目的,按照布兰德斯法官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滥用权力”。据此,他们把政府分成了号称地位平等的三个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

但是基于三权分立制度之上的系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惰性和僵持的倾向,如果想要改变体系,那么三个机构之一就必须采取主动。但从结构上来讲,只有行政这一机构能够采取主动。建国者在接受第 39 个北部联邦同盟盟员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的提议时就应该已经感觉到这些了,汉弥尔顿称“行政的能力在定义好政府中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他们因此设想在一个同样有力的合乎宪法义务的系统中有个强有力的总统。“总统权至高无上”这个词曾经在 18 世纪 80 年代出现,用来描述实际执行时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状态。

美国的自治政府系统就这样成了以总统职权为中心的系统,“在系统中至关重要的行动场所”正如伍德鲁·威尔逊所说是总统职权。亨利·亚当斯,美国总统的后代,也是最有才气的美国历史学家,说美国总统“就像在海上行驶的船只的船长。他必须要有舵可掌,有路可行,有目标去追求”。这些在白宫里的男

人（迄今为止都是男人，唉！）在朝他所选择的路线行进时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命运。

传记给美国历史教育提供了一种更简单的方式，使过去更加人性化、更生动、更亲切、更易于接近，也更与我们息息相关。传记提醒我们，总统们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为决定而担忧，要照顾妻儿，也会去玩球，也有短裤只套在一条腿上的时候。事实上，就像爱默生所主张的，“完全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总统不仅给我们带来灵感，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带来警示。他们在给我们提供好的范例的同时也提供给我们坏的例子。最高法院曾宣称，一个国家“没有权利指望总是有明智而仁慈的统治者，他真诚地喜爱宪法的原则。极具权力欲望又痛恨自由、蔑视法律的邪恶的人们也可能会充任曾经由华盛顿和林肯担任的职位”。

白宫里的总统代表的是那些选举他们到白宫里去的选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以及他们品德上的弱点和缺点。因此，我们想知道更多的有关总统们身上的美德和瑕疵是完全自然的，因为我们选择了让他们来统治我们。我们越了解他们，我们就越了解我们自己。法国的政治哲学家约瑟夫·迪麦思特雷曾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理所应当的政府。”

到18世纪为止，曾有100个男人成功地走进了美国总统椭圆形的办公室。（乔治·华盛顿算我们的第1任总统，因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不连贯的任期算两次。）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定期投票中，10位左右的总统总是得票领先。是什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总统？

伟大的总统的思想中拥有或者是被期望拥有理想中的美国

的远景。在他们掌舵的时候,他们的激情是想把这艘共和国之船通过正确的路线驶向他们追求的彼岸。伟大的总统同样与普通大众的需要、渴望和梦想有深深的精神上的联系。威尔逊说:“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这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总统——他对所领导的人民没有一种深深的同情,这是一种洞悉的同情,一种从内心里的洞悉,而不仅仅是知识上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在国家的生命历程中,当某种观念需要澄清的时候,我们所有伟大的总统都是那个时候思想的领导者。”华盛顿成就了联邦的思想,杰斐逊和杰克逊成就了民主的思想,林肯成就了团结和自由的思想,克利夫兰成就了独立与诚实的思想。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很有道德的领导人,他们在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神圣地行使着总统的职权。”

为了要成功,总统不仅要有孜孜以求的彼岸,而且还必须要说服议会和选民,那个彼岸是值得去努力追求的。民主政治根本上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一种在劝告和允诺中进行的冒险。每个总统都站在西奥多·罗斯福那一流的讲坛中心。

在由学者排名的最伟大的总统中间,华盛顿、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直面且克服国家最大危机的领导者。危机给总统们大胆甚至充满想像的行为创造了机会,但它并不能保证总统的伟大。国家分裂的危机没有激励布坎南,经济萧条的危机也没有激励胡佛去发挥创造性的领导。他们在面对危机时的不适应使林肯和小罗斯福第二次有机会证明不同的个体面对历史时的不同。甚至在没有出现最严重的危机时,一些强有力的总统——杰斐逊、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也能够把自己最喜好的东西强加于国家。

总统职位一系列的戏剧性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一连串吸引人的传奇。美国总统的传记组成了一部智慧与愚蠢、高贵与卑鄙、勇气与狡猾、坦诚与欺骗、争吵与一致的编年史，永远地围绕着白宫的骚乱装饰着美国民主的心脏。

美国总统系列丛书的目的是用书卷来全方位地展现我们国家主要的行政官员。这些书卷适合繁忙的读者，因为它简洁紧凑；适合学生阅读，因为它语言明晰；便于学者研究，因为它资料权威。每一卷都提供了一个人物和他的事业的精华。我希望这套书能给读者增加一些对总统职位的缺陷和潜力的理解，以及对于公民责任的认识。杜鲁门有名的叹息——“责无旁贷”——只说了故事的一半。公民不能逃避最终的责任，因为责任是在投票亭中，而不是在总统的位置上。

——亚瑟·施莱辛格，前副总统

序言 柏拉图的愿望

1789年，卸任美国总统多年的托马斯·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未来“天生的贵族”都是直接源于民主政治，而非继承；它基于品德和资质，而非出身与财富。但亚当斯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按照出身，而是按照社会习俗这一标准来划分，那么，天生的和后天的贵族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教育、财富、健康、美丽、身材、出身、婚姻、优雅的姿势与姿态、肤色、容貌，这些因素既包括一个人的先天资质，也包括其后天的才能与学识。”

时至今日，所谓“贵族的”属性却为运动健将、战斗英雄、圣洁的教皇、富有的亿万富翁、神气的时装模特、歌剧表演者、摇滚明星和艺术荣誉获得者们所拥有。正如亚当斯警告杰斐逊的那样：即使在民主的体制下，也会产生大批的“能够权威地发布命令、引起他人关注的”所谓的“贵族”。这样的认识已经为年轻人、富有者或者美貌者所接受，我们应当记住亚当斯总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年迈的、臃肿肥胖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现在巴黎时，人们仍然把他看作名人，既因为他的性感，也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名望的吸引力，当代的许多艺术家追求名望，即使这些勉强被承认的名望仅仅持续几分钟。那么亚当斯总统呢，他自己是否曾经享受过名望带来的喜悦？是否也曾被“名望”所驱使？

许多总统在离职时，身后是名望与辉煌，另一些总统身后则是耻辱与羞愧。当杰斐逊当众宣誓就职的时候，在早上 9 点钟，亚当斯总统沉默而平淡地离开。他离开时如同他到来时一样。也许他是至今为止曾经入主白宫的最具智慧的总统，但是，他算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吗？

困难的时代造就好的总统，更加艰难的时代则会造就伟大的总统。一个真正的领导人，他会在困境中茁壮成长，他天生就是谦虚谨慎之人，不管什么困难来挑战他，都只会增强他的力量。所以，在没有什么严重经济衰退的平常日子，总统很少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当美国人民发现他们的国家将要面临一场战争（如 1793 年同法国的战争，1808 年与墨西哥的战争，1854 年与朝鲜的战争，1859 年与越南的战争）的时候，议会却在讨论是否应该公开宣战。这只会使美国人民更加困惑，而不是信服。令人费解的是，提高总统个人威望的最佳时刻却是美国受到攻击的危险时刻（如 1861 年的福特·苏梅尔事件，1866 年的缅因号事件，1898 年的露西塔尼亚事件，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1973 年的世界贸易中心事件）。如果缺少这些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总统任期就像是一场没有主角与剧本的表演，观众观看的就像一场没有故事情节与中心的戏剧，既缺乏紧张、冲突，也没有结局。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他任职期间（1796—1800 年）正是年轻的美国的成长时期。当时，光荣的独立战争已经取得胜利，“英明”的宪法体制早已确立，这就是亚当斯任职时面临的情形。18 世纪 80 年代晚期，美国的领导者需要的是管理政府，而不再是创造历史了。所以亚当斯短暂的 4 年总统任期，如同一个主角受到环境限制的案例，与华盛顿和杰斐逊相比就显得像是一个可怜多余的插入者一样。乔治·华盛顿与托马斯·杰

斐逊,开创了“弗吉尼亚朝代”(这在詹姆斯·麦迪逊与詹姆斯·门罗身上延续了下去),而亚当斯正是在华盛顿与杰斐逊两个耀眼的美国总统之间任职,他也是第一个只有一届任期的总统。和父亲一样,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只有一届任期(无连任资格)。与杰斐逊同样是南方人的安德鲁·杰克逊,在竞选中击败了约翰·昆西,并连任两届总统(无连任资格)。

19世纪50年代,在白宫宴请西半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约翰·昆西·亚当斯这样说道:“自从杰斐逊卸任总统独自就餐以来,美国历史上就没有过如此众多杰出人物云集的时刻了。”亚当斯总统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亚当斯曾怒气冲冲地对本杰明·拉什说:“我每周一次或者两次宴请一大群人,而杰斐逊每天都宴请一打人,我每周举行一次招待会,所以我的时间才不会浪费在无聊的访谈上。而对于杰斐逊来说,他整个四年任期就是一个招待会。”

美国的政治历史以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不和为起点,而这种摩擦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逐渐形成了。亚当斯是联邦党人,也是起草宪法的理论家之一。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存在的不是信任,而是猜忌。正如亚当斯指出的,促使政治秩序诞生的冲动和“永不停止的忌妒”,都是自由的侍女。尽管在早期政治生涯时期,他们处在相互猜疑和猜忌中,但是在去世之前,亚当斯与杰斐逊却和解了,他们犹如亲兄弟那样互相拥抱。

亚当斯不信任杰斐逊,把他看成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把时间都浪费在无聊的活动和议论上的贵族。同样的,杰斐逊也怀疑亚当斯企图在美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尽管杰斐逊因为是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而备受谴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弗吉尼亚人,也因为他的精英主义者的教育观念使他“一跃从庸俗跻身

于天才精英之列”。他的“追求快乐”的思想体系成为全国人民的信条，也使他免遭“贵族统治”的非议。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在历史上，闲适与快乐向来是属于有闲阶级和贵族社会的权利，他们没有繁重工作的束缚，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市民事务中去。”而与亚当斯同时代的法国人本杰明·康斯坦特说：“正如罗马人为他们那时的奴隶制辩护一样，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继承的东西辩护。”而杰斐逊几乎不须去工作挣钱购买奴隶，他只需要简简单单地从他岳父那里继承。与少数勇敢的南方人包括华盛顿不同，杰斐逊不仅不释放奴隶，而且还与其他南方人一样，把奴隶移交给债权人或者一代又一代、一家又一家地把奴隶作为私有财产传下来。就是这么一个维护继承权的贵族，作为奴隶主，他，杰斐逊，怎么能够逃脱指责亚当斯总统是“君主立宪派”的处罚呢？这样的指责应该是美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诬蔑。

那么亚当斯受人攻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如 1794 年的说法以及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在 1841 年说的那样（这样的想法在今日已经被普通人接受）：民主政体不能也不应该能彻底清除掉多样化以及智慧、美丽、力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事物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法兰西革命力求做到的。令人奇怪的是，猛烈抨击并力求降低这种单调乏味与千篇一律的杰斐逊，却完全误解了一样东西——这也正是亚当斯竭力解释的东西——沉闷的“千篇一律”不是继承式的贵族政体想要的东西，它只是虚假的、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可避免是以习俗中的某些想法为基础的）。

亚当斯的政敌同意汤姆·潘恩的说法：社会是以人们的需要为基础的，而政府则以人们的邪恶为基础。亚当斯的看法却与

他们相反,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的专断,使得一定的政府规则显得非常必要。先进发达的社会,带给我们的是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称为“重大意义与宏大场景的东西”,亚当斯把它称为“符号的语言”。在社会中,生活大部分只是一种礼节与仪式,是虚假的而非真实的。我们看到的比能被知晓的重要得多,写出的比能被证明的重要得多。社会如同一个剧院,政治的表演盘旋于其中,而贵族就是人们瞩目之所在。社会而不是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是激情、骄傲和虚伪的竞技场,在那里愚蠢的人们需要别人的赞誉。亚当斯所描述的那种罗马人虚荣的生活方式,正如斯科特·菲兹杰罗这个读过佩特罗尼乌斯著作的人所描述的那种奢侈的富人所过的生活,也正如托斯丹·凡勃伦所描述的有闲阶级所过的那种如影相随却又毫无用处的“虚幻生活”。亚当斯的警告体现了他的感觉的深刻性,他认为从任何宗教的或实验的观点出发,将无法判断社会的发展:

据说,人死万事空,很可能如此。但是这是否也就意味着财富、权力、自由等一切尘世的东西都会随之消失?高耸入云的宝塔、金碧辉煌的宫殿、神圣的教堂及伟大的地球本身,终究是毫无根基的幻觉?有人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传说,充满了美好与愤怒,却又毫无意义。那么,我们能据此说名声、自由、财富和生命都可以被蔑视与忽略吗?就因为法律与政府——这些曾经统治一切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毫无意义,就可以被忽略掉吗?”

有先见之明的亚当斯总统早就预料到:源于社会本身的在民主共和政体中的所有争论,经常向政府领域、法律领域,以及

亚当斯总统为之辩护过的宪法领域转移。社会,为了公平的判决,必须超越它自身,除非它要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公平,这也正是亚当斯总统与一些联邦主义者所警告世人的。

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不仅肯尼迪,就是杰克逊、林肯、威尔逊这些大总统也总是提及他的名字,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亦援引杰斐逊的话为自己论证,即使在那些自称是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的人反对他的新政时也是如此。美国的许多公立高中都会以杰斐逊、华盛顿来命名。而亚当斯,在美国的建筑或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上则鲜有其名(马萨诸塞州除外)。在历史教科书上,他只是被无关紧要地提了一下。但是,近几年来,大卫·麦卡洛的《约翰·亚当斯》与约瑟夫·坎利夫的一本颇有价值的早期研究著作《热情的哲人》,又使人们重新记起亚当斯总统。美国国会还考虑在首都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亚当斯父子,他们分别是美国第二任与第六任总统。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民又重新对这个被遗忘许久的总统发生了兴趣。亚当斯总统是一个可爱但脾气乖戾的人,他逝世于1826年9月21日,终年85岁。据说,当死神快要降临时他视若无睹,只是竭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杰斐逊还活着!”(杰斐逊于同一天去世。)

约翰·亚当斯比那些宪法的制订者的资格要老得多,他参与了从1773年到1783年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早在美国脱离英国、宣布独立之前,亚当斯就为此作过论证。而对于亚当斯总统来说,人们只把他看作是美国政治史上一位曾经的总统而已。事实上,他在知识史与社会哲学方面应该拥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他的许多关于政府的理论,我们今天还在实践着,虽然我们可能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同样,他关于自由与权力的理论也由于政府的原因而长存下来,即使他作为总统并未在激烈的政治竞选中获胜。

亚当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客,这一点在总统中非常罕见,虽然《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都很伟大,也都有卓越的成绩,他们甚至也提及过需要加强“行政权的力量”,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总统职位会成为美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早在亚当斯时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就倾向于人民的“普遍意志”与国会的权力并重之类的提法,而亚当斯则打破了二者并重的局面,转而更加重视行政的权力。他指出,人民与代表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也会有不和谐的声音。“人民”一词就像是他的代表机构一样,仅仅存在于思想领域,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事物,它仅是政客吸引听众的说辞。

联邦党人华盛顿与亚当斯,既反对法兰西的雅各宾党人,也反对南方的共和党人。亚当斯警告人们说,在民主政体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就像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一样暴虐、残忍,也像是一个专断的国王压制公众意见一样武断专横。“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口号给人们制造了假象:以前的强制统治已经消失了,就像它也能够被相应地民主化一样,而在现实中,它却又以奇怪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是大多数人的慎重考虑,而是少数人的意志。所以,必须要有监督,否则少数的特权阶级就会力求控制国家,而民主的大多数人只有大声疾呼民主了。只有第三种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才能解决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并求得平衡。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也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只不过他是以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富有、出身高贵而有能力”的阶层,亚当斯则以怀疑的态度对

待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

当亚当斯的反对者告诉他：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因为人民对自由的热爱是如此强烈，亚当斯则回答说，狮子也热爱它们的自由，它们也不想被束缚。他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言：“权力源于意志，意志源于欲望，狼一般的普遍欲望。”所以，只有政府能够控制“权力被滥用”。

但是，亚当斯相信的却是杰斐逊所蔑视的。杰斐逊宣称：“统治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相信应该把人民主权还给人民，让他们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模式也许会让美国人民平安无事，但是也会带给他们一定的问题：有多少神佑，就有多少诅咒。这样，美国人民就会面临人民主权与自然权利之间的矛盾，面临多数人的意志与那些向往自由和自我决定的有能力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美国的缔造者们坚持人民无权犯错，而杰斐逊则认为有权力的人民拥有充分的理智。关于自由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民主崇拜被用来为奴隶制度向西部领土的推移作辩护，排除外来移民进入民主王国也以此为借口。亚当斯敏锐地觉察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也看到了不可转让的权力与受人民意见约束所带来的威胁之间的紧张气氛。然而，美国人民还是让亚当斯离开了总统职位，并打算继续忍受将要在民主战争中爆炸的“一颗理论定时炸弹”的威胁。

在评价亚当斯和杰斐逊时，史学家们似乎很不乐意承认亚当斯比杰斐逊地位更高。但是，当我们来研究他们对待自由与命运的不同态度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抑或是发生奴隶起义的海地，每个人都承认，亚当斯才是出色的教育家。富有革命精神的法国人认为他们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充满了革新的精神，包括在所谓的“断头台革命”中。杰斐逊呼吁革命

的到来,因为革命意味着国王和王后被处死刑与血腥恐怖。革命还以理性、美德与人民的名义进行着。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被杀死在断头台上,是至今为止所有死刑中最冷酷最卑下的死法。它并不比砍下卷心菜似的脑袋或者喝下一杯水更有意义,甚至更无聊。”但这样的刑罚并不使杰斐逊感到难过,即使有,也仅仅是一点点而已。亚当斯在 1798 年写道:“全人类的自由都依赖于惨烈的竞争,曾经有过不流一滴无辜的血而获得的荣誉或桂冠吗?亚当斯反对杰斐逊与汤姆·潘恩的“为革命积极而战”,反对他们的“只有牺牲,自由才会产生”的言论,他力求从恰当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情。“我们的革命是要反对革新”,他强调说。亚当斯还力求让美国人民记起“1776 年精神”的本质:是要保持旧的自由传统,而不是宣传新的不相关的东西。

亚当斯察觉到了他的对手们力图否认的事情,这也是林肯总统所要面对的事情:共和形式的政府并不能保证人们会尊重他人的权利。杰斐逊与潘恩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人民有权力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亚当斯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立宪主义者,他坚持强调“法律的目的不是要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防止他们去干可能想干的事情”。

杰斐逊与亚当斯的双重性矛盾在 1858 年的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争论中达到高潮。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求助于所谓人民主权的原则宣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人民有权力投票支持或反对他们所面临的奴隶制度。而林肯则回应说,正是所谓的人民主权,破坏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并且使得它“缺乏源泉与几乎没有个人权利”,从而使它“仅仅被当作垃圾”和“旧的废弃材料”。即使林肯总统曾为亚当斯使得我们再也没有矛盾冲突这一功绩而辩护,但是,他在 1846 年发表演说时仍然倾

向于杰斐逊，虽然正是这位总统使得我们处在矛盾的境地。

亚当斯把政治看作是两头驾车的戏剧化冲突：一个想要统治别人，而另一个则希望脱离其统治。正如亚当斯警告人们的那样，美国人民对政府的嫌恶会削弱美国政府，使得它没有力量去阻止美国“虚伪的贵族统治”的肆意横行，因此使民主制所珍爱的人民任由那些贵族精英和他们的权力意志摆布。

亚当斯觉察到政府实际上是人性及其冲突的动力的反映，但他的对手却假设说，政府力量越强大，人民的民主就越小。美国的历史证明了结果与先前的假设恰恰相反，民主的参与会使得人们寄希望于民主，并希望民主能够帮助人们去做那些他们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按照林肯的方式推理的）。亚当斯的颇有先见之明的现代主义思想，源自他敏锐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仅仅有自由的存在绝不会使世界摆脱统治的奴役。早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亚当斯就预见到，没有相互制约的力量构成的民主制议会，对于专制统治来说只会起一时的作用。“既融合交错在一起，又分成两个平等的部分，这样，贵族的专制统治才会永无藏身之地。”

亚当斯总统希望通过政府的结构调整来控制某一阶级的优势地位，他还认为国家是司法公平的武器。我们应该会记得，在杰斐逊负责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国家不扮演任何角色。《独立宣言》使得美国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赋予了美国主权，但却难以实际运行。没有亚当斯拥护的政治机构——强大的行政权、国家的司法权和军队，《独立宣言》也不过是一张碎纸片。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行动，从争取劳动的权利到妇女和少数种族的解放斗争，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实现付诸行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拥护的社会人人平等理念却恰恰要在他反对的政

府机构中才能实现。

没有政府的权威,那么人类的权利就不能实现,更谈不上受到保护与实现永恒了。亚当斯认为政府的功能不仅在于保护自由,而且在于实践权威。亚当斯的手们反对政府,且都同意潘恩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础不过是由罪恶而产生的虚假羞愧感而已。他们现在仍然蔑视政府的权威,一如过去一样,他们认为政府不过是失落的纯真的一种象征,社会却是和谐与希望的竞技场。对于亚当斯来说,政府与社会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开来,因为政府设立的机构本来就是用来处理社会冲动产生的问题的。不过,政府本身以及政府精确的结构与功能却使得亚当斯困惑,相对于美国人民的期望来说,历史仿佛不过是他们嘲弄的对象罢了。共和主义,以及想努力生存的不带有君主制的共和主义政治体制的故事,不过显示了他们那种体制的失败,显示了那种体制的衰落与衰退,而非其成功与长久。旧有的共和政府得意洋洋地出现,却又灰溜溜地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它的衰落伴随着泪水飞溅与愤怒的豪情,却并不彰示着什么。亚当斯痛心提醒美国人民,不管是古代社会的共和制,还是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制度,不过是在历史的海洋上溅起的泡沫,怒吼着进而破裂,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约翰·亚当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只需想像一下这样的画面,亚当斯关于古典共和主义的演讲让他仿佛穿着一件宽大的罗马袍子,作为第一个预言人类学唯实论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大多是因为原始的竞争形成的,而不是由于古典的和谐形成的;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但对于政治却无法忍受,并且轻视各派政党;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联合者,却一度把国家推向分裂的边缘;当美国必须在法国与英国之战中选择支

持哪一国时，这个颇有耐心、力主中立的外交家却在两极世界中摇摆不定。作为一位犬儒学派的学者，冷静地批准通过《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预示着“恐怖统治的开始”。这个诚实正直的典范，对待《圣经》与对待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一样的忠诚。他是一个行为怪异的政府首脑，似乎马上就会变得暴躁、冲动与慷慨激昂。他悄悄离开城市回到在昆西的家，以至于他的内阁成员怀疑他是否还要回来。也许我们从约翰·亚当斯身上所能得出的唯一确定的结论就是：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系列关于亚当斯总统的研究，引起了关于民主制度下领导权与公民权问题的争议。如果美国人民已经明确地知道他们的自我治理的新试验将走向何方，那么相信亚当斯总统会很高兴地领导美国人民实现这一目的。年轻的美国会接受新英格兰的高人一等的思想吗？会激起全国人民的责任感吗？它是否会勉强接受南方诸州的安逸的生活方式？是否会寻求舒适与快乐的生活？在新英格兰出生的亚当斯可能会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诙谐，并且喜欢痛饮马德拉的白葡萄酒，但是他不会是一个轻易受舒适安逸所诱惑的人。纵观他的一生，他总感到自己的声望不稳固，他一直在追求被承认和杰出。在亚当斯看来，得到他人的关注、羡慕和尊敬的热情，更多的源于人类的本性。可是，令人惋惜的是，美国人很少注意亚当斯，尽管他是一位最接近于实现柏拉图的愿望——让哲学家来管理国家——的总统。

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坚持认为，共和国必须要由具有哲学智慧之人来统治，当然，也有可能，国家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也会发展得很好。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坚信：理智可以驯服激情，这样，公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领导人也会去实现

这些事情。然而,亚当斯反对精英的“亚里士多德教条”,这些教条赋予聚集在希腊城邦里的有闲阶级排除其他人享受公民权利的特权。亚当斯借助于两种拉丁文译本阅读,并对比了许多关于希腊的著名文章,他勇敢地承担起了阅读柏拉图全部著作的艰巨任务。他很欣赏柏拉图关于政府形式与人民热情之间关系的论断。亚当斯评论说,希腊的历史就像女人的闺房——每面墙上都有高大镜子的八边形房间,不管人们转向何方,都能看到他的变形的身体,这样的视角会帮助人们恢复他的心性。后来,亚当斯嘲弄杰斐逊说,他从希腊思想家那里学到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深奥的真理:“打喷嚏是治疗打嗝的良方。”读完柏拉图著作后,亚当斯在他的内阁会议上随时可以讲出一大串笑话来醒神。

虽然亚当斯写了大量的文章来维护美国的宪法,以回击欧洲的评论家们,在美国历史上,却没有亚当斯作为一位智者的立足之地。联邦主义者写道,“在一个充满哲学智慧的国家,依靠人民来共同遵守宪法与合法的条例,在这种情况下,由开明的领导人谆谆教诲,人民会养成敬畏法律的习惯。但是一个充满哲人的国度,如同柏拉图期盼出现哲学王一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国人民不能寄希望于出现最明智最适合的人来领导国家,使利益冲突朝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总是开明的政治家在掌舵。”亚当斯赞同这一观点。1792年,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坚信我的观点,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道德、智慧、兴趣,能够领导国家与政党去反对他们的骄傲、愤恨、复仇、贪婪与野心勃勃等。除了暴力、权力与意志力,没有什么可以抑制它们。”

将亚当斯的哲学沉思与政治抱负相结合,我们能从中知道

什么呢？是一个治疗沮丧的良方。当亚当斯怀疑人民是否有能力进行理智的思考与得体的行动时，他是能够做到这些的。他疑惑不解，为什么在一个未开化的民主国家中他不能获得赏识呢？而相比之下，杰斐逊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知道的，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亚当斯赞成联邦主义者的意见，柏拉图的愿望在美国不可能实现，美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哲学家智慧的国家”。杰斐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说，这些“庄稼汉”比哲学家与教授联合起来还要聪明智慧，他相信遵循一定法则的社会的主人会引导年轻的共和国前进，美国人民是“上帝的选民”。作为总统，亚当斯不得不征求这些“上帝的选民”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交税，以使美国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受伤害。因此，亚当斯没有获得任何连任的机会。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的曾孙子，曾经讽刺说，美国总统的演变史，从乔治·华盛顿到尤里塞斯·格兰特，证明了达尔文的人类进化理论是错误的。1898年7月4日，约翰·亚当斯总统任职最后一天的百年纪念日，亨利·亚当斯在他华盛顿的家中，给伊丽莎白·卡梅伦写信说道：“我看着白宫，同时想着我的老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会说些什么。从他把我无辜的祖先赶出白宫到午夜的街头时算起，到现在已经有175年了。”

亚当斯开创的法律传统，是一个家族向美国历史的伟大献礼，但是美国历史并没有接受亚当斯。在亚当斯离职175年之后，他的朋友本杰明·拉什向他保证说，即使是他的对手也没有怀疑过他的“正直”，并且相信他是“一个忠诚的人”。这并没有使亚当斯感到释怀。他提醒拉什说，他曾经因为有嫌疑试图让他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并试图使美国人民接受世袭的君主

制而受到指控。“美国人相信华盛顿与富兰克林是出于纯粹的与公正的爱国心做事；而我所做的一切却被归结为邪恶的动机。”总而言之，亚当斯对自己太苛刻了。人们从没有把亚当斯看作是能做大事的，或是改变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但那些认识亚当斯总统的人，包括他的对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而正直的人。

亚当斯总统身材矮小，仅仅有 缘英尺 苑英寸高，有着肥胖与粗壮的肩膀，带着蜷曲在耳朵四周的邈邈的假发，头大而圆，一双喜欢凝视的眼睛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从愤怒的注视到高兴的闪烁。亚当斯身上体现着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承诺和自相矛盾的特征。他有时会爆发出那种男性的英勇好战，有时也会呈现出女性的阴柔敏感。他认为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他自己却又选择了一种颇具个人色彩的道路。他希望能讨得别人的欢心，却又拒绝做一个宫廷上的小丑。他力求给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却又拥有平凡的体形特征：几乎撑不起他庞大身躯的粗短的腿；他个子矮小，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上楼梯时他的佩剑不时碰到大厦的台阶；在他晚年不戴假发时，他秃秃的头顶周围有着浓密的头发；一张疲惫的脸，小而古板的嘴巴上满是赘肉。上天赋予了亚当斯这样的外貌，所以他渴望好名声却又鄙视公众意见，他绝对的忠诚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却无法赢得公众的喜爱。他以从事社会活动为乐，却又讨厌政治活动。他相信政治机构的效能，却又否定政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他能清楚阐述以怀疑、疑惑与不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却又是一位坐在办公室的轻信的总统——有理由相信，他对于他的内阁干的那些反对他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早期的美国政治就交织着三股竞争性力量的斗争，其中杰

斐逊指望大多数人，汉弥尔顿注重少数人，亚当斯则坚持只有强大的行政权才能够调和民主政治与富有的贵族之间的矛盾。虽然亚当斯既担心民主体制的混乱，也担心贵族政治的自大傲慢，然而后者的政治主张却构成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内容。当时的亚当斯相信现代社会理论家知晓的事实：大多数人赋予富有者一定的权威，又竭力仿效富人的生活与时尚。亚当斯既怀疑杰斐逊的民主政体，也怀疑汉弥尔顿的富豪统治，他指望着强大的行政权力，因为只有它才能保证政府既不为大多数人也不为少数人利用，而只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所以当他当选总统后，亚当斯认为，如果能够体现出他行动的公平性、公正性与独立性，他就能赢得他应得的尊敬与信任。

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亚当斯描绘为一个“总是很诚实，有时很聪明的人，但是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他又总是完全没有常识”。亚当斯与其他的所谓道德家一样，相信一些缺乏常识的想法：有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又不能违反；有些原则是难以坚持的，却又不能妥协。然而就是他——富兰克林，为了调和殖民地与母国的冲突，力主同英国妥协。当革命来临时，亚当斯以坚定的、坚决的、自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鼓励那些殖民地的战士，使他们有勇气面对不可能的事情，在年轻的共和国斗争以求生存的最艰苦的日子里也从不屈服与投降。

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正是美国历史风云变幻的时期，也可能比其他的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充满了道德与权力、正直与成功、信任与妥协的矛盾。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每一个政党都要采取承诺一定计划的对策，但是自从亚当斯总统以后，每个总统都会发现他们很难坚定不移地遵循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亚当斯本来希望总统职位能实现“独立”，但政府已经与选民和金钱形

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美国人民希望有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想干什么或不想干什么)行事的政府,他们宁愿有一个没有任何“理论”的政府。

杰斐逊也非常看重“独立”与自我信赖的个人主义,他对此的关注并不比亚当斯少。杰斐逊警告人们说:“依赖会产生阿谀奉承与唯利是图,会使道德的萌芽窒息,并且会为那些野心家提供合适的工具。”~~1796~~1796年,杰斐逊在大选中击败了亚当斯,他宣称,是他把美国人民从贵族统治与君主体制中拯救出来。他没有意识到,他对政党政治的完全信赖也意味着他的理念的失败。一个任性的消费者依赖于债权人,一个农场依赖于奴隶的劳动,杰斐逊也成为一政客,依赖于他的政党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政治活动现在完全控制了政府,政府更多地关注着下一次的选举,而不是公民的品德与公众的利益。美国历史总有一天会发现,亚当斯学到的与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让我们记住的东西如出一辙:是人民的利益观念,而非总统的道德观念,决定着美国人民是支持还是反对抑或远离政府。政治会导致依赖,并窒息道德的火花,使得美国人民很少关心政治及其领导人。读过著名的小说家萨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后,亚当斯说,民主制度下人们的关系如同一个流氓的残酷的激情:逼迫着他的未婚妻去自杀。“民主是一个浪子,而人民如同克莱丽莎,民主这个狡猾的罪犯追逐着如人民一样天真的少女,直到她毁灭和死亡。”即使是源于民主制度本身的诱惑,产生的也只会是背叛,而人民需要的却是保护。

亚当斯是位长寿的总统,这让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杰斐逊追求幸福和快乐的享乐主义观念,会取代他对政府及其责任的英勇呼吁。“人类的第一个欲望是饮食,第二个欲望是女人”,亚当

斯承认“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什么欲望比对名望的要求更普遍”，他认识到在民主政治中，名望终究归于成功者，而不是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在美国文化中，判断成功的唯一标准——“恶毒女神的成功标准”，如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那样，评价专业的政治活动与一场专业足球的标准是一样的。成功不是所有的事情，而是唯一的事情。亚当斯远不是一个成功者，但是美国人民会因失去他而感到懊悔，直到我们重新找回因为对罪恶的恐惧和对真理的热受而产生的良心政治。

第一章 从“愚昧的邪恶”到庄严的职责

父亲与儿子

1792年,亚当斯的先辈亨利·亚当斯和妻子伊里斯迁至美国。约翰·亚当斯于 1792年 12月 18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是亨利·亚当斯的第 10代子孙。亨利有骑士血统,他勤快、简朴、笃信宗教,在迁至布伦特里 15年后就去世了,留下了 1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套两居的房子、一个有一头牛和一头猪的 100英亩的农场,还有一个拥有许多珍贵书籍的书房。亨利的一个儿子——约瑟夫——走了父亲的老路子,娶了阿比盖尔·巴克斯特,他们也至少有 10个孩子。约瑟夫的儿子小约瑟夫·亚当斯,娶汉娜·巴斯为妻。汉娜·巴斯是约翰·艾尔登与普里希拉·艾尔登的曾孙女,艾尔登夫妇拥有普利茅斯的大片领土与五月花号船。小约瑟夫·亚当斯的儿子约翰·亚当斯是家族中第一个取名叫约翰·亚当斯的人,娶了苏珊娜·博尔斯顿,她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世代从医家庭的女儿。约翰·亚当斯总统就是他们的孩子,在 10个儿子中排行老大。

亚当斯在一个简朴甚至可以说是贫困的家庭中长大。在农场中的草地上坐落着一栋两层夹板的房子,房中有一个壁炉,为 1个小房间供暖。倾斜的屋顶使得二楼上的居室狭小、低矮,当

孩子们上床睡觉时，必须弯腰才能进入。亚当斯一家与一些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居住在一起，他们一家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没有奴隶和仆人。

虽然物质生活不舒适，天气又总是阴暗忧郁得让人难以忍受，但亚当斯一家人却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可以看书，交流思想，或者进行鼓舞人心的交谈。一种神学的气氛对于那些新英格兰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他们讨论莫测高深的上帝的意图与邪恶的含义时，又总是担心他们灵魂的归宿问题。老亚当斯经常带着小亚当斯去高大而又空旷的教堂，去听那些让人们信仰上帝的教义，这些教义还让人们到城镇的集会中去，听取公众的讨论，进而去信仰上帝的理性。他希望自己的长子将来能进入大学进修并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小亚当斯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从没有想过要为他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博学的智者而努力。他喜欢户外活动，他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个池塘与周边的每一片森林。他为他强壮的身体而自豪，虽然他个子又矮又小。在长大成人后，他依旧喜欢打猎与旅游，依旧对这些活动充满着激情。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的农场主，但却希望儿子能学习拉丁文，以为进入哈佛大学作准备。当小亚当斯向他的父亲说他讨厌拉丁文，并为此提出抗议时，父亲回答说：“好吧，约翰，既然拉丁文不适合你，你就去试试耕地吧，或许那适合你，正巧我的草地需要耕种，你就去犁地吧，不用学拉丁文了。”小亚当斯欣喜地答应了，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转变”。可是经过了一天半令人腰酸背痛的劳动之后，他才意识到还是学习拉丁文比较好一些。但倔强的小亚当斯认为向父亲承认这样的结果，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终于，夜晚再一次来临了，亚当斯后来写道：“辛苦终于战胜了骄傲，我告诉父亲，在经

历了最为艰苦的劳动之后,如果他同意,我宁愿去学习拉丁文。他很高兴。我现在能获得如此的成就,要归功于那两天的辛苦劳作。”

小亚当斯 15岁进入哈佛大学。人们依然记得,新教改革之后的教条,曾经在大学的大学中广泛传播过,故而,对于那些新英格兰清教的创立者来说,思想就是一切。在哈佛的教育体制下,亚当斯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逻辑学、修辞学与物理学,在二年级时他学习了道德哲学、形而上学。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努力学习,哈佛大学中一些资质很好的学生沉迷于喝酒、赌博、放纵、嫖妓,更有甚者思想堕落,成了无宗教并随意亵渎上帝的人(他们应该为此受到谴责)。相比之下,亚当斯的大学生活则严谨得多。他的缺乏热情也许恰恰反映了学习的本质:与其让学生去机械地抄记课本,不如让学生批判地分析课本。亚当斯以后的大学生活中,从西方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摘取大段的文章,以使自己的分析更透彻,同时他也发现了这个佛罗伦萨的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冲突所在。

1725年,亚当斯从哈佛大学毕业。由于不确定他要从事什么职业,亚当斯暂时先回到了布伦特里。亚当斯发现父亲一直要求他所从事的牧师职业实在乏味甚至令人窒息。那些围绕着“呆板的约翰·卡尔文”的教条的争论充满了他的头脑,他总是忍不住想起受他人攻击、自由放纵的神学家乔纳森·约拿丹,想起那些离经叛道的神学者,所以他决定先去乌斯特的一个中学当教师。在一个特殊的日子,亚当斯骑着镇上送给他的一匹马,从布伦特里(后改名叫昆西)开始了 160 英里的旅程。

有机会去教育年轻人使得亚当斯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人的才智。班里的学生谁会成为“英

雄”、“流氓”，或者“哲学家”和“寄人篱下的落魄者”呢？学生们厌恶学习，并经常做白日梦，这使得校长很头疼，亚当斯的思绪也经常会在漫游到窗外去。学校的教师待遇很差，亚当斯只能由家人提供膳宿。不过，也正是亚当斯在乌斯特当教师的几年，使得他形成记日记的习惯。世界在亚当斯面前又展开了新的一页，充满了疑惑与自我审视，也充满了对上帝、宇宙本性之类知识的好奇与渴求，充斥着对他自己品质名声的满足欲。“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却又永远找不到解决之法。”亚当斯痛苦地写道，“但我终究会使头脑中那些卑贱与虚伪的东西消失殆尽，克服掉我先天的自满与自负，不去期望能得到我应得的同伴们的归附与顺从……克服没有任何价值的激情，对待所有的人如同我也期待的一样。”但是，亚当斯仍处于苦恼之中，因为他的头脑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交杂，没有目标，所以他的精神生活总是起伏不定，如同失去了方向。他没办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也导致了他的学生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拖沓延误呢？今天胃出了毛病，身体不舒服，思绪有些混乱、起伏不定。今天已经不能学习了，明天吧。明天来临了，我身体感觉很好，头脑清晰，但不巧，朋友来了，又没法学习了，后天吧，一定要认真学。新的一天到来了，我很愿意去学习，但是又没有柴火了，没法生火。所以，我们一直缺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必需的。

亚当斯早期教学的经历使他相信，教育年轻人应采用积极的方式和可预期的奖励而非惩处和威吓来激发他们。当他的生命历程走到 30 岁时，亚当斯仍然不能确定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这时的亚当斯开始全神贯注地研究动机问题了。虽然在他后来的社会哲学中,亚当斯强调的是人们对于外部承认的需求,但早期时他更强调的却是内心信任的力量。1829年,亚当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大部分的剧院中,观众的掌声对于演员内心对自己的承认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而在生活的舞台上,当人们的良心为自己喝彩时,却只会招来人们的唏嘘之声。”当亚当斯沉湎于安逸之中,沉湎于对于一个清教徒来说最大的罪恶时,他的良心却几乎没有感到任何不安。“我感到很无趣,很消极,所以我聚集的所有决心和精神都不能把我从愚昧的邪恶中唤醒。”亚当斯知道自己必须要离开那所中学,他考虑了适合自己将来工作的三种选择:神学、医药学与法律。最后,亚当斯终于拒绝了家人与朋友的建议,选择学习法律——一个毁誉参半的职业。

从新英格兰迁来的居民,起初并没有从事法律行业的人。但是当那些共和与博爱的观念很快消退后,人们之间的冲突与不信任占据了主导,使得处理讼案与诉讼的律师行业应运而生。公众及个人名声问题促使了法律生活的形成。确实,殖民地与祖国之间的矛盾在本质上也促进了法律的革命。亚当斯作为一名律师,会为美国人民的诉讼辩护,会为美国人民遭到干涉的人权辩护。他要把清教徒那日渐蔓延的宗教唯心主义消除掉,实现他所选择的崇高事业。一个世纪过去了,亚当斯的曾孙——亨利·亚当斯——把律师看作是为金钱而工作的职业。但是,在“诚实的亚当斯”的时代,人们却认为法律是因为道德而产生的工作。亚当斯要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去,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良心认为自己有义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

亚当斯很适合从事这个行业。在充满戏剧色彩的法庭上,

他高兴异常，他喜欢环视庄严的法庭，他口齿清晰、言语铿锵有力、思路敏捷，能很快地抓住问题的中心，并很快作出案件的最后总结。他心胸坦荡，很少有人怀疑亚当斯隐瞒事实或篡改法官的评判。他重视法律，认为法律植根于历史、经验与先例。1765年，亚当斯完全可以成为马萨诸塞州的法官，但是他却回到了布伦特里，在那个地方从事诸如处理财产、重税、契约与遗嘱之类的工作，他同时也在法庭上处理一些涉及盗窃、诽谤、抢劫和私生子之类的案件。在他的家乡，亚当斯还发动人们示威游行，反对那些小酒店，因为它使得人们养成了好酒与喧哗口角的恶习。他成功地促成一部限量发放酒店执照的法律（因为小酒馆容易滋生邪恶）。这样，在法庭上穿着黑色袍子、戴着白色帽子的亚当斯美名远扬，为人们所瞩目。

另外一名律师——詹姆斯·奥蒂斯——慷慨激昂的辩护给亚当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英国的海关人员，凭着英国国王授权助理颁发的文书，肆意闯入商人的船只与仓库。詹姆斯·奥蒂斯为波士顿商人的辩护深深打动了亚当斯。这场审判本身虽然只反映了为走私者辩护的事情，但是亚当斯却认为它意味着英国权威在美国开始受到限制。这场审判后，社会契约应保证公民的普遍权利与革命的权利成为人们的共识。

阿比盖尔与那些“漂浮摇摆没有根基的日子”

早在他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之前，亚当斯就觉得自己总是为女性所吸引。布伦特里及其附近的城镇有许多未婚的母亲和私生子，所以尽管亚当斯的才智与魅力吸引了村中美女的视线，他还是保持着一副高尚正派的样子。亚当斯的男性朋友警告他远

离脆弱的婚姻陷阱,因为他的朋友很少有人早早地冲进婚姻的怀抱之中。尽管如此,亚当斯还是花了大量时间“追求女孩子”,并且还给镇上医生的妻子朗读《奥维德》。后来他又被一位可爱迷人的女孩汉纳·昆西所吸引,尽管已有许多年轻人蜂拥在她的周围。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亚当斯几乎要向她求婚了,但这时他的同伴们拥进了屋子,两人不得不分开。不久,汉纳嫁给了另一个追求者,亚当斯很快体会到了相思的滋味,他只有想着汉纳美丽的脸庞才能入睡。这种涌起无限愿望,却又无法满足,只好寂寞徘徊的场面“紧紧抓住了我的灵魂,不管我去了哪里,不管我在做什么,醒着或者睡着,这种亲切陶醉的画面总陪伴着我,她占据了我所有的思想”。

1765年,亚当斯最好的朋友结婚了,这时离他第一次见到阿比盖尔小姐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亚当斯迟迟没有向阿比盖尔求婚,直到 1769年。阿比盖尔比亚当斯小 16岁,她那时只有 16岁。与轻浮的汉纳不同,阿比盖尔很害羞,不好意思向那个打动她心扉的男人表明心迹。亚当斯花了一段时间才体会到阿比盖尔罕见的心智与人格魅力。那时他感到财力上不够充分,而且自己也没有变得富有的希望。但是,当他父亲去世时,亚当斯继承了父亲农场里的一座盐盒型房屋,他变得自信起来,开始热切地追求阿比盖尔。亚当斯的直觉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亚当斯与阿比盖尔长达 25年的婚姻生活成了美国总统罗曼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两颗灵魂结合的共鸣与欣喜。亚当斯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如同是磁石和钢铁一样”。但是,政治的责任感使得亚当斯离开家在欧洲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他担任副总统及总统的 16年里,阿比盖尔经常是一个人住在昆西。从 1765年亚当斯离职时算起,他们分离的时间远远超过

相聚的时间。但是他们之间的通信却从没有间断。他们的亲密关系没有因为年龄的关系而衰退。早期亚当斯在欧洲当外交官,阿比盖尔在离开家去与他相会时写道：“我的思想好像是凝固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依赖于你的指挥与保护,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朋友。”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这段婚姻中,丈夫与妻子结合在一起生活得异常美好。是爱,征服了空间与时间。

阿比盖尔来自于一个叫韦思茅的城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牧师家庭,所以家里人认为她与一个小城镇律师的婚姻是不般配的。她很小的时候,身体不好且经常生病,尽管如此,她依然充满感情地回想那段“漂浮摇摆没有根基的日子”。与她的两个姐姐一起,阿比盖尔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的妈妈是她们的启蒙者,父亲的图书馆也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博学、富有洞察力、机智的阿比盖尔把她爱恋的亚当斯看作是与她平等的人,并且带给性情忧郁、自我怀疑的亚当斯以稳定感。刚结婚时的阿比盖尔如同 18 世纪的一幅美丽的油画:宁静但富有吸引力的脸,喜欢凝视、难以捉摸却又热切的双眼,头发向后梳着,似是微笑却又严肃的嘴巴。而在稍后的肖像中,则显示了她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优雅与美丽。在她的许多信中,阿比盖尔都使用笔名“波西厄”——一个罗马领袖布鲁特斯妻子的名字,因为她认为波西厄是一个坚忍而又伟大的妇女。阿比盖尔很幽默,她从来不抱怨婚姻与做母亲的义务,她认为这是作为一位女性应该接受的传统角色,同时她也看重隐私与自律自立。由于亚当斯忙于公务,阿比盖尔一个人承担起管理农场与处理经济问题的责任。阿比盖尔还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书信作家,她不但与丈夫频频通信,而且还与美国革命时期的第一个历史学家墨西·奥

帝斯·华伦交往甚多。

在革命战争爆发后,有一段时间阿比盖尔确实都快成了政治家了。1776年春天,她在给亚当斯的信中写道:“我早就听说你宣告独立的事情了,我顺便提些建议,我猜测新的宪法章程一定会通过,所以你有必要去准备。我还希望你记得广大的妇女,比起你的祖先来,对她们要更加的慷慨。”她还对广大的殖民地妇女提出忠告与意见:“记住每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暴君,所以不要把无限的权力交到他们手中。”

“所有事情中最伟大的事件” 独立战争

1763年,英国与法国之间为争夺北美洲的七年战争结束了,而所谓的法国与印第安的战争也随着“新法兰西”的失败而落下帷幕。在战争中,虽然美国土著曾与法国一起在东北部共同抗击英军,但是魁北克依旧落入英国手中。“同新法兰西的战争,”英国的政治家洛德·格雷威莱说道,“是英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战争,是英国取得的最壮丽的和平。”格雷威莱在他将要离开世界时说出了这样的想法,他很幸运,因为他没有在前生看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被法国、西班牙与它自己的殖民地美国驱逐出美洲了。

英国当时的胜利导致了两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在美国的殖民者觉得,再也不需要英国来替它出力对抗法国和印第安土著了;另一方面,宗主国英国却强烈地感觉需要美国来为它的战争埋单,同时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地体系与由英国陆军和海军所负责的安全体系,也需要资金来维持下去,这些也应该由在美国的殖民者来偿付。美国与宗主国英国近百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

特许状、法律、法令的特征，并且这其中的许多法律条文解释得很差劲，还有一些被人们忽略掉了。鉴于此，英国的历史学家发表言论说，英国与美国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是“头脑中漏掉的一章”一样。为了改变这种情形，英国议会于1763年通过了《印花税法》。这个法律规定，所有殖民地的印刷材料，从报纸到证书到法律文件，都需要贴足印花税票。在历史上，这也意味着对殖民地直接征税的开始。当缘月份这样的法律规定传到了美国之后，波士顿人民的愤怒爆发了。那些征税员被涂上桐油，浑身粘满羽毛，印花税票被夺过来烧掉，木偶像被悬挂在火堆上点燃，陆军少尉托马斯·哈钦生的妹夫彼德·奥列弗的房子被狂风暴雨般的袭击搞得烂作一团。不久，哈钦生自己的豪宅与其中无数油画、银器、瓷器与稀有书籍全被洗劫一空。

一贯顺从法律的波士顿人民的行为令亚当斯费解，而那些领导这场暴动的人称波士顿人民为“自由之子”，亚当斯对此心存疑惑：自由能否在这群乌合之众喧哗的激情中维持下来？亚当斯与几个领导者成立了一个晚间俱乐部，讨论以权利与自由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的法律与命令的意义。在这些讨论中，亚当斯的第一部政治方面的著作《论教规与封建法律》一书诞生了。这部著作是匿名出版的，先是发表在波士顿的报纸上（没有标题），后又传到英国伦敦。这部当时被人们热切讨论的著作，后来却又归于寂静，为人们所忽略。这对于亚当斯来说有些可惜，如同后来美国历史上的林肯总统一样，他曾试图向美国人民与世界解释美国的含义，但最终却在时光中被人们淡忘。

当英国的男人、女人与孩子离开旧世界进入新世界时，他们随身携带着最好的思想，而把最坏的东西留下了。他们携带的

是关于人类天赋权力思想的萌芽,留在旧世界中的是由封建制度与天主教制度而来的专制政治与教条主义,以及“国王与残忍的神父”。封建的和教会的法律使得他们的主体处在“愚昧无知与怯懦之中”,只有经过新教的改革(其反叛的精神亦是由清教徒带来美国的)才会发生一场震撼全球的反教会与国家残暴统治的革命。当亚当斯以自由的含义质疑权威,以抵抗的名义质问政府时,也是他最为激进的时刻。他力图使美国人民意识到的也是埃德蒙·柏克后来力图使英国议会知晓的东西:那些如同清教徒的殖民者,天生就是难以抚慰的抗议者,他们永远不会被制服。乔治三世也许会称那些殖民者为“造反者”,但是他们是有理由与良心的造反者。亚当斯认为最大的罪恶是消极与自满,作为清教徒,他这样说道:“让我们敢于去读,去想,去说,去写吧。”

由于亚当斯与其他美国人民的反对,英国取消了《印花税法》。这令殖民者们欣喜若狂。但是,在 1765 年,英国议会又出台了新的法律,对进口到殖民地的商品征税,并且坚持说这些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征税,因为这要牵涉到外来的贸易。亚当斯再一次为反对没有得到大家与代表承认的任何形式的征税而辩论。当议会还在争论那些关于义务的法律时,英国政府也在增加驻扎在美国的军队。殖民者们辱骂英国士兵,酿成了“流血的龙虾兵事件”,有一个年轻人被毛瑟枪所射杀。在这个年轻人的葬礼后不久,一伙年轻人向英国士兵投掷石头,向他们挑衅。结果当英国士兵喊出“杀死他们”时,枪真的响了。最后,有 3 个人当场死亡,愿 1 人受伤。死者中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阿塔克斯的年轻人,英勇、强壮,是个黑白混血儿,他也加入了那伙白人当中,向英国士兵挑衅,他是第一个为了美国的自由而战的非洲裔

美国人。

那个据称是下令开火的军官，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已经被逮捕并移交到上级法庭接受审讯，因为他被控告造成了“波士顿惨案”。英国的军官们却劝说亚当斯为托马斯上尉辩护。当他接受这个案件时，波士顿人民开始疑惑：他是否真正地站在爱国者的立场上？亚当斯与另一个律师——约塞亚·昆西，为上尉与他受惊吓的士兵辩护，指出他们是因为受挑衅而开枪并为他们作证。但是使人们更担心、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亚当斯竟然将案件诉诸种族偏见，他提醒陪审团说，这群乌合之众是由“混乱的杂色孩子们——黑人、爱尔兰人与野蛮的乡下人”所组成。而且士兵们要面对非洲人阿塔克斯，他是一个“看起来会使每个人恐惧的人”。亚当斯强有力的辩护，最终使英国人被宣告无罪释放了。

美国革命是以恶作剧式的破坏开始的。1773年12月16日，被称为“波士顿倾茶党”的那些爱国者们，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登上英国的船只，静悄悄地把整整箱茶叶抛入水中。亚当斯从阿比盖尔那里听说了这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他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这是“所有事情中最伟大的事件”，它是如此鼓舞人心，所以当我站在那些爱国者的立场上，看到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登上英国在波士顿港口的船只倾倒茶叶时，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庄严、崇高而又伟大”的党派，正是他们创造了这一戏剧性的历史。“破坏茶叶的行为是那么勇敢，那么大胆，那么坚定，那么无畏和不屈，它必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又是如此的持久，必将开创历史的新纪元！”这次倾茶事件绝不仅是一次暴力的行为，它是历史的见证。“模型是铸就而成的”，亚当斯在写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

英国人也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下令关闭了波士顿港口。但是,从英国传过来的说英国军队就要打过来的谣言开始流传,而那些爱国者的领袖也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当然好一些的消息就是茶叶税已经被废除了。一些领导人,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督促大家要谨慎小心,有的领导人甚至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性。以派系斗争而出名的亲英分子丹尼尔·李奥纳德竟然坚持说殖民地人民没有权力反对征收赋税,没有权力蔑视祖国的权威。他还指控殖民者们前后的言行不一致。在《印花税法》实施期间,殖民者承认,英国人可以为了提高商业利益而维持贸易征税,但是不能仅仅为了提高收入而征税。可是当《印花税法》取消,新的法律出台后,规定要对茶叶与其他的商品征税。这时的殖民者们又转而否认所有形式的征税,不管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部的。李奥纳德还指控说,一小部分的煽动者误导殖民地人民,使他们产生了英国不仅要控制殖民地,还要剥夺人们的权力与自由的猜疑。亚当斯在波士顿的许多报纸报上,以拉丁文“新英格兰”为笔名,发表文章回击李奥纳德及其托利党人。所有的起义者均可以看到亚当斯强而有力的辩护,看到亚当斯对其所做的合理化行为的机智解释。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李维与西塞罗、西德尼、海洛特与洛克”,这些人的思想都是以“天然与不变的理性原则”为基础的,亚当斯在运用这些人所提供的教训时,亦展示了他广博的知识。在上面提到的作者当中,只有洛克认为人民被赋予革命的权力,其他的人,也确实如同他们自己所想的,都站在英国的立场上,认为理智与品德都要求殖民地人民服从英联邦更大的利益。亚当斯的文章亦预见到,《独立宣言》必须拒绝英国议会欲统治殖民地的任何形式的要求。亚当斯的文章和《独立宣言》都宣告了

人类的自由，这种自由源于美国人民内心深处拒绝的情感，源于美国人民对英国当局要求殖民地人民宣誓效忠的抵制。结果证明，美国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思想的革命，更是一场祖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争夺。英国想要统治殖民地，而殖民地人民却想摆脱它而寻求自由。亚当斯借助于“源于本性与永恒理性的原则”来说明它，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场争夺只有通过残酷的武力才能最终解决。如果英国胆敢强迫殖民地人民服从它的议会，那么殖民地就只好求助于“砖块与弹丸的法律了”（这个法律也只有砖块和弹丸本身才能够解释清楚）。

亚当斯这一文章的最后几部分没来得及出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1775年4月19日的康科德与列克星敦，武力代替了哲学，因为主权问题最终只能由武力而非理性来解决。殖民地的民兵在树后占据有利的位置，与英国红衫士兵交战，并且使得他们在精疲力竭后向波士顿撤退。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美国人民确实需要花不止一年的时间才能赢得独立。在那个时期，一场天花的瘟疫席卷了殖民地的北部地区，成千上万的英国与美国士兵都染上了天花，而这时的亚当斯与阿比盖尔也只能留在家中小心看护生病的孩子。波士顿几乎成为一座医院。

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据亚当斯的统计，有 1/3 的人支持革命，有 1/3 的人反对革命，还有 1/3 的人保持中立或者对战争漠不关心。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不想发生战争；一些弗吉尼亚人则认为可以劝说英国改变政策，而一些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来之前，他们的州就已经指示他们不准赞成独立。许多造谣的人则思考着派一个求和的使团去英国。亚当斯明白，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纽带已经永远地断了，他也知晓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并且其他的国家不会乐意承认美国，除

非美国独立并拥有主权。美国人民还在犹豫着,是否该迈出这勇敢的一步。1776年,来自于费拉德尔菲亚(现称为费城)的一份小册子印刷出来了,美国人民突然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托马斯·潘恩强有力而又简洁的《常识》传遍了整个殖民地。他坚持认为,一个小岛大小的国家却想控制整个大洲,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的确,英国政府本身像是一个“失去纯真的徽章”,是一个源于我们自身罪恶的人为的干扰。而在新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自由与机遇的新社会。如果美国抓住机会,并同英国实现“最后的分离”,那么它将给世界一个全新的开始。太阳因为我们而照耀,“一个新的国度就要诞生了”。

与其他美国人一样,亚当斯非常欢迎潘恩的那本抚慰人心的小册子。它的广泛流传促成了美国的独立,然而亚当斯依然担心潘恩的关于政治思想的建议,会对人民理解在革命后到底需要些什么产生不利的影响。亚当斯再一次拿起了笔,写了《关于政府体制的思考》一书。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潘恩在分裂政府方面展示了罕见的天才资质,这远远大于他对政府建设方面的贡献。亚当斯引用古典理论,指出快乐只有在道德的角度才能建立,人们的道德能力依赖于一种从容不迫的结构与政府的管理,而政府则是源于一定的社会惯例与法律;人们不能只按照自己的意愿,不顾任何法规与限制去肆意行事。亚当斯的著作传遍了美国的 13 个州,一时间,每个州都决定建立自己的政府机构。

1776 年 9 月 10 日,亚当斯被任命为“五人委员会”的一员,负责起草将要宣布的决议的框架:“联合的殖民地应当有权利,而且应该获得自由与独立。”《独立宣言》为什么由杰斐逊来起草,

原因至今不明。亚当斯则说，他选择杰斐逊来起草《独立宣言》是因为杰斐逊的文笔更好。虽然杰斐逊记不起亚当斯的要求了，但他确实起草了强有力且贴切恰当的宣言。当杰斐逊在用优美的语言起草《独立宣言》时，亚当斯也发表了演说，劝说全国人民勇敢地前进。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之前，亚当斯的呼吁如此的流畅和令人信服，曾经有一个代表把他描绘为“美国独立的亚特拉斯”而杰斐逊也说道：“亚当斯的演说如此有力，如此生动，我们都要激动得坐不住了。”

当全国人民的热情还在为《独立宣言》的发表而燃烧时，一股阴郁的气氛开始笼罩北部的殖民地。天花瘟疫更加严重了，市民与士兵都变得虚弱至极，此外还有接种天花疫苗带来的恐慌。这时的阿比盖尔既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也要照顾邻居家的孩子。更令人沮丧的消息是在长岛的士兵打了败仗，纽约城陷落了，那里的议会成员都逃往费拉德尔菲亚城，并且还有大约 10 万的英国士兵与雇佣兵在美国的海岸登陆。但是，到了 1777 年的秋天，萨拉托加战役的胜利（战争以来美国首次取得胜利的战争）与英国伯格尼军队的投降，使得美国人民开始找回希望。后来，乔治·华盛顿将军先是领导撤退，然后，他们又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特拉华州，夺回了雇佣兵驻守的要塞。这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激动和兴奋。几天后，华盛顿又一次在夜间突袭，在露营的篝火还在燃烧时，他的军队悄悄地穿过河流，绕到英军的后面，把英军赶回了新泽西州。

清教徒外交家在巴黎

1778 年到 1780 年的冬天，亚当斯同意加入阿瑟·李与本·富

兰克林的代表团,出使法国,同法国谈判建立联盟并寻找经济上的援助。横渡英里的航海行程要花两个月的时间,而且相当危险。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横渡大西洋北部,船只随时都有可能被英国海军抓获。然后,亚当斯,这个“叛军”领袖,可能就会因为叛国的罪名被送进英国的铁塔中等待绞刑。阿比盖尔决定打消来自双亲的恐惧,让自己 15 岁的儿子约翰尼陪伴他父亲远航。约翰尼(即后来成为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非常渴望在海上冒险,并且阿比盖尔也觉得让他进入广阔的天地是改进他的理解力与洞察自己责任的最好方法。当时有许多间谍潜伏在波士顿周围,亚当斯与儿子约翰尼秘密地从马布尔黑德登陆。英国的巡洋舰包围过来,但船长高超的驾驶技术把它们远远地抛在后头。在南部的航程中,一场狂暴的热带风暴席卷了他们的船,船的主桅杆碎成了木屑。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水在甲板下面翻腾,“船浮动着,翻滚着,搅动着,折磨着”,充满了“蹂躏与冲撞摩擦”。

亚当斯一向都不隐瞒自己要求被承认的深切愿望,在他出使法国时如果他不是那么谦虚,那么他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稳重的亚当斯”,人们这样称呼他。这使得亚当斯一直疑惑是否法国人看中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他的表兄塞缪尔。塞缪尔是一个声名昭著的积极分子,他曾当过工艺匠人,做过机械工,并且还是波士顿倾茶党行动的暗号发出者,一个激进的美国战争的煽动者。法国人一直认为亚当斯太谦虚了,所以不能接受这样的称赞:“一个伟大著名的人。”法国人还认为亚当斯就是《常识》一书的作者,虽然这本书在法国出版时,作者的名字与其中反对君主制的引文部分被删掉了。在亚当斯的日记中,他记录道:“你越是否认你的大众的名誉,它就越拒绝你。”最后,当富兰

克林接替他出使法国的任务时，亚当斯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听说过的，相当没有价值的人；一个不懂一点法语的人；一个体形丑陋，着装尴尬的人；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顽固而又盲目的人”。

起初，亚当斯对于自己受到法国贵族与公爵夫人的关注而感到欣喜，他尤其喜欢与迪·拉法耶特公爵夫人（她的丈夫这时正在美国与华盛顿一起战斗）会面，他还喜欢与伟大的哲学家孔多塞与金融家巴伦·杜尔哥（一位思想家，后来亚当斯在关于政治宪法合适的体制框架上与他发生了很大分歧）一起进餐。但是，当亚当斯见到其他的政府官员时，他的感觉就差极了。因为花着美国政府的钱，在巴黎过着奢侈的生活，还携带着自己的妻儿，却没有筹集到钱，也没有购买到武器运回美国，所以生性节约的亚当斯决定与本杰明·富兰克林搬到城市偏僻的郊区，一个叫帕西的地方。

这并不是亚当斯与富兰克林第一次共用一个房间了。早些年时，他们两人也共用过一个房间。晚上，当亚当斯上床时总是把窗户紧紧关上，但是他总会颤抖着醒来，发现富兰克林把窗户全都开得大大的。富兰克林这时不仅不允许亚当斯回去继续睡觉，还要向他大讲特讲呼吸新鲜空气的好处。后来，当富兰克林在 1790 年以 83 岁高龄去世时，亚当斯对阿比盖尔说，他已经吸进了过多的新鲜空气。

使他们两人有隔阂的不仅仅是不同的睡眠习惯。在那些旁观的巴黎人眼中，亚当斯似乎是被长生不死的花花公子富兰克林所激怒，就像是个焦虑不安的清教徒。富兰克林 79 岁时，还显得和蔼可亲，他比看起来古板严肃的亚当斯整整大了 14 岁。就是这么一个老人，依旧想证明好色并不为年轻人所专有。在

亚当斯的日记里,他常抱怨富兰克林“持续混乱”的生活方式,说他经常与那些声名狼藉的女人在一起。富兰克林经常是在清晨的时候回来,并且很少在早饭时间起床讨论当天的事务。富兰克林好色的事情,或许被夸大了,成为巴黎人茶前饭后的谈资。然而,富兰克林仍然深受法国人喜爱,他是在欧洲最有名气的美国人了。人们会站在道路的两旁,目送他的四轮马车驶过。他的浣熊皮的帽子,安适从容的仪态,巨大的科学成就,他的名言警句和诙谐的双关语,都代表着年轻美国人的形象。亚当斯没有怨恨过富兰克林的名气或者放荡的生活,但富兰克林这种混乱的生活,对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紧张需要来说显得很不合时宜。

在巴黎时,亚当斯变得容易发怒,还怀疑富兰克林与其他的人阴谋反对他,意图把缔造和平条约的功劳据为己有。亚当斯认为,法国是故意让美国弱小下去并永远依赖于他们的联盟,所以,法国对于美国的亲英分子的支持,是在故意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以拖延战争。由于本质上的不信任,亚当斯面对的也是别人怀疑的外交手段。缔结《1778年盟约》的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德利特斯写道:“在18世纪的外交家中,谁也不会怀疑亚当斯的多疑性格。”与富兰克林不同,亚当斯对于聚会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和约问题,所以他必须与法国的外交家韦尔热纳伯爵共事。而韦尔热纳模棱两可的言语与诡诈的行为,使得亚当斯总是疑惑美国是否能寄希望于法国。韦尔热纳寻求的是不为英国所知的秘密援助美国的行动,以避免英国与殖民地妥协并反对法国,把法国赶出新世界。许多供职于美国政府中的秘书都是英国的间谍,韦尔热纳知道这一切却一字不提,而亚当斯与富兰克林对此却一无所知。韦尔热纳的秘密外交与诡诈手段使得他活得相当舒适安逸。韦尔热纳还发现,比起和蔼可亲的富兰克林来,亚

当斯则显得固执和毫无耐心。亚当斯还力求能调回美国工作，他认为君主制的法国对于民主制的美国人民想要的自由是没有什么同情心的。

即使亚当斯要寻求法国财政上的援助，他也不想使美国变成法国实现其外交、军事目的的工具。他请求法国派来更多的舰队，以保卫美国的沿海领域并切断英军的供给，却又坚决拒绝法国士兵进入美国领土作战的要求。他也不会接受与英国的和平协议，除非英国能承认美国完全独立。英国的妄自尊大终于使战争接近尾声了，英国只剩下加拿大的一块殖民地了。法国力图延长这种局面，以找回在法国与英国早期的印第安战争中的损失，并希望看到疲倦的英国丧失它在新世界中的所有土地。亚当斯则力诱与英国签订战后的商业协议，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与英国的和解是法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韦尔热纳宁愿与合作的富兰克林共事，也不愿与固执的亚当斯打交道。英国的使者、西班牙的大使、法国的外交官、美国的使团齐集巴黎，激烈争论密西西比河地区领土的归属问题，讨论纽芬兰与新斯科舍的主权问题，讨论债务问题下美国货币的稳定性以及亲英分子的地位与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亚当斯坚持认为亲英分子的问题纯粹是美国内部的事务，并且由于他们的财产已经被他们所属的州政府没收，所以议会没有对他们的审判权。亚当斯建议说，亲英分子将会发现解放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很不舒服，他们最好还是留在加拿大或英国吧。

1789年的夏天，亚当斯回到了美国，并且向国会报告了那些还有争议的问题。他还为马萨诸塞州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文件，文件以声明权力为序言，在其中还描述了权力与立法机关的分立。当亚当斯回到欧洲后，他被国会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谈

判并签署一个和平协议。荷兰的富裕程度远远高于法国,是一个可以筹集钱财的地方。亚当斯于 1780 年 5 月动身前往海牙,与这个低地国家签订友好协议和贸易协定。荷兰虽然很富有,但是依旧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商人的船只免遭英国海军的骚扰。因此,亚当斯在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谈判和描述美国的状况时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在法国时少一些。不过荷兰的那些学者与知识分子们在低地国家的叛乱与美国殖民地的叛乱之间划上了等号。在荷兰的两年中,亚当斯的信心不时受到打击,因为荷兰并不情愿承认美国。但是在 1782 年 5 月传来了“最为辉煌的消息”英国驻扎在美国的海军司令洛德·康瓦里斯宣告投降了。不久,美国与荷兰就签订了通商协议,并且荷兰著名的金融机构还为美国提供了 100 万荷兰盾的贷款。当亚当斯回到巴黎时,他在荷兰的伟大成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亚当斯本人也把这次贷款的取得与外交界的承认,作为他一生中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美国的旗帜飘扬在海牙上空,它征服了……英国人的傲慢与自负。”然后,深受压抑的亚当斯感觉到无比的愉悦。“当我走进天堂的时候,”他说,“——绝对不是一个假设条件——我会高兴地俯瞰海牙的城垛,那有条纹与星星在上面嬉戏的城垛。”

由于武力征服在美国的失败,英国除了签订和平协议已别无选择。现在,斡旋开始了。韦尔热纳伯爵提出要求说,既然美国已经赢得了自由,这时再相信独立仍然是优于和约本身,就是愚蠢至极的了。所以,与取得独立相比,和约才是最重要的。奇怪的是,美国国会竟然同意了法国的看法:也就是和约本身不需要以承认美国的独立为前提。这样的结果使得亚当斯目瞪口呆,于是他极度愤怒地威胁说要辞职回家。幸运的是,亚当斯得

到了富兰克林与新到达的外交官约翰·杰的支持。他们三人决定略过国会与韦尔热纳,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达成同法国的和约。正式的谈判开始于 1783 年的冬天,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秋天。《1783 年巴黎和约》中宣布:“大英皇帝陛下已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拥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三位美国外交家坚守他们的立场,坚持在美国沿海的捕鱼权,坚持不在领土要求上向欧洲妥协,坚持说那些亲英派无权要求财产赔偿。和约是在一所大厦(现在已经是索尔邦大学的一部分)里签订的,大厦位于繁华的 缘区第 远大街。雅各宾派很快就后悔自己的选择了。

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时已历经多年的政治生活了,但出使欧洲则是一件与此完全不同的事情,从他的思考中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提及宪法的体系时,他更多相信的是制度与体制,而不是人类。“我胆敢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不管我怎么不积极地扮演我的角色,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我所处的愤怒的民族与更激烈的党派之间的局面,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最为奇特与有趣的事情了。对手的愤怒与自然的狂暴,盟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傲慢自大,比这更坏的妒忌与羡慕,朋友与合作者之间的戏谑,将是一个人在品行修养与政治活动中能学到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课程,这一点早已为报刊所承认了。

亚当斯可能会失去对同胞与对手的耐心,但是在富兰克林与约翰·杰的帮助下,他完成了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因为在《1783 年巴黎和约》中庆祝的东西将不会在 18 世纪发生。美

国赢得了战争与和平的双重胜利。

在忧郁中离开巴黎

亚当斯珍爱在巴黎最后的那段日子,既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亦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当与英国的谈判提上日程时,猿岁的阿比盖尔与女儿(乳名娜布)也已经登上了开往大西洋的船只,准备与家人在巴黎重聚。在先前回国的简短旅行中,亚当斯是与他的另一个儿子查理斯一块回去的。查理斯起初见到广袤的海洋时还觉恐惧,但最终与他的哥哥约翰·昆西一样,成了一个“勇敢的水手”。这时候的约翰·昆西已经成为美国的外交家了,以后他将会无数次的穿越大西洋。

但是阿比盖尔与她的女儿乘坐的船只离开港口之后就遇到了风暴,所有的瓶子与盘子都摔碎在地板上,乘客们都紧紧地抓住能抓牢的东西。船上的妇女必须得忍受狭小而又令人窒息的船舱,而剩下的大批男人则睡在原先作为餐厅的房间里。这个地域的潮气使得阿比盖尔的风湿病犯了,每天的饭食又令人作呕,阿比盖尔经常强制自己吃些可以吃的东西。

早在出发的时候,阿比盖尔就恐惧海洋,但是在航行的过程中,在夜晚月色下看着神秘光线闪烁的景象,她体会到某种崇高的感觉。阿比盖尔在给姐姐的信中热切地说着“燃烧耀眼的海洋”,既危险又令人感到神秘,“伟大与神奇是你的杰作,万能的主与上帝啊!”

阿比盖尔与她的女儿在英国登陆,并且在伦敦待了几天,等待与亚当斯相聚。不久,亚当斯也从荷兰赶到伦敦。阿比盖尔与娜布被劳伦斯·史特恩的叙事戏剧深深吸引了。过了些日子,

亚当斯带着妻女又登上了法国的土地。

亚当斯对于重新回到巴黎感到欣喜若狂，他尤其喜欢那所坐落在布伦波伊斯的带花园的大房子。但是，起初阿比盖尔与娜布非常讨厌巴黎。她们不懂那里的语言，她们怀疑马夫与仆人在欺骗她们。她们认为法国社会是一个过分悠闲与享乐的社会，那些轻浮与伤风败俗的法国女人丝毫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甚至连牧师也是混乱无章而不是虔诚的。但是，逐渐地，新的环境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亚当斯也向她们指出这个城市令人愉悦的地方：优雅的花园、沿途全是树木的广阔的林阴道、壮观的博物馆、歌剧院与戏院。阿比盖尔开始迷上法国芭蕾舞演员灵巧的姿势与步态，亚当斯也回忆起早些年定居在剧院附近与年龄颇长的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相邻的日子。1788年亚当斯重新调任伦敦的时候，阿比盖尔在给杰斐逊的信中描述了全家人离开巴黎时的伤感情绪：“在所见到的人中，我认为，没有一个人离开巴黎时是兴高采烈的，而是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忧郁与悲伤。”

第二章 人类发明的最无意义的职务

“除了我的祖国，我别无依恋。”

作为即将上任的公使，亚当斯是第一次正式在尊贵的英国王室面前露脸。美国的亲英分子在英国散布谣言说，亚当斯永远也不会受到陛下的接见。然而，亚当斯却被通知去见英国国王，他急匆匆地准备了一篇简短的发言，许诺说美国与英国之间将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买了一件新大衣，而阿比盖尔却从他们的储藏室中拿出了他最为尊贵的装扮：装有银扣的靴子、丝质的裤子、白色的手套、腰带、佩剑与假发。这是一次奇怪的较量。“疯子”似的乔治三世是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以易怒的火暴脾气出名。他要见的是来自一个小地方的谦虚而且谨慎小心的律师亚当斯。在这本书中，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君主制在即将诞生的新世界中毫无未来可言。

国王与外交官心中都是明白的。亚当斯向国王鞠了几个躬，国王说话时带着颤音，追问外交官的英国血统，亚当斯竭力避开这个问题，指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的祖先就离开了英国。国王又提及亚当斯在法国的事情，亚当斯回答说：“我必须向陛下承认，除了我的祖国，我别无依恋。”国王则回击说：“一个诚实的人，是不会有别的喜好的。”

尽管亚当斯与国王相处得很好，还发现国王是一个颇有鼓动性而又健谈的人，但是，他与英国政府官员的关系还是逐渐紧张起来。他没能使英国保证尊重美国的捕鱼权与航海权，没能使英国同意撤回驻扎在美国的部队，也没能拓展美国的商业贸易特权。英国政府与人民已经原谅了美国拒绝自己的宗主国，所以，这时亚当斯提出英国应该为其没收的奴隶与财产作出补偿，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同时，美国拒绝偿还欠英国人的债务，这一切都使得亚当斯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环境中。对英国人来说，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殖民地的胜利，他们认为美国的革命等同于叛乱与叛国，不过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对一张通行证的要求罢了。与在法国和荷兰截然不同，亚当斯发现自己在英国是处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情形中。

令人安慰的都是私人的事情。这时，亚当斯的女儿娜布已经与一个美国军官结了婚，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而阿比盖尔对园艺着迷起来，并且她再一次感受到与杰斐逊——一个孤独的需要女性关怀的鳏夫——的友谊。尽管杰斐逊与亚当斯有着尖锐的冲突，但是他展示给阿比盖尔的却是他的温柔、深沉的感情，他与阿比盖尔在巴黎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后来，因为重大事务的问题，杰斐逊被召回到了伦敦。

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海盗在地中海地区截获了美国的两艘船只，并且强迫上面的 10 个水手充当奴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愿意付给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与摩洛哥一定的通航费用，美国则授权亚当斯与杰斐逊去交涉。来自苏丹的特使还警告亚当斯说，伊斯兰教徒与清教徒之间的战争是令人恐惧而又难以预期的。亚当斯也疑惑自己是否在与一个狡猾的政治家或者精明又善于欺骗的人交涉。他与杰斐逊按照国会的指示，支

付了一部分款项，“只是一桶水中的一滴罢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告诉美国为什么要拥有装备精良的海军。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认为美国确实需要军队，而杰斐逊的想法恰恰与他相反。

亚当斯还认为美国需要一种东西，一种新的政府体系，而杰斐逊却不那样认为。早在《1763年巴黎和约》之前，美国正式采取的是一种联合政府的体制，也就是一种松散的、各个独立的州之间无统一的总统与法院体系的体制。统治权分散在各个州，而不是集中于国家政府。每个州享有独立签订商业合约，同外国进行外交来往，发行自己货币的权利。这种联合体制还存在一种危险，即欧洲强国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打败美国诸州。它会产生这样的可能性：州的立法权可能会被占大多数的民主人士和那些深陷债务危机、要求发行新的毫无价值的货币以还清负债的人所接管。当人们要求关掉法院，要求抛弃掉债务的时候，这种“债务人的日子”真的在北卡罗来纳、罗德岛与马萨诸塞州发生过。

亚当斯已经理解并接受了这样的发展，而杰斐逊则对人民把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感到异常高兴。当1780年西部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谢斯领导的叛乱发生时，杰斐逊认为这些拿起武器要收回自己农场的人民，表现出了光荣的反对政府的传统。“只要出现问题总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要比没有任何表现强得多，”杰斐逊写信给阿比盖尔说，“我喜欢不时地发生些暴乱，就像空气中的风暴一样。”而对娜布的丈夫、亚当斯的女婿威廉姆·史密斯来说，杰斐逊就显得更加强有力了：“自由的大树，需要不时地靠爱国者与暴君的鲜血来恢复蓬勃生机，这是它天然的肥料。”而亚当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对于有共同的热望呼吁自由的人来说，对于要求摆脱债务危机的人来说，对于要求

财产分配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对常识的贬低吗？亚当斯也看到了杰斐逊的困惑所在。地方的叛乱越多，中央的政府就越要加强它的权威。1787年的秋天至1788年冬天在费拉德尔菲亚采用的新宪法草案就是明证。

早在伦敦时，亚当斯就开始着手那本大部头的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了。三卷本著作《为美国宪法辩护》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美国国内的混乱，更是为了回击欧洲批评家对于州宪法与新的联邦宪法的批评。这部著作的出版，赢得了许多人的注意。当亚当斯回到美国重新进入政治生活时，他的著作以及随后的文章在1789年的出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另一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入主白宫之前，写过关于政治理论的著作。威尔逊写著作是为了解释为什么委员会行使权力的政府，在当时的美国变得拖沓繁琐。亚当斯则力求解释共和政府在欧洲总是失败，却能在美国获胜的原因。假如美国人民停止听取这些哲学理论，那么法国思想家也会相信理智与道德可以消除武力与堕落了。当亚当斯1793年成为美国副总统后，他的著作就成为围绕他政治生涯风暴的中心了。

1788年的7月，亚当斯离开英国，回到了阔别15年的美国。他们一家人的离别使得他们更坚定了对祖国的依恋。他们回来时带回了几套在巴黎买的好看的家具、大量的书，还有杰斐逊送给阿比盖尔的10双丝袜。

在海边，亚当斯登上卢克利希亚号的甲板后，开始呼吸带有咸腥味的海风，它令人精神振奋，亚当斯想像着现在的美国变成了什么模样。亚当斯不知道，他们这艘船正在被离马萨诸塞州海岸不远的灯塔所引导，并且一只独木舟报告了他们的到达，以

示波士顿人民对他们的热烈欢迎。亚当斯被称赞为革命的英雄,一个当美国需要时及时从荷兰贷来款项,一个通过谈判促成美国独立和约的外交家。当他们到达后,被护送着去参加在约翰·汉考克州长壮观的比克山庄里安排的宴会。

一时间,人们纷纷猜测亚当斯政治生涯的到来。宪法已经获得了承认,诸州要选举出代表来选择国家的总统与副总统。没有人怀疑,第一把交椅应该由华盛顿来坐,而亚当斯则会位于华盛顿之后,成为副总统。然而,亚历山大·汉弥尔顿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的继承者,他不希望亚当斯与自己实力相当,所以他就在幕后操纵,暗中说服其他的选举人不投亚当斯的票。亚历山大·汉弥尔顿知道,亚当斯一定会当选,但是却力求降低他的票数,以免新英格兰人民继续把他看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英雄。汉弥尔顿成功了,华盛顿获得了毫无异议的全额选票,而亚当斯只获得了 1/3 选票。虽然,这使得他能够当选为副总统,却也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亚当斯对汉弥尔顿在背后所做的手脚毫不知情,他除了疑惑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问本杰明·拉什说:“这公平吗?”“在商业活动中有最起码的礼貌常识吗?对于我的国家,我的国民与宪法来说,这岂不是一个永远消除不掉的污点?我坚信你会这样想。”亚当斯是如此地沮丧,他几乎要拒绝出任副总统了。

选举并没有反映出亚当斯所应该得到的尊重。新英格兰人民赞扬他为“伟大的亚当斯”,当他回到波士顿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人们站在街道两边用力向他挥动帽子欢呼致意。当他于 1789 年 9 月 17 日离开布伦特里去费城上任时,竟有一个军团护送,有装备精良的马车与技术娴熟的骑手,亚当斯坐在队伍最前面的马车上,后面是 12 辆闪闪发光的马车。

亚当斯发现副总统这个职位毫无挑战，无聊透顶。他的心中充满热情，他曾为美国的独立进行辩护，而现在，在议会中，他却被要求保持沉默。在那里，他不能发表正式的演讲，不能选举，除非政府成员在意见上冲突僵持时，他才可以发言。亚当斯几乎没法适应这个颇受限制的职位。他对一个朋友说，他的职位是艰难的，是例行公事的，他感到被那些根本不考虑他意见的新英格兰的代表们所“肆意愚弄与背叛”。他常常希望他可以重新回到律师这个行业，在那里他是积极主动的，而非消极被动的。“我目前的情形，即使是再坚定与有耐心的人也毫无办法。”亚当斯是第一个当上美国副总统的人，他向阿比盖尔抱怨说，副总统是“有史以来人们所发明的，或者说是能够设想出的，最无意义的职务”。

亚当斯对于华盛顿任命的内阁并无异议。比较次要的任职有：弗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马萨诸塞州的亨利·诺克森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比较重要的则是：汉弥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杰斐逊被任命为国务卿。在亚当斯的早几年的副总统生涯中，与杰斐逊与汉弥尔顿都没有什么冲突，而他们两个对亚当斯也是充满了尊敬。但是，当汉弥尔顿与杰斐逊在经济政策与美国共和制的道义前途问题上发生分歧时，美国也随之在他们之间分裂了。

汉弥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立宪主义

汉弥尔顿出生于加勒比海，他没有国籍与什么身份标志，他还是美国民族主义代表者中的一员。他年轻的时候，在圣·里尔

岛工作,在他 19 岁时,开始买卖货物,处理贸易与信贷,汉弥尔顿因而成为美国经济萌芽时期天才的经济学家。在他那个时代,他认为政府必须有能力控制金融体系,控制商业,把国债作为国家将来的投资资本。他还认为 美国将来的命运依赖于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尤其特别的是,他还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与联合政府的建议,认为应该为战争期间国家蒙受的债务提供补偿资金。银行建设,尤其是他的资金计划,引发了全国争议的风暴。资金计划看起来对那些以极低价格购买国家证券的人有益,而实际上计划本身也可以从证券的增值中获益,对负债累累、力图偿还债务的国家来说也是大有益处的。弗吉尼亚的杰斐逊与麦迪逊则谴责所谓国家银行的想法,说宪法从来没有赋予政府设立这样一个全国性机构的权力。他们认为这项计划完全是一个阴谋,是汉弥尔顿想要少数有钱人高于民主的大多数人之阴谋的第一步。这也正如在英国,公债、钞票与其他货币这些与劳动、土地等根本不相关的因素,却腐化堕落了英国的议会一样。

在这场争论中,亚当斯站到了汉弥尔顿的一边。他们指出,为了防止美国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信用危机,美国再也不能拖延支付法国与荷兰的债务了。亚当斯也支持国家银行的计划,虽然席卷美国的“金融风暴”将会使他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经济问题的争论使得美国南北双方分裂了,最后南方诸州要求以首都驻地从费城迁往波托马地区为交换条件,双方才达成了一定的妥协。

由北方联邦同盟盟员汉弥尔顿促进,受亚当斯支持鼓励的政策,展现了年轻的共和国急剧上升、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当亚当斯从欧洲回国后,他看到了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 船坞

与沟渠的建造欣欣向荣,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由技巧娴熟的印刷商、面包师、铁匠、枪支制造者、木匠、器具专家、零件铸造工与专门制造精致家具的细木工匠组成的劳动队伍迅速完善。但是杰斐逊却对美国的银行与商业体系总体上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汉弥尔顿正在把国家交到那些“股票投机商与工业巨头”的手中,使得美国成为英国政府的复制品。1792年1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发生了。许多人认为,这是由“投机狂潮”所造成的,它使许多著名的富豪家族遭受了打击,并对汉弥尔顿的政策提出了新的反对与抗议。

从那时起,美国历史著作中存在的不再是微小的分歧,而是杰斐逊主义与汉弥尔顿主义之间的巨大分歧。在华盛顿总统的眼中,应该以强制力说服杰斐逊,让他与汉弥尔顿达成一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头脑固执的人,在关于美国未来的构想上,恰恰是相反的。杰斐逊认为,离乡村生活越远,就是离美德越远,也就在邪恶的斜坡上越滑越远。而汉弥尔顿则拒绝农业社会,认为它是压抑的,是奴隶制的社会,而非自由的环境。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最终使政府官员分裂为激进的“左派”与守旧的“右派”。尽管杰斐逊喜欢“时不时有些小叛乱”,但是他也认为财产是稳定的力量,他害怕真正的革命,因为那会带来推翻现在制度的社会革命。汉弥尔顿提倡工业和商业,一种真实却又声名狼藉的力量。他不指望什么财富,他看重的是货币与信贷,认为只有它们才能把美国从乡村的那种具有惰性的生活方式中解救出来。

亚当斯在这场争论中可以说是自由自在的,因为他既不是杰斐逊主义者,也不是汉弥尔顿主义者。他根本不相信地理与经济上的差异会影响到人的特征与行为,如同人的心灵(这是他

非常喜欢的措辞),离开弗吉尼亚的农场到纽约城这个商业地方定居,不会使它发生本质变化一样。亚当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环境的影响,人的本性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我们的世界已经滥用这个词太多次了”,他警告说,土壤、气候、经济的方式不会“决定国家的特征与政治机构”。恰恰相反,确切地说,正是政府与机构的本质和结构决定了国家的特征与它的历史命运。在美国,农场会繁荣,银行也会繁荣,但是如果宪法体制相当不完备,那么国家将最终在共和体制上遭遇失败。亚当斯被人们描述为一个政治决定论者,因为他信任的是政府机构。拯救国家的既不是精英集团,也不会是民主集团。拯救国家的只会是政府的机制,一个由颇有责任心的总统的想像力所引导的机制。

在那个时代的三个处在领导地位的思想者中,可以这样说,汉弥尔顿是一个相信政府与经济相融合的重商主义者,杰斐逊是一个相信人民统治权的个人主义者,亚当斯则是一个相信政府效能的立宪主义者。汉弥尔顿寄希望于受责任心驱使的坚持寡头政治的少数人,杰斐逊指望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自由的民主的大多数人,亚当斯则依靠那些希望通过政府与“机构”保存自由的主张单一行政权的人。

杰斐逊与汉弥尔顿,都惧怕对方会在竞争中占优势,他们之间是有可能和解的。他们没有分歧的是,华盛顿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连任了。那么亚当斯会怎样呢?

副总统与“炫目的王权”

除了汉弥尔顿的经济政策外,另一个使美国产生分裂的因素是法国革命。亚当斯以前为了回击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写过一

本书。后来，当法国革命爆发后，他又写了一本书，反对法国革命。杰斐逊认为亚当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空想君主主义者，当托马斯·潘恩于 1791 年春天在伦敦出版他的《人权》时，杰斐逊写了一封信连同这本书的复本一起送到了费城的出版商那里。这封信，作为此书的序言，鼓动美国人民读潘恩的书，以回应“我们中间兴起的政治异端”。少数的读者认为杰斐逊是在攻击亚当斯，说这个“布伦特里的公爵”是一个反联邦主义者，他们还坚信正是他——副总统——试图使贵族的规范与君主制介入美国生活。在写反对法国革命的著作时，亚当斯被看作是一个力图维护旧统治秩序的君主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警告说法国革命将会在中途中止或以灾难宣告结束，除非法国会遵从他的建议。

然而，亚当斯的批评者们把法国革命看成是美国革命的自然延展，他们指责亚当斯只支持一场革命，却反对另一场革命，说他是伪善之人。曾为美国革命辩护的英国哲学家埃德蒙·柏克，也是一个批判法国革命的有洞察力的评论家。亚当斯关于法国革命错误思想的批判，早在 1790 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就出版了，而柏克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沉思》是在 1791 年才出版的。关于亚当斯政治哲学的著作将在下一章中论述。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当亚当斯成为副总统后，对他的那些保守的控告是与他自己的行为相违背的。

在当副总统的前几天里，亚当斯感到紧张不安，他不确定该如何看待他的职务，他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算是举止得体。宪法通过议会选举他为副总统，却又没有具体指定礼仪的一些规则。他不知道当他进入议会大厅的时候，总统会发表什么样的演讲词，他疑惑是否该建议议院的代言人作演讲时以“尊敬的”

华盛顿的功绩作为序言。于是关于称号与仪式的争论随之而起,委员会最终建议说以“他的高贵”来欢迎华盛顿总统。亚当斯询问议会说:“我是否应该说‘华盛顿先生’,或者‘总统先生’,或者‘先生’,或者‘阁下’,或者其他什么?我发现当华盛顿总统作为将军时,我常称呼他‘尊贵的阁下’,但是我又发现不带任何头衔只是称他为‘先生’或者‘总统先生’,比把他称为百慕大群岛的统治者感到更放松自由一些。”

当亚当斯出使欧洲时,他看到英国的议会与法院都是以帝王般的谈吐与尊敬的礼仪行事,所以他相信,美国亦可以在事务中适当地带有一些尊贵与礼仪色彩。但是,当亚当斯离开欧洲回到美国时,他看到的只是些宫廷小丑般的却又自命不凡的人。

亚当斯的反对者们攻击他,说他的君主制就如同美国人的雄性特征一样在逐渐消退、岌岌可危。威廉·麦克利,一个粗俗、难缠、不修边幅的律师,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在媒体与议会之前,因为亚当斯自负的头衔与对客套礼仪的崇拜,而说他是“愚蠢”与“盲目”的总统。亚当斯则回击他,在议会致辞中大谈尊重、礼节的重要性。麦克利还因为亚当斯要求显赫的王权而嘲弄他“浅薄的高贵”与“可鄙”。麦克利说,亚当斯的“自负、倔强与愚蠢等同于他自己的虚荣心”,他还借助于盘旋在欧洲王室腐朽走廊里的某种力量警告美国人民说“一个法官的政党”正在美国形成。而历史学家查理斯·彼尔德把麦克利描绘成一个“最初支持杰斐逊的民主主义者”。

“国王的权威”这个词开始与亚当斯结合在一起,当他从英国——一个极度崇拜君主与法院特权的国家——回来时,给人的这种印象就更深刻了。杰斐逊在他的颇为流行的记录中,描绘了他对亚当斯的印象:

亚当斯起初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他出使英国时，王权与贵族的炫目使得他相信它们的魅力，认为它们是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谢斯的叛乱，亦证明了人的欲望与压制的缺乏，不足以保证秩序的稳定。他的那本关于宪法的书，使我们了解了他的政治偏见。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心被那些拥护君主制的联邦主义者所占据，而当他回到美国时，他又相信市民的总体倾向是支持君主制的。他还写了《关于达维拉斯的谈话》，作为对前面那本书的补充说明。后来他又被选举为美国总统，这使得他更固守着自己的“错误”。数不清的、狡猾的、殷勤的谄媚扑向他，使得他相信，他正处于威望的顶峰，而这时海水正悄悄地淹过他的双足，进而吞噬他的追随者们。所以当华盛顿引退时，那些一直受他的诚实、坚定、爱国与权威限制的盲目而狂热的君主主义者，登上议会的汽车，如同坐在太阳神之子费顿的马车上，开始无拘无束地、急促地、冲动地、狂野地向前奔驰。他们既不去关注左方，亦不去关注右方，除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其他的任何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相关的。直到最后，他们的丑态完全暴露，人民的眼睛开始睁大并明白过来时，于是把他们驱逐出公众议会的事情就发生了。

这段描述让我们不能不思考杰斐逊眼中的亚当斯。更为重要的，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这也是第一次对“红色恐慌”叛乱的表述。在 18 世纪，美国历史已经见证了几次大的革命了，所以美国人民开始有了这样的印象：许多外交家与知识分子都是国外革命战争的代理人。在前面的文章中，杰斐逊确实提供了一

种深谋远虑的见解 亚当斯及其联邦主义者政党,没有必要恐惧谢斯的叛乱,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欲望与压制”,就不会有革命的发生。但是,杰斐逊担心的是自己。如果亚当斯及其政党总是处在权力的位置,那么就一定会有对立的革命发生了。更为糟糕的是,虽然 1776年美国没有贵族统治与君主制的基础,但是 1787年之后,那些盲目的人却正试图偷偷将其引入美国国家机构。亚当斯认为自己是共和制在美国存在发展的原因,杰斐逊则认为正是亚当斯颠覆了共和制。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反对派政治活动突入低潮

亚当斯的批评者们拜读过他在 1785年到 1789年间的政治著作吗?这颇令人感到怀疑。但是,后来的弗吉尼亚人约翰·泰勒确实做到了,而且还与亚当斯进行过激动人心的谈话。很可能,杰斐逊不想费心去引用信中的一些东西,也可能他从来都没有读过那些信件。实际上,亚当斯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即将来临的 1789年革命时期的法国比在美国要流行多了。当时的一部分法国人,十分欣赏那些由亚当斯领导的亲英分子们,并希望英国的政治机构能作为他们的模范榜样。虽然,亚当斯不时地向杰斐逊保证,他绝没有向美国引进贵族统治与君主专制的意思,杰斐逊还是拒绝相信他,不管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确信亚当斯怀有危险的想法。实际上,杰斐逊提示到,由于英国“炫目”的王权结构迷惑了亚当斯,所以,不管亚当斯的主观目的何在,客观上亚当斯是一个深受非美国的思想与机构迷惑的人,是激情罪恶的牺牲品。也可能,亚当斯仅仅是受到了迷惑,但是他确实是对杰斐逊的威胁。当杰斐逊说最后“人民的眼睛终于

辨明是非”，亚当斯及其联邦党彻底解散的事情发生了，这也预示着美国人民终将转而承认杰斐逊，因为只有他才是乔治·华盛顿的继承人，只有他才是国家的救世主。

实际上，正如我们想的那样，1796年的大选与以往颇为相似，尽管杰斐逊说亚当斯及其守旧的联邦党正是美国的一个威胁，新生的共和政体还是采用了亚当斯的大部分政策，这真令人奇怪。更为奇怪的是，杰斐逊把亚当斯描绘为一个如果他的君主体系衰落将一无所有的人，描绘为一个驾驶着罗马传说中太阳神之子费顿马车的人，并且他的马车将要失去控制了。他认为美国人民从总体上来说，一直是反对君主宪制的，人们需要从亚当斯的魔咒中醒来，要意识到亚当斯及其政府的“目标”与“目的”所在。既然杰斐逊及其政党最终不想私占亚当斯及其政党的位置，只是想否定它们的敌对党，那么他们的马车又将驶往何方呢？

这一时期，关于美国总统制度的起源问题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就要揭晓答案了，所以这一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杰斐逊的策略是揭示秘密。他把亚当斯说成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而他杰斐逊则是一个消除颠覆者并把国家从颠覆者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唯一没有提及的是他自己的野心所在。他渴求总统职位，如同亚当斯副总统一样。总统职位的竞选，似乎天生就是以牙还牙的游戏，两个竞争的对手为了相同的目标而追逐。这时，制造分歧、掩盖权力的斗争，就是他们打败对方的权宜之计了。一旦赢得胜利，所有的分歧都不再重要，这也正如杰斐逊为了安慰美国人民力求否认他和亚当斯的分歧一样。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杰斐逊说道：“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也都是联邦主义者。”创造出冲突的假象，只是为了进一步确认他们的一致，这就

是美国政治的本质所在。

美国政党政治一开始就是外强中干的,所以它必然以一种平凡而陈腐的方式结束。那些许诺来个气候大变、轰轰烈烈的选举战,最终却又埋在每天琐碎的政治生活之中。当选举结束时,以前的敌人就会变成我们的朋友,对立的力量之间真正的战争在最后却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应该提及的是,亚当斯及其联邦主义者,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都使得美国的政治历史有了虚假的记录,他们都应为此负责任。因为如果共和党人宣称看到的都是全体一致与处处和谐,联邦党人则一定会宣称看到的是冲突与争执。直到阿列克斯·迪·托克维尔于19世纪30年代来到美国,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发表,才使美国人民意识到了所有的党派斗争都是起源于错误的僭越或者假定罢了。共和党人很少想到无限制的民主政府会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而联邦党人永远也不会理解他们的“混合”政府体制与平衡思想,在美国这样一个同质政治文化的国家,是不会有立足的。杰斐逊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使人民受扰,他们就会是品德高尚的人。而亚当斯则认为,“政府的运作”对于形成人民的高尚品德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两人又都假设将来人民的自由或者依赖于人民的意志,或者依赖于政府的运作。半个世纪后,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民不是高尚的,但他们是自由的。”托克维尔向美国人民指出亚当斯与杰斐逊都没有理解的东西:一个跨越历史上封建制度的国家,一个既无贵族阶级也无无产阶级的国家,一个不需要革命锤炼与人民抵抗的单一国家,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封建制度的复辟或者他们自身的财产被掠夺损害。杰斐逊与亚当斯看到的都是冲突的一面:前者是以多数人反对少数人,而后者则是少数人反对多数人;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民主及

其欲望,另一方面则是财产及其要求。托克维尔还指出,能解释美国历史的,不是冲突而是总体上的同意。财产的安全、机会平等与天赋人权都是美国人民所共同享有的。共和制度不会对财产权有什么威胁,这也正是亚当斯担心的,而财产继承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这是杰斐逊害怕的。只有当托克维尔来到美国后,才使美国人不再指望着欧洲,才意识到美国在摆脱旧世界的恐惧方面是卓越的、超群的。

顺便提一下,作为政治哲学的一派,杰斐逊主义给美国提供了许多自由与天赋人权方面的东西。然而,作为牵涉到选举政治的一种现象,杰斐逊主义是由野心的推动、欲望的不满足而产生的。我们应该记得,那些弗吉尼亚人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真正的创立者,是他们引导着美国走过艰苦的革命时期。其中,帕特里克·亨利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印花税法》,帕特·伦道夫领导过大陆会议,华盛顿是大陆军总司令,而杰斐逊则起草了《独立宣言》,所以亚当斯的可能当选会危及弗吉尼亚人作为开国先锋的重要地位。

尽管那时杰斐逊坚决否认,近来的许多研究还是证明了他曾经偷偷地散布谣言,雇用记者揭露亚当斯的污点,反击亚当斯。后来的几年里,在与亚当斯长期的通信过程中,杰斐逊向亚当斯及阿比盖尔保证,他从来没有在背后搞欺骗活动。实际上,这种党派的斗争早在华盛顿当政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杰斐逊与麦迪逊深信他们伟大的华盛顿将军已经让汉弥尔顿与亚当斯利用了,而这两个人的财政政策与民族权威或许正在毁灭战争时期的许多正确原则。杰斐逊还利用政府的资金,雇用诗人记者菲利普·佛里诺,利用他的《全国公报》攻击亚当斯及其联邦党不忠于美国,说正是出使过英国的亚当斯的回国,使得美国陷入了

君主制的灾难之中。

鉴于杰斐逊对亚当斯的不信任,我们也可以想一下,这个弗吉尼亚人伪善的民主是否也曾用来掩盖他自己的贵族气质呢?毕竟,他的种植园环境,会使他呼吸过上等社会闲暇阶级的空气。历史学家爱德华·强尼说道:“奴隶制度的发展,使得南方的农场主发展成为达官贵人,白人的贵族阶级以其富裕与强大,形成了寡头政治——‘弗吉尼亚的贵族统治’。”

在 1792 年的竞选时期,杰斐逊致信给亚当斯以感谢他的那本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但是,那是本关于政治的书。”杰斐逊解释自己为什么对那本书没有任何兴趣,“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政治这门学科,现在是愈加反对了。”早些时候,当法国革命爆发时,有人问杰斐逊有关他对自己的政党是否忠诚的问题,他在一封私人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拥有了政党,我可以不去天堂,我一点也不想去那里。”上帝是一回事,当总统则是另一件事,杰斐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组织一个政党,把亚当斯从总统职位上拉下来。杰斐逊相信民主制,推崇公开,相信大众意见的融合,他还宣告说:“人们意见的不同,如同人们面孔的不同,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应该如同看待不同面孔一样看待不同意见。”但是,一提及政治,杰斐逊就忘了他自己的宣言了,不但不去忍受不同的意见,而且还将距离拉大。他还支持 1792 年联邦主义者的宪章,但是亚当斯上台后,他开始说服自己,美国再也不能作为一个共和国而存在,必须组织力量反对这种管理,这是他——杰斐逊——的责任。虽然杰斐逊相信民主制度,但是他又不开公开地讨论问题,而是躲在幕后操作。“我的助手,”他在一封给弗吉尼亚人约翰·泰勒的信中补充说,“我很有必要警告你,别让我那些私人的东西出现在公众面前。”亚当斯一贯支持行政权的首

要地位,这也是杰斐逊心中一直隐瞒而又害怕的东西。美国的议会能保证国家政府的共和机制,那么政府的形式又如何呢?在同一封信中,也就是在那封他宁愿选择不去天堂而要选择组织政党的信中,杰斐逊说道,不能对“这位看上去想永远再度当选的总统”毫无限制。

对于亚当斯当选美国总统,杰斐逊内心感到焦急压抑,但在公众面前他又极力否认。他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对于谁会反对亚当斯成为第二届总统,我毫无感觉。在生活中,我就低他一等。在议会中我低他一等。在外交中,他还是高于我。后来在民主政府中,情况还是如此。”他在 1793 年告诉爱尔布莱蒂·盖瑞说:“第二届总统的任职是轻松而又受人尊敬的,然而第一届总统时期,除了悲壮与苦难之外,别无所有。”他向盖瑞抱怨说,汉弥尔顿主义者正在传播有关他的“阴谋诡计”。“当我们去怀疑被怀疑的东西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能离间原本诚挚友善的快乐。我禁不住去想,让亚当斯去相信我头脑中关于政府的想法如同现实的一样是不可能的。他也许认为,我把他看成了我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一年之中,杰斐逊一直如此看待亚当斯,直到亚当斯总统任职结束之后。杰斐逊的当选,使得他认为只有他才是美国革命的最终守护人。“1793 年我们与保王党的斗争同 1792 年反对联邦主义者的斗争,二者在实际上并无不同,只是冠以不同的名义罢了。”在亚当斯总统任职期间,杰斐逊向欧洲保证,他正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着他们的战争。“它会令你狂热,”他在 1793 年写给菲利普·马克的信中写道,“我向你提及的那些走向异端的变节者们,那些在议会中的所罗门(古代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编者注)和这块土地上的参孙(《圣经》中的人物,以身强有力著称。——编者注),现在

他们却都被英国的妓女砍下了头颅。”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统,不仅需要治理有方,而且要清楚地知道是谁在妨碍你、反对你。亚当斯做到了吗?他应该做到的。亚当斯自己也在思索该怎样看待那些“贵族气质的爱好者们”,因为他们也是狡猾而又受压抑的。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不想去面对那些驱使他们步入阴谋与欺诈陷阱的东西。亚当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通过这些例子写道:“每前进一步,野心就膨胀一步,直到最后占据了整个的灵魂。这时人们再也看不到世界上对他人或自己重要的东西,他们的眼中只有目的了。”这时这样的诸多人组成了一个“奇特的投机队伍”,而对于这些自负的贵族来说,他们自己就是“美德、精明与慈善的化身”,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的组织拥有寡头政治的倾向。“他们把狡猾隐藏起来,在他人即使自己面前也需要伪装,耐心等待一直期待的机会来临。”这些人以及少数善于伪装的人使亚当斯坚信,所谓的贵族是不能信任的,必须要控制他们才行。然而,杰斐逊却把亚当斯看成是一个贵族统治与君主主义的结合者。

当人们去思考亚当斯作为一个人类行为方面的心理学家的洞察力及其自身的行为时,我们就有些迷惑不解了。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当某些人去追逐权力时,总是给自己找到最为慈善的动机,然而当他站在杰斐逊及其反对党面前时,还是茫然无助。在他的著作中,亚当斯清楚地知晓竞争政治的本质:“对于每一个政党来说,通过最基础的行动、邪恶的事件与聪明但充满邪恶的头脑,不去过多地考虑或关心到底有没有真理与证据,或者肤色等方面的因素,来支持自己对于其他政党领袖的控告指责,是很普遍的行为。”然而,当亚当斯看到共和国的反对者及其挑衅行为时,还是感到吃惊乃至深深地受伤害。尽管他自己的政党

也有类似的行为,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屈尊发动类似的挑衅与争斗。

如果杰斐逊自己及亚当斯的批评者们对亚当斯的指责是正确的,那么证据应该就在亚当斯的著作中(现在将会被仔细地研究)。对亚当斯伟大的政治理论著作的批评,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关于政治著作的误解。

第三章 有先见之明的总统

“令人悲伤的沉思”

约翰·亚当斯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宪法的革命就不能成功。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前的几个月，在写给詹姆斯·华伦的一封信中，亚当斯说，对于很多美国人不愿意脱离英国独立他并不感到奇怪。“在人的头脑中，一切巨大的变化都是令人厌烦的，更何况这种变化还伴随有巨大的危险与不确定因素。没有人能预知事情的结局。”他警告说，他担心战争的后果。“我们用自由和令我们满意的政府来安慰自己，但这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政府不会令大家都高兴，上帝准许他们这样安排。但是我害怕议员也会接受这种嘈杂的而非意志坚定的，平庸的而非伟大的，无知的而非博学的，胆小的而非崇高的影响。”在一条安静的乡间小路上，亚当斯偶然遇到了一个“骑士”，也就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无产者：

他总是官司缠身，经常被起诉。他一见到我，就跑了过来。他的第一句致词就是：“哦，亚当斯先生，您和您的同事们为我们做了多大的善事啊！我们感激不尽。现在这个州已经没有公正的法庭了，将来也没有！”……这就是我为之

辛苦辩护的结果吗？我自言自语道。我独自骑着马思考着，没有回答这个不幸之人的问题。这是一类人的情绪吗？在国内他们有多少人？据我所知有一半——在国内，至少有一半国民是债务人，并且在全国都弥漫着债务人的情绪。如果国家采取一定的办法，涉入此类问题，就会有巨大的危险，我们牺牲掉我们的时间、健康和所有东西，成效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行为与精神，否则我们将会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后悔。然而，由于我自己信念的原因，伟大民众中的大多数人的良好感觉与诚实正直，占据了我的心，幸而还有来自上天保佑这一最终的安慰。这就是令人忧郁沉思的原因，随后的时间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亚当斯由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立宪的悲观主义者，一个认为即使自身的自由都需要限制的人。但是那些联邦党的批评者，指责亚当斯拥护一种仅仅保护精英的政治制度，所以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二届总统被人们看成是一个不忠于“~~1776~~1776年精神”的人，一个不忠于共和国的人。杰斐逊坚持说，在亚当斯的著作中发现了不少关于他的贵族与君主主义倾向的证据。是这样吗？

约翰·亚当斯的第一部著作，《为美国宪法辩护》一书中就有此类的问题。~~1788~~1788年 猿月 10日，安尼·罗伯特·~~1788~~杜尔哥写给德·理查德医生一封信，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几年前，亚当斯曾经与路易十六的前财政部长杜尔哥共同进过餐。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杜尔哥得知美国的新宪法后，由于满心的不耐烦与迷惑而发怒了。为什么要采用一个权力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复杂机构？为什么要采用一个分为上、下两院的议会制？所有庞

大笨重的机构都是不必要的,他抱怨说,既然美国没有国王或贵族阶级,也没有农民或平民阶级,那么为什么需要权力的分配呢?杜尔哥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在法国改革时,一切努力都被议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所阻止。他与其他法兰西的批评者们都认为,一个“混合”的政府,不过是英国旧体制的错误复制罢了。亚当斯的另一个反对者,18世纪的英国新闻记者和政治哲学家马查蒙特·奈德哈姆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能代表所有阶级的单一的国会权力机构,这样可以消除不同阶级的差异。而托格特也是这样认为的。

很快,亚当斯收到了法国宪法理论家阿贝·迪·马布利的源封来信,催促他支持所有能给美国人民“带来和平与幸福的事情”,并且为了纪念苑月源日,要组织国庆节与军队阅兵式。确切地说,马布利是要求亚当斯庆祝一个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一种团结的精神、爱国主义、对法律的崇拜、对宗教的虔诚与全社会的团结协作,庆祝在设想宪法时无论是亚当斯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想清楚的良好构思。

亚当斯对那些批评美国政治体系的欧洲人的答复始于1788年三卷本的《为美国宪法辩护》,这部书是在两年后也就是1790年完成的。亚当斯创作速度很快,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许多读者都无法理解这部著作。不过不用奇怪。书籍的作者是一个遵从古典作家却又与他们相差甚远的人。这部书格调凝重、委婉,写得很潦草,断断续续,没有说明与过渡。它是一本关于西方政治哲学自由联想的朦胧之作,读起来就像是一位在深夜自言自语的思考者所写的意识流似的东西。

现在,用亚历山大·波普的一句话来形容亚当斯结构复杂的政治著作大厦,就是:

自然界的多样性促成了自然的和平共处。

多么令人惊奇！今天，在美国的多元文化政治环境中，差异与多样性是强调的重点。原因是政治上沉闷的千篇一律与毫无二致意味着权力的专横。在亚当斯所处的 18 世纪，法国的革命者为了解放的胜利，总是力求为相同辩护，而压抑分歧。设想的根据是一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分权的政治体制，这会使得贵族统治的旧秩序永久存在下去。亚当斯与其他联邦主义者一样，是第一批以多样性而非一致统一为自由标准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因为在他们眼里，正是自然界的多样性保证了自然的和平共处。

古典的共和主义的思想绝不会欣赏多样化的原则。虽然亚里士多德把社会分成了富人、穷人与“中产者”，亚当斯却发现他的政治理论是“不人道的”与“残忍的”，因为在他所设想的机构中，排除了“勤俭的人、商人与买卖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追求没有成功，亚当斯推测原因在于意大利的贵族支配了政治生活的每一部分。而《佛罗伦萨史》的作者马基雅维利则设想，把富人、受过教育的人与杰出的鉴赏家都吸收到总督府的一般代表机构之中。亚当斯则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做到使权力分属到不同的代表机构中，并保证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当民主制试图以其数量上的优势压倒富人与精英时，封建制也在利用它特有的经验和狡猾的优势来压倒普通的群众。亚当斯一面忙于应对傲慢的封建主义的攻击，一面忙于应付民主倾向引起的暴怒与无序状态，但是多数人的自由必然还是依赖于对少数人的控制。亚当斯希望把美国的贵族请到一个小房间中，这也正如他提出的“一次礼貌的放逐”，其

他的人“可能希望从这种行动中得到好处,而没有必要畏惧什么情感”。亚当斯对于两院制与最终在美国建立参议院的辩护,是以他的希望为基础的。亚当斯应该孤立贵族阶级,这绝对优于将他们置于监视与控制之中。

那时,亚当斯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吗?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援引“君权神授”此类的陈腐信条作为其行动的依据。相反,他强调,“人民才是所有权力与权威原始的无限的源泉,无论是在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部门”。在历史上,一个精明的君主懂得协调富人与穷人之间、狡猾的少数人与盲从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知晓后者经常被前者所利用。亚当斯据此认为,现代的行政机关应发挥作用防止参议院的优秀分子“吞没”掉众议院中受教育较少的议员。在《为美国宪法辩护》中,根本找不到为绝对君主制与世袭君主制辩护的内容,哪怕是一章。而英国人马查莫蒙特·奈德哈姆则“在全世界继续寻找君主制的典型”,以教育人们理解“绝对世袭君主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是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政府体制并不热心,去关心和支持国王与王后的荣誉不是他们的义务”。

亚当斯的《关于达维拉的谈话》出版于1794年,那时他刚刚成为副总统不久,而他的批评者们把这本书描绘为一个君主主义者的独白。这本书确实把君主王室描绘为一种社会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一个民主共和的时代,人们还是挤在伦敦街道的两旁,注视国王与王后的銮舆的经过。“一个著名的血统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一滴王室的血液,即使是私生子,也会使每一个男人女人自豪或自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它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慨与忌妒,但是它也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目

光。一个贵族的血统，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后来授予的，在民主主义国家比在君主制国家中更受关注，这也许是出于以上相同的原因吧。”人们出于情感上的需要，去赞誉那些他们认为值得尊敬、好奇甚至妒忌的贵族。正如亚当斯预料的，名字、名誉就是一切，这些人是否真实地存在，他们的品质又如何，都成为次要的东西。亚当斯说道：“父亲遗传给儿子的那种血统的民族优越感，一代比一代强，儿子在这方面是强于父亲的。”亚当斯好像是与我们同时代的、一个生活在过去的现代主义者，他指出，我们是对标志与代表敏感，对他们的名字与知名度敏感，而不是对他们本人敏感。美国可能没有王室成员，但是它会有一个洛克菲勒集团。亚当斯似乎这样说过：“他的名字通常是比一个头衔、一枚勋章、一条缎带更为显赫的荣誉。这会使得许多人为之自豪，也会使许多人羡慕他的显赫身世。这种得意就像对拥有金钱的优越感一样，再没有比这更荒谬与更可鄙的了。”

那些指责亚当斯拥护君主制的人，根本不考虑他在《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真正要解释的是什么。毕竟，美国的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对英国王室的忠诚，直至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直到这时他们才把自己定义为共和主义者。但是亚当斯所说的确实是一种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的共同情感，一种像赶超、忌妒、奉承、承认、认可那样的冲动，是对礼服、珠宝、盛大隆重的场面和仪式的共同呼声：

是否曾经有一个民族比罗马人更了解人性，是否曾经有一个民族能更好地利用体谅、祝贺和诸如此类的热爱情感？……环境的差别和年龄的差异都是由不同的穿着所造成的……象牙椅；罗马的执法吏；……黄金或象牙的王冠、

花环；……他们的演说；他们的胜利；宗教、政府、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了炫耀、表现与庆祝。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引起市民的仿效，所有事情都被用来引起注意，引起思考，以及激起人民的祝贺热情。根据他们的长处而把他们的内心依附于市民个人，根据他们的等级、社会地位和对国家的重要性把他们的内心依附于法律规定者、地方法官和大法官。这正是共和制的基本精神所在，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没有保持法律秩序的一贯方法，也没有获得对法律无条件服从的一般方法。

无论是在君主制度下，还是在共和制度下，政治都以引起公众的注意为生，无论是靠一次游行，还是一次新闻发布会，或者是靠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一次“伪造事件”或一个无可奉告的新闻秘书所作的预先声明。

除了批评美国关于平衡与统治的延展机制的新生政治体制外，法国人还提出美国宪法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过多地关注缺乏的而非现有的东西。批评者们说道：“美德在哪里？”如果想要没有君主的政治统治，人民和统治者都必需有民主的美德，并且很乐意把他们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建构良好的公共政治中去。美国宪法的创立者们开始犹豫不决了。汉弥尔顿指出，现代的商业与企业的能量可以取代旧有的美德原则；麦迪逊也认为政治的过程必须“改善”与“填充”选民的意见，以便指导他们追求更高尚的东西，而非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但是亚当斯的阵营是孤立唯一的。他开始相信那种古典的美德在当今的年代不仅实现不了，而且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虽然过去的哲学家们为此大声疾

呼过。

在《为美国宪法辩护》中，亚当斯阐述了美德的所有含义：罗马式的勇气与刚毅的理想，古代的精明、公平、节制与坚韧的原则，还包括基督教“更加崇高”的观念，以及亚当斯所说的乔纳森·爱德华的喀尔教徒的“普遍的仁慈与高尚”的准绳。在所有的美德的含义中，最让亚当斯迷惑不解的是孟德斯鸠的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私人利益的观念。人类可以战胜自己天然的追求私利的倾向，而进步到一种孟德斯鸠“否认自我”的状态，这样的想法在亚当斯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如果公众的美德必须是不包含贪婪的，那么你能找到任何曾经存在过公众美德的年代或者国家吗？”

亚当斯关于启蒙的评论

亚当斯的关于政治哲学的思考代表了美国启蒙时代的最为深入的思想，也可能是“反启蒙”的思想，因为《为美国宪法辩护》一书对于欧洲人提出了挑战。在现代史上，有三种对美国宪法（启蒙思想融入在其中）的非难。它的第一个控告者是法国人，他们说抑制与制衡对于逃脱了旧世界社会环境的美国来说，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责难来自新英格兰的先验哲学家与诗人，他们抱怨说美国的宪法是“自己取代自己的机器”，不仅使自身失去了活力，而且使得活跃的头脑与智力毫无立足之地。第三个批评是由我们当代的后结构主义与自建构者提出的，认为美国的所谓启蒙思想家，包括亚当斯，给予理性太多的信任，却忽略了威胁理性的现实力量。

乍一看，与亚当斯同时代的批评家们对于美国及美国的团

结氛围的审视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美国确实是一个有统一舆论的民族,这一点阿列克斯·迪·托克维尔在他的《18世纪美国年代的美国游记》中提及过。当他从美国回到法国时,他深信美国的宪法是以谬论为基础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因为美国政府是一个混合政府却又缺乏旧世界中的混合机制。亚当斯则坚持认为政治有三种权力情形:一种是唯一的君主制或行政权,一种是少数的贵族统治,另一种则是多数的民主统治,这三种情形相互制约并力求实现平衡。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分歧不是因为民主制的原因。“我们的意见出奇的一致,”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多数的民主应该有一个完全公平与完美的代表。你担忧的是君主制,我担忧的则是贵族统治。所以我希望能给予总统更多的权力,议会的权力则应该少一些。”亚当斯担心议会拥有批准行政官员任命的权力,杰斐逊则害怕亚当斯总统会获得连任,或者让自己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继任总统,这也是一个攻击约翰·亚当斯的谣言。在一定程度上,以上这种明晰的阶级划分,在美国这样一个同质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是永远不会有立足之地的,所以亚当斯设计的计划是有错误的。那么法国的批评家们是正确的吗?他们设想的阶级体系是以一定程度的社会冲突为基础的,但那与亚当斯关于现实的观点也相差甚远。为了理解亚当斯总统的独特想法,我们下面将思考三位欧洲思想家的想法。

正如亚当斯清楚知晓的令人深思的假定一样,马基雅维利说道,如果意大利的贵族们对那些已有并限制了他们掠夺本质的情况,采取的是安于现状的态度,那么在意大利,再也不会有人把他们当作敌人了。几个世纪以后,卡尔·马克思又假设说,如果工人阶级境况悲惨,他们缺乏的东西也总是得不到满足,那

么他们就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并消除掉压迫他们的阶级。托克维尔提醒道,但是美国人民没有必要担心马基雅维利与马克思的论断,因为在美国既没有不安分的贵族,也没有好斗的无产阶级。简而言之,马基雅维利、马克思与托克维尔都认为冲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没有社会各阶级的冲突,剩下的就只有全民的普遍统一了。所以,为什么要去担心阶级的冲突呢?在美国根本就没有阶级的体系啊。

亚当斯认为,冲突与阶级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与人性的冲动、焦虑,以及贯穿历史的作为强权政治要素的人类返祖特性颇有关系。亚当斯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也就是无止境的欲望的不满足,终会导致激怒与反抗。但是,当他读到马基雅维利宣布说,佛罗伦萨人民已经从根源上摆脱了冲突时,他还是如同一头美洲猎豹似的爆发出来。在佛罗伦萨,“再也不会未来冲突的种子了”,马基雅维利这样写道。亚当斯则狂爆地回击说:“没有种子!任何人都不能歼灭冲突的种子,所有的种子依然生机勃勃地存活着。因为种子长在人的心里。”

冲突不仅是源于社会的一种现象,而且还源于人类的灵魂。灵魂作为原始罪恶的结果,总是在试图分解自己。也许亚当斯至死也不会确认上帝的存在以及来世的状况,但是他和现在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及理霍德·尼布尔一样,把权力欲望与自我扩张看作是人类固有的与天生的本性。在亚当斯年轻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人类的自欺》一文中,他认为人是一种理性化的动物,其意图与冲动来源于人的本性而非私心。人类事务中产生的冲突,与阶级体系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地源于道德腐化与堕落,更多地植根于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政治的结构。

亚当斯在他的《为美国宪法辩护》中,还考察了诸如马基雅

维利之类的思想家对哲学论文的曲解。马基雅维利仅仅是满足了佛罗伦萨市民的虚荣心,而不去告诉他们关于自身的真理。杰斐逊也与此类同,他只需使美国人民相信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子民”就可以了,并且他的共和主义者的行为亦坚定了他对“市民终极的良知与美德的信任”。而亚当斯则力图把美国人民从恭维的诱惑中唤醒,因为那些包围他们的言辞只是别人试图征服并控制他们的第一步。在杰斐逊时代的美国,民主竟然向唯心主义名义下的欲望妥协。尼布尔则说道:“正是这种向非理性唯心主义的渗透,才建立起了尼采与古典的基督教精神的亲密关系。”由于对黑暗生活悲剧性的展望,冲突被认为是难以避免的,而罪恶则是可以赦免与拯救的。亚当斯对古典思想的批判开创了基督教的美好前景。

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生活在杰斐逊的民主时代,那时学校中流行的是为许多新英格兰的诗人与哲学家所欢迎的先验哲学。先验哲学的著作家有拉尔夫·华尔多·爱默森与亨利·大卫·梭罗,他们都感到自己与亚当斯总统付出诸多努力维护的美国宪法离得很遥远。值得回忆的是,那些联邦主义的权威在美国宪法中并没有给知识分子留出地方。诗人与哲学家不仅感到自己被拒之门外,同时还疑惑为什么一种以机械论为基础的政治体系,尤其是一种以不信任与怀疑为基础的体系,能够产生出道义与美德。对此,亚当斯在他的三卷本《为美国宪法辩护》的结论中曾经论述过。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快乐,不管是在专制的还是在民主的制度下,不管是在奴隶制还是自由制度中,如果没有道德,永远也追寻不到快乐。”但是他又建议说,美德,只有在受控制的政治体系中才能发展,这又与那些诗人与哲学家的想法相距甚远了。“最好的共和制应该是人们的

道德都高尚的制度,历史上也一直如此。我们可以冒险作出一种假设:美德也许是良好秩序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也许我们无法证明共和制不能在拦路抢劫的强盗中实施,但也许,随着斗争的进行,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那些无赖自己也会成为诚实高尚的人。”

约翰·亚当斯还提及了对于美国宪法与启蒙哲学的第三种批评。许多人都认为,启蒙的思想家给予理性太多的信任,对于世界现实力量的关注却不够。正如批评家指责的,通过这样的假想,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们指望通过知识的增加来摘下权力的神秘面纱。知识,只有理性的获得,在自由的没有强制的状态下接受,才是真正的知识。亚当斯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恰恰相反,亚当斯被证明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思想家,他坚信知识的启蒙与拯救不是必要的。知识的增加可能会带来科学的进步,但是不会使人类总体的道德进程加快。实际上,知识快速地扩展了人性的瑕疵,加剧了人类的缺陷。“难道知识的增加不会加剧人们的竞争吗?难道知识的普及不会加剧人们的对抗吗?知识的出现,不会使得人们对于政治控制的需求降低。“随物科学、艺术、文学的进步,难道会发现雄心、贪婪或者对名望的渴求并不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吗?杰斐逊与其他的许多法国哲学家们确实相信人的激情最终受制于理智,科学知识最终会促进社会道德教育。但是,亚当斯搜索了过去历史的记录,对这个颇有希望的期待提出了质疑:

因为他们广博的知识,西塞罗就可以少一些虚荣心吗?
或者恺撒可以少一些野心吗?普鲁士国王的个人野心比其他人少吗?理性可以消灭或降低激情的程度,但是在头脑

中,理性与激情并没有什么联系。有时候,又是恰恰相反的,通过锻炼,二者的力量都可以得到增强。庞培时代的罗马人比马麦尔斯时代的罗马人更缺少激情吗?今天的英国人比都铎王朝统治下的人民稳健很多吗?因为法师们的无所不知,他们的激情就被削弱了吗?难道妒忌、羡慕、憎恶、怨恨、报复,还有竞争、野心与怨恨的情绪只存在于王室国家的殿堂上吗?在天主教卡迈尔派的修女身上就不存在此类的细胞了吗?去巴黎看看吧——你觉得那里的人民如何?是联合的、友好的、协调的、谦虚的、卑微的、适度的,还是和善的、相互忍让的?他们会承认别人的才能优于自己吗?他们热衷于鼓励天才的成长吗?问问伏尔泰、卢梭、马孟泰尔与马布利吧。

什么,在美国没有差别!

上述的文章摘自亚当斯的《关于达维拉的谈话》,这是 1792 年亚当斯将要成为美国副总统时写的,并在第二年出版。亚当斯的这本书,是为了回应一位意大利学者写的关于法国民主战争(发生在 18 世纪)一文中的一系列责难而作的。他还把自己的文章看作是“忧郁与乏味的卷本”。亚当斯仔细阅读了那本书中的许多注释,并得出结论说,那位意大利学者,由于遵循着古典的传统,把人的本性看作是一种政治动物,而不是社会的创造物,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一些历史事件。亚当斯特别提到,驱动人的本性的并不是对政治的热爱,而是对社会的所有仪式与习惯的热爱,这也是亚当斯与亚里士多德观点不同的地方。在研究社会的相互作用与人类动机问题时,亚当斯减少了政治理论

的哲学色彩，更多地添加了社会学与心理学方面的东西。亚当斯说，社会才是焦点所在，因为受法国革命威胁的是社会与社会秩序。

杰·原杰奎斯·卢梭是法国革命的幽灵，他是一个哲学家，把自己的缘个孩子弃置在孤儿院，自己却忙于阴谋策动世界的完全变革。那些英裔美国人在思想上早就接受了“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所以从本质上说，没有人天生就有权威去统治其他人，每一个人都有劳动与拥有财产的权利，因为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有自保的本能。卢梭也接受平等的原则，但是他又把存在私有财产与不平等阶级的社会，描绘为原始野蛮社会的偏离，并且怀疑所有权作为促进劳动与进步诱因的作用。随着卢梭意图的展现，法国的革命也在激化，许多贵族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与特权，许多人纷纷攻击、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差异。亚当斯对此最初的回应是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为题出版。在这里，他力图解释的东西与卢梭的人们天然平等的观点恰恰相反。亚当斯指出，因为人民都想超越别人并得到别人的承认，所以社会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阶层。“法国立法议会的朋友们告诉我们，”亚当斯嘲笑地说，“他们已经清除了任何形式的差异与不平等。但是，我亲爱的人民，千万别被蒙骗了。不具备可能性的东西怎能实现呢？难道他们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财产权与分配权吗？他们能使所有男人与女人看起来都一样的优雅、聪明、美丽吗？……他们都能继承他们祖先的所有记忆、荣誉、房子与显赫的战功吗？”

人们对于亚当斯的批评在他的时代就存在着，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指责亚当斯对于美国的新生力量视而不见，依然在思考着旧世界中不平等社会阶层的划分。当美国人民之间再也没有

什么差别时,为什么还要散布不同社会阶层权利的言论呢?当美国人民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而普遍统一时,为什么要去考虑人们的冲突呢?

答案就是,亚当斯认为,美国会重复欧洲那种冲突复杂的社会结构,会产生支持“君主制的”、“贵族统治的”与“民主制”的选民,这些选民宁愿要么由君主,要么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或民主选举的领导来统治自己。亚当斯认为这种普遍的“差别热情”在人类社会秩序中是不可抑制的冲动,所以他对美国缺少封建传统和建立贵族统治基础的关注很少。当亚当斯阐述为什么贵族统治不是很令人满意,但又不可避免时,他的反对者们就指控亚当斯是在鼓吹贵族统治。爱国心,古典思想的基本美德,是由自豪的感情发展而来的,所以,美国革命的老兵——组成了辛辛那提的上流社会——不会躲在暗处默默无闻,而最终会享受公众的注视。亚当斯曾经怀疑辛辛那提上流社会是一个目光短浅、追逐利益的派系,但是他逐渐地意识到,正是辛辛那提上流社会与身份相称的自觉行为在为他的心理学理论辩护:

也许有人会说,在美国我们根本没有阶级的差别,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产生于阶级差别的区分与争论了,但是,我们难道没有苦力、自耕农、绅士与乡绅吗?……这些划分难道是由法律赋予的吗?难道不是由第一批到达这里的殖民者祖先们设立的吗?这些区分不也如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诸如头衔、嘉奖、勋章与缎带之类的东西,是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与追求吗?……也许我们会把追求此类东西的激情看作是幼稚与愚蠢的,这是此类东西的创立者造成的,但无疑却是为了聪明的目的……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些法律的区

分,如头衔、权力与特权是不能继承的。通过辛辛那提的上流社会,也许我们会看出这些人为的区分安排,在美国又是颇为热烈的。在世界的历史与宇宙的本质,再也不会有像这种秩序这样显著的现象了。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自愿地参加到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军队长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亦是因为人民的团体是一切力量与荣誉的源泉。

亚当斯对于法国的启蒙者以自由、平等、博爱取代权威、特权、敌对的信条没有什么好感和耐心。相反,他开始接触苏格兰的启蒙者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他们两个人对于政治美德是怎么维持的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注重的是,财富是怎么创造的,自由在经济市场出现后是怎么维持的。亚当斯开始求助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以弄清行为怎么由社会推动的问题。但是当亚当·斯密放弃旧有政治美德的观念,在写作政治经济著作时,他又竭力证明哲学的推动作用。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希望,利己主义的诱惑不会使世界丢掉良知与道德的行为。与怀疑者休谟不同,亚当·斯密依然相信基督教徒的感受力,并且希望人们的“自制”能力会把社会从商业的腐化堕落中拯救出来。在亚当斯看来,不能相信人的自制能力,因为自制归属于自我,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拯救社会的只有构造合理的政治机制。“罗马的教训,”亚当斯写道,“使我们怀疑商业会使人的行为堕落。”亚当斯赞同休谟的观点,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的进步,而古代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太严酷了。斯巴达人的政府确实窒息了自由的生命力,而不是促进了它的茁壮成长。亚当·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会促进国家财富的增加,进而由于人类的道德感情,使得公平成为可能。但是困惑的亚当斯相信,现代的民主制度

是以消费的方式满足人的欲望。在“后期的战争中”，亚当斯以附注的方式提到了独立战争，说美国人民正在为消费大量金钱而兴奋，“没有一点点的节约、远见，就盲目地追求更奢侈豪华的生活，再也不要过一百年前那种小心翼翼节省钱财的日子了”。亚当斯以其令人惊奇的远见卓识，预见到美国正在日益变成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

自由人是所有人中最易沉湎于奢华的人，因为他们享有的平等、夸耀的民主激起的感情，使得他们急急忙忙投入奢华的怀抱。一个市民察觉到他的同伴，一个曾经与他平等的人，有比他更好的大衣或帽子，更好的马房；看到他的邻居都被同伴所打动，并因此而尊敬他；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必须与同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像此类的竞争出现在左邻右舍，冲击着每个家庭，在农夫中、工人中，以及在公爵与侯爵和更多的人中——这些人几乎都打扮得一样，并且难以区分，除非通过其他的记号。反对奢侈、富裕与商业的演讲与布道永远不会有太大的效果，即使最严酷的抑制奢侈的法律，都不会取得有效的进展。

引人注目的转变 亚当斯和莎士比亚

亚当斯的政治哲学具有高度的创新性。传统的古典理论认为，君主制需要荣耀来引导，贵族统治需要节制作为导向，而暴政需要有所畏惧，民主需要美德。而亚当斯将政治哲学理论完全颠倒过来了。亚当斯告诉我们，市民会意识到他的同伴的财产，并且人们还会根据他所拥有的财产来对他作出判断，亚当斯

在几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了现代思想家称为“三角渴望”的东西。是由于权威的原因而不是需要的因素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拥有，迫切想要一种东西，仅仅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也想要它，因此这个需要的东西就因不同的主体产生了两种需求。很奇怪，亚当斯竟然成为法国哲学的评论家，因为确切地说，在今天正是法国的思想家勒内·希拉尔德、皮埃尔·布尔迪厄、古格·杜·博尔与贾尔斯·德吕兹将亚当斯最先提出的东西写入法国的传统。他们也在描述着权力的不可避免、欲望的力量、对差异的渴望，描述着嫉妒、等级、对抗、时尚、消费、虚荣、焦虑的存在，社会成了拜物的场所和占有欲的剧场。所有这一切都更坚定了亚当斯的信念，一切东西都变成“引起公众的注意”、“吸引公众的眼球”与“成为符号的语言”的东西。这些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被归入“阶层理论家”中，相信亚当斯也适合这一称号，因为他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认为是民主，而不是凌驾一切的不平等，正在进行着自我复制。比起同时代的思想家，亚当斯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判断敏锐的学者。他预言说，当知识丧失了作用，我们还有权力与权力的效力，所以他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赢得却又逐渐消逝，弦的声音是多么不和谐嘶！多么不和谐！所有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带来敌对的……然后，所有的东西包括它自身又都归于权力。”在 18 世纪，亚当斯就尽力使我们意识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者今天教导我们的东西：民主的存在绝不会解决权力的存在。由于亚当斯讲了实话，所以他的对手指责他是一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

亚当斯在《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大段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喜剧《特罗伊斯与格雷西达》中的段落。在莎士比亚眼里，政治是冷酷而又狡猾的，是姿态优雅而用途不大的，并且社会需要高

低的差别与不同。在莎翁的大多数政治戏剧中,无论是生活在君主制下,还是在共和制里,人们的行为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点亚当斯早就领会到了。他从莎士比亚那里得到的体会,正如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得到的认识那样:在当代政治中,视觉的东西会取代智力的因素,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知道的。

几个世纪以前,马基雅维利认为,“总的来说,人类更多的是用眼睛来判断”,因为“人人都习惯了去观看事物”。他认为,道德高尚的领导者的名声会影响社会。然而,亚当斯却坚信“行为与动机的源泉并不总是清晰的”,有时动机根本看不到,甚至永远是不为人所知的。亚当斯使我们意识到,如果不是动机,那么就是行为的方式会赢得名声。鉴于此,他预料到了现代思想家索尔斯坦·维布兰与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告诉我们的东西——财富、魅力与娱乐——将会互相竞争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人类关系的客观尺度,揭示了仁慈来自于人们对于他人的一种同情感,同情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与利己主义相比,亚当斯更感兴趣的是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因为这是我们所必须依赖的;当我们站在他人的角度想像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时,自我就形成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其他人而非自己成了判断者,政治将由视觉形象形成的公共观点而确定。

在古基督教思想中,人们看不到精神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信任“文字”。即使在亚当斯的时代,许多启蒙思想家,仍把视觉与注视看作是相应的艺术与戏剧,而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更关注的是笔头与口头的东西,政治成了一种思想交流的方式。但是,有了亚当斯,我们就可以处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当代的理论家所称的“大场面社会”,一个注视与被注视的环境。“为什么,”他问道,“为什么人们这么重视个人的美丽与优雅,它

仅仅是一种视觉的乐趣吗？根本不是。对于这种优美的偏好并不是一致的，而对于那些偏爱这种优美的人来说，它也只是一种感觉，不能长久，但是正是这些东西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是它们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亚当斯的预知能力是惊人的。在 1796 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肯尼迪与理查德·尼克松曾有过一系列的争论。许多在广播中听到这场辩论的人都认为，获得胜利的将是尼克松，但是当看了电视的重播后，他们改变了原先的想法，认为应该是肯尼迪获得胜利。所以，美国的公众会“观看”总统辩论，眼睛就是法官与陪审团，结果真的成了“眼见为实”。在人类的关系中，视觉的范围角度是非常广泛的。

在今天美国公众的眼中，约翰·亚当斯是一个可爱又受人欢迎的总统，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总统。作为知识分子，他在法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与尊重。由于亚当斯关于社会清晰秩序的计划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得到实现，所以美国殖民历史的首要权威——戈登·伍德——把亚当斯看作是一个与美国历史不相关的人。肖恩·威伦茨，曾经是一个激进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历史上充满了阶级斗争，现在却转而指责亚当斯是一个相信阶级斗争幽灵的人。但是，正如俄亥俄州的阿瑟·洛夫乔伊几年前提出的那样，亚当斯也预料到了索尔斯坦·维布兰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而且信任维布兰经济学说的人完全能够向亚当斯的批评者指出，虽然美国没有世袭的贵族，但是它有一个悠闲的阶级，他们享受着权利，并在政府与社会当中发挥着作用。也许我们会记得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没有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阶级统治的缺乏，因为下层的社会阶级总是力图超过上层阶级。社

会历史学家与亚当斯相处时感到相当苦恼,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亚当斯却尽力证明权力与服从是“自上而下”的。对亚当斯思想合理性的评定,最终将我们推到了法国革命的主体面前。

“将我们变成野兽” 亚当斯与卢梭、杰斐逊的对抗

1793年,当亚当斯首次听到法国革命爆发的消息时,他就思索着“在一个有 1 亿 5 千万无神论者”的国家将会发生些什么。早在法国革命之前,亚当斯与卢梭就一直进行着争论,卢梭认为“自然状态”的准则应该为批判现存的制度而服务,因为一个新的民主时代将会是“大众的意愿”。亚当斯仔细阅读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社会起源》,在书页的空白处作了精辟的注释。如果多数票是 多数票,而少数票是 少数票,那么大众的声音又怎么会成为“上帝的意愿”呢?难道上帝也在天天改变主意吗?当然,在卢梭的大众意见中根本没有少数派及其分歧;人们要么遵从它,要么实现“被强迫的自由”。

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洛德·阿克顿认为,卢梭“用他的笔产生了比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圣·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他任何曾经存在过的人更大的影响”。这也许有些夸张,迪·斯塔尔夫人说道:“卢梭没有新的见解,但是却点燃了一切愤怒之火。”这或许更接近于事实吧。

亚当斯写他的政治著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法国革命的大火不要蔓延到美国来。卢梭那响亮的“人生而自由,又无不在枷锁之中”的呼声,却几乎没有说服一个充满原罪思想的头脑(或者是一个被无意识需求的思想所缠绕的现代的弗洛伊德

主义者)。卢梭首次提出的思想,将会在法国对美国宪法的批评中无数次重复:既然人们如此热爱自由,并且永远不会滥用它,那么就没有必要有公共机构的限制,人们可以像无辜的动物一样,随意自由地漫步。亚当斯非常恼火地写信给卢梭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把我们变成野兽。”由于卢梭高度赞扬无辜而又高贵的野生动物,亚当斯不得不反驳道:“阅读你的作品,使人产生一种用四肢走路的渴望。”

从亚当斯对卢梭讽刺的评论与对法国革命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正在为君主制与贵族统治掉眼泪,并且希望看到这种体制再次回来。然而,亚当斯远非一个往回看的君主主义者,而是一个关注未来的慈善家,他希望把政府变成一个更为理性的,而不是由许多感情冲动之人所组成的机构。亚当斯怀疑贵族自我牺牲的阶级原则和启蒙运动所信仰的理性原则,他相信,比起以前那些散布在政治哲学文章中关于公民权与公民美德的“伪善的说教”来说,一个完美的政府在处理权力与冲突的斗争中更为可靠。然而,亚当斯不得不面对一种突出的矛盾,即一个美国革命最热情的卫士,却变成了法国革命最激烈的批评者。亚当斯的立场,激怒了那些早已看到或者认为他们已经看到,自己的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法国思想家们。既然美国的革命是“智慧”战胜“偏见、独断与迷信”的胜利,那么,为什么亚当斯拒绝把 1789 年法国革命看作是美国“1776 年精神”的继续呢?

一个答案就是,法国革命正在力图实现美国革命力图阻止的东西。这也正是亚当斯的老朋友康道塞得出的结论。由于亚当斯总是拒绝承认法国人民创造的也是美国人民继承的东西,康道塞对亚当斯失去了耐心。与美国相反,法国人民在拥有权

利之前就预先宣布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在一个政治社会新生的道路上,所有旧的政治结构都要为社会的可能革新让路。那么,怎样才能挽救社会呢?在政治哲学的历史上,针对这一问题,亚当斯的立场是唯一的,这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领会。

为了把人类从无休止的内战中解救出来,马基雅维利指望王室可以引导人民走上建立稳定、自由社会的道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危险,约翰·洛克转向了美国,在那里他看到了“除了金钱,再没有什么东西更为美国人民所了解”。所以在社会的初创阶段,是财产代表了诚实的劳动。面对将要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卡尔·马克思看到了下层的无产阶级,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把社会从悲惨与压迫之中解救出来。在法国革命的蹂躏之下,埃德蒙·柏克则看到了上层的贵族阶级,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恢复社会的秩序与稳定。由于拿破仑侵入普鲁士,黑格尔看得更远,他希望神圣王国的“绝对精神”显示出它的神意,以结束冲突与辩证的矛盾。那么亚当斯看向哪里呢?他既不指望一个人、一个阶级,也不指望一种哲学的思想。相反,他提出建立政府自身的体系与结构,一个越过英国辉格党的传统而强调行政部门重要性的政府,一个深思熟虑不需救赎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目的是防止权力的专断,是为了限制邪恶而不是为了实现美德。

然而亚当斯必须面对的,却是与解决方法一样多的问题本身。按照亚当斯的观点,在争取到自由世界享受自由的滋味之前,美国人民对于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的。亚当斯希望法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之前就先考虑一下他们的宪法。激进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第一个使用恐怖主义措辞的人,竭力嘲讽美国人:“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革命,你们就想结束我们的革命。我是在与傲慢自大的美国人,还是与轻率无知的法国人打交道呢?”

也许两者都有。当亚当斯讨论贵族阶级代表的平衡政府的不可避免性时，他看起来对贵族极端自私与顽固的行为，对于他们对法国革命的敌视态度视而不见。所以法国的思想家试着把国家权力的集中作为消除贵族统治的一种方式，这是正确的解决方式吗？也许是吧。然而，用来达到实现革命目标的方式却经常自己消亡。中央集权可能会对抑制贵族统治有些帮助，但是这也使得罗伯斯庇尔与拿破仑的产生成为可能。在法国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阶级划分，阶级的革命；而在美国革命中，所有的阶级都站在同一战线上对抗英国，所以对于大西洋彼岸一个消除了长子继承权（即财产权归大儿子所有，并且贵族统治还在这种机制下实现着永恒）的国度来说，搞中央集权实在是没必要的。亚当斯面临的是一直令美国历史学家迷惑的问题。没有真正的阶级革命，美国又怎能理解另一个国家所经历的烦躁与苦恼呢？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与那些法国思想家相比——他们经常同时谴责查理斯·路易·迪·孟德斯鸠与约翰·亚当斯——亚当斯反而更像是一个孟德斯鸠主义者。当法国革命继续走向它的血腥之路时，它亦是在走向亚当斯《为美国宪法辩护》中所称的自杀之路。当有人不断地走上断头台，当头颅不断地落在挤满人群的路上，法国的执行内阁依旧在继续争论与释放着他们的理想，这也是对亚当斯与孟德斯鸠的极大嘲讽。法国革命拒绝亚当斯的《为美国宪法辩护》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他们依然在建立一个没有权力分离机制的直接的国民大会。1793年，巴黎公社从卢梭“大众意志”的美梦中惊醒过来，怀着理性走上死亡之路，取而代之的是罗伯斯庇尔。

那么，法国人民到底错在哪里呢？历史书中传统的观点认

为,法国的《人权宣言》是“抽象的”,而我们的《独立宣言》则是具体的。这与亚当斯的想法相差甚远,因为亚当斯看重的是一种更为抽象的君主概念。

虽然法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同过去彻底决裂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在一种感觉不到的咒语——君权概念——的引导下继续前进。最初,这种观点是与君主专制甚至是暴政相结合的,然而法国的思想家却假设他们可以将以上的想法民主化、大众化。卢梭认为,主权在于人民,而阿贝·西哀士则认为主权在于国家(他认为国家是一种拥有自我意志的神秘力量)。“一个国家不能解决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用一种能使亚当斯与那些正在使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进而产生一个全民族国家的建造者们迷惑的语言说。在美国的政府体系中,找不到主权的明确源泉,亦找不到不容置疑的、无可争辩的与不可阻挡的权力中心。亚当斯提醒法国人民说,根本没有“人民”这样的实体,因为公民大众不会一起到达终点,不会有相同的思想、理智,所以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法国人力图实现主权的集中,而美国人则尽力使之分散。

但是,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人民是有智慧的、至高无上的,而政府则是颠覆性的与邪恶的。对于美国来说适用的,对于法国来说亦是真理。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亚当斯的敌人在《国家公报》上发表言论高度赞扬雅各宾派,说他们就是街道上的杰斐逊主义者。亚当斯副总统力图使公众相信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无类似的地方,而国务卿杰斐逊则认为美国人民自由的未来依赖于法国革命的结局,甚至认为对国王判处绞刑是“完全必要”的。早几年前,当杰斐逊与亚当斯都在巴黎执行外交任务时,他们都怀疑法

国革命是否能成功，不仅因为古老政体世袭的邪恶，还因为法国女性放荡的恶习。

法国女人的放荡德行对于亚当斯、杰斐逊与其他在巴黎的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虽然对于时髦地共享一个泰利伦夫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古韦纳尔·罗伯特·莫礼斯来说算不了什么。大街上充斥着妓女，沙龙里拥挤着娼妓，连在车厢里也要约会，你让那些清教徒可怎么办！比起杰斐逊来，亚当斯并不多么憎恶巴黎女性，他还写信给阿比盖尔说明法国女性的修养，而杰斐逊则总是抱怨她们的堕落。如果法国革命需要“共和国母亲”的美德，法国就有麻烦了。一个法国妇女还告诉亚当斯的女儿说，许多母亲将她们的女儿送到修道院，以免受到那些放荡女子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妇女的问题。女儿们仍然记得，他的父亲身边坐着的 26 岁的大使竟然娶了一个 15 岁的女子，“这样的婚姻真是令人作呕”。

在法国革命的早期，杰斐逊忘记了对巴黎人恶习的厌恶，对于法国革命表现出由衷的兴奋。他对于把那些作为“公民安全委员会”的“敌人”而被送上断头台的人毫无怜悯之情。相反，他在 1793 年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全世界的自由都依赖于竞争，从来没有不流一滴无辜的血就赢来的荣誉。”他认为，巴黎的叛乱者们只是在重复美国革命的精神罢了。“我对于那些为此类事业而牺牲的人深表同情，”他在关于恐怖的附注中说，“我宁愿看到地球的一半荒无人烟，也不愿看到革命的失败。即使每个国家只有一个自由的亚当与夏娃，也会比现在好。”杰斐逊，一个自由与忍耐的信徒，成为法国暴政与恐怖的捍卫者。

几年以后，杰斐逊重新考虑他的错误观点时，承认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革命毕竟有所不同。对于亚当斯来说，他虽然在《为

美国宪法辩护》中预言道,没有限制的权力将无情地呈现出发展、巩固、排斥与独霸的趋势,他并没有为自己的预言而沾沾自喜。法国的雅各宾派认为,只要没有贵族阶级的权力与暴政,那么永远不会有问题发生,也不会有剥削与压迫的发生。法国革命需要更少的阻碍,更多的平衡。

法国革命是美国面对世界的第一个伟大事件,也使美国了解了在反对旧秩序的剧痛后会发生些什么。然而,亚当斯的弗吉尼亚对手并没有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许多前法国的反联邦主义者,美国革命的坚定反对者,热情拥护一场能够集中权力而不是为自由创造条件的革命。支持法国革命的美国人民认为,法国革命会将权力归还到人民的手中。在1793年革命之前,亚当斯与汉弥尔顿就告诉美国人民说,对民主的顶礼膜拜很自然地会导致对暴政的崇拜,这一点在汉弥尔顿警告北方联邦同盟盟员时与亚当斯的《为美国宪法辩护》中都曾经作过说明。英国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法国革命是否将世界引向民主是一个尚待论证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促进强大政府的发展,它产生了一个要求更高效率,组织更加完善,能力范围更加宽广,比当时任何存在过的国家权力更能威慑人心的政府。它使得政府无法抵制这样的事实,即从今往后,政府将被宣布为是新主——有组织的人民——无可争辩的代理人。

在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上,亚当斯的主要对手是托马斯·潘恩,他是一个颇受下代美国人(包括后来的总统罗纳德·里根)欢

迎的作者，一位自由意志论者。1789年，潘恩从巴黎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指出他从约翰·杰那里听说亚当斯总统曾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华盛顿没有儿子，所以总统只好从其家族中挑选了。”从来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亚当斯曾有过这样的感想。事实恰恰相反，在亚当斯写的《为美国宪法辩护》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刚好与潘恩的说法相反。亚当斯指出，如果一种民主政体，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宪法，那么“它将是所有的人、家庭与公众的不幸，仅仅由于他的重孙子可能成为一个暴君，这样的‘假设’就会使得一个考虑自己整个生活的人，一个考虑他的儿子、孙子的男人，浪费无数精力于永无休止的悲剧与战争之上”。

亚当斯试图带给这个世界的不是君主主义的传统，而是自由主义的课程。他力图证明，冲突可以由一个平等的“混合”政府来加以控制。但是，这也会误导人们，认为亚当斯是在说革命的法国——或者是19世纪的俄国、中国与古巴的伟大革命——需要亚当斯的个人才智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亚当斯的遗教正如它自身一样深奥，美国人民只体会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他所力求为之辩护的宪法，教会世界怎样去联合发动一场革命，也教会世界该怎样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第四章 华盛顿的光环和杰斐逊的阴影

“反联邦主义,激进共和主义,叛乱”

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人们并不怎么注意副总统,他的控制力也非常小,亚当斯却是例外。反对联邦党的力量不敢攻击华盛顿,他们就像复仇一样把矛头对准了亚当斯。亚当斯的两部著作《为美国宪法辩护》和《关于达维拉的谈话》导致这样一种嫌疑,即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美国。一个对法国革命持敌对态度的人必然不能接受美国革命,并且会阴谋推翻美国政府。反对派的记者阿拉蒂要求亚当斯遵守这样的誓言:“遵循一个革命原则的人必须尊重其他革命的原则,而且区分这两个原则的人必须是不带任何偏见,不盲目,或不鲁莽地否认二者的界限。这两点是不容争议的。”

亚当斯没有支持法国革命,因此他被怀疑曾劝说华盛顿总统对法宣战,这种怀疑直到他成为总统时仍然存在。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当法国和英国发生战争时,交战双方都袭击美国的商船。亚当斯同意华盛顿的政策,即美国保持严格的中立。这个中立声明意味着,美国必须取消在对英国战争时为求得法国的支持而与法国在1778年建立的盟约。但是18世纪90年代革命的法国,已不再代表与美国签订条约时的旧政权了,新生的美

国无意卷入欧洲两股势力的斗争中去。然而法国现在需要美国的秘密支持,就像美国一度需要法国的支持一样。吉伦特派,巴黎一个温和的革命党派,他们派爱德蒙·查尔斯·纪涅越过大西洋前往美国,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寻求美国的帮助,即使这意味着绕过代表美国民意的华盛顿政府而行事。

年轻、打扮入时、魅力十足的法国公民纪涅在 1793 年到达美国,受到美国亲法分子的热烈欢迎。法国革命发生后,他奉命去煽动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人的叛乱,并赢得了控制密西西比河的关键——肯塔基州——的支持。他还促成私掠船同英国的商船作战。亚当斯认识纪涅在法国的家人,并且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行动。亚当斯最后发现纪涅是一个花言巧语且没有判断力的人,“几乎很少反映他自己和他同伴的意思”。当纪涅越过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在国会发表演讲时,他已走得太远了。美国政府取消了他的许多活动,与他很疏远,他则继续在美国旅行并发表演讲,赢得街边群众的掌声和支持,最后甚至共和党人也认识到了这危及了自身的利益。纪涅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在吉伦特派下台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后,他留在美国,没有回法国。再回法国,他极有可能被送上断头台。后来他爱上了州长乔治·克林顿的女儿并和她结婚,他们在纽约北部安了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纪涅事件平息以后,美国的注意力由法国转向英国。在华盛顿执政期间,国家的贸易激增,总额达到了每年 500 万吨。但是美国的商船却在加勒比海和公海遭到英国海军的攻击。这惹怒了公众。华盛顿派约翰·杰伊去伦敦谈判,大多数人都没有耐心去等待谈判的结果而一致要求对英宣战。当消息传来说,《杰伊条约》几乎没有争得任何英国对美国的让步时(美国要求

的中立贸易权利、海员保护协议,和关于印第安人在西北部领土上的事端的解决),杰伊被一片辱骂声所淹没。《杰伊条约》引起的事件是《为美国宪法辩护》的翻版,就像是一个人的脖子被一根绳子勒着的感觉,《杰伊条约》也增加了亚当斯总统任期内的苦恼。

亚当斯在当时美国的首都费城做了 愿年副总统,这个时期他是孤单的、寂寞的。参议院争论不休时,亚当斯作为一个长于辩论的人,却不得不保持沉默。他不能给公众作演说,也不能向媒体发布政府文件,他只能让自己沉浸于泰西塔斯、荷马史诗和费城的报纸中。出于家庭预算的原因,阿比盖尔仍然留在布伦特里,因为亚当斯每年 缘圆美元薪水远远不够支付他们一家在费城住一所舒适房子的费用。

阿比盖尔和约翰盼望着每周的通信。她责备他嘲笑玛丽和其他女人要求平等权利的言论。“承认事实,”她写道,“承认当你厌倦了野心、阴谋、虚伪的政治时,你会退回到女性特征的单纯、温顺、没有心机。”当她听到丈夫抱怨说也许杰斐逊应该成为副总统时,她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些话。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一职,离开政府,但“他的头脑中还是充满了抱负、偏见和小党派的流毒”。

派别是政党的同义词,当时都不是令人尊敬的词。杰斐逊和弗吉尼亚人让菲利普·弗里诺的《国家报》对汉弥尔顿和亚当斯展开攻击。汉弥尔顿在约翰·芬诺办的报纸上进行了回击。作为副总统,亚当斯不能让自己卷入报界的战争,杰斐逊虽然表面上没有参与进来,但他却在幕后操纵着这场论战。

在 愿圆年的副总统选举中,弗吉尼亚人反对联邦党人亚当斯和汉弥尔顿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为竞选作着准备,让他们的

候选人进入了国会，甚至试图努力支持克林顿州长担任下届副总统从而取代亚当斯的位置。汉弥尔顿和杰斐逊在各自的报纸上互相攻击，而华盛顿则一言不发，收取每位选举人的选票，亚当斯以 苑票对 缘票击败了克林顿成为副总统。

在 员愿年，谁将接任华盛顿总统，形势并不明朗，杰斐逊开始称他的反对派为“共和利益者”——仍然不愿意使用“党派”这个词。共和党憎恨汉弥尔顿的金融政策和亚当斯对法国革命和全民民主的批评性观点。联邦党人感到，如果不对民主力量加以控制，它就会像在美国联合政府时期时一样危险。弗吉尼亚反对党信任地方而害怕国家，他们确信人民不会做错而国家不会做对。在 苑世纪 愿年代早期，小的联合已经在几个州发展起来，但是更多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友爱和乐善好施，也与联邦党或共和党没有关系。但是费城的民主社团关于法国革命的观点，却被怀疑是背叛了共和政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员愿年的法国革命背叛了自己，所有自由的言论都被禁止，而代以恐怖的统治。在那年夏天，一场以自由和酒类为名义的暴动在宾夕法尼亚发生了。

“威士忌叛乱”动摇了华盛顿政府的统治，并检验了国家政府的权威。在宾夕法尼亚，威士忌是主要的商品，当联邦政府强加收税时，“民主社团”抗议在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征收这么重的税。抗议失败了，反叛者武装好自己并在费城游行。总统命令各州召集了 员愿万名志愿士兵。当华盛顿作为第一指挥官，汉弥尔顿作为副指挥官领导志愿者时，响应者云集。在夏末，国家在等待着关于流血战争的报告，但是叛乱者撤退了。汉弥尔顿逮捕了一些在丛林中负隅顽抗的人，亚当斯终于卸去重担，他高兴地说道：“一支 员愿万人的士兵队伍很容易从 源个州召集起

来,照这样发展下去,激进的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垂下他们的头认输了。’不过,亚当斯告诉阿比盖尔,在一个政治上没有统一性的国家里,这样的暴动会再次到来。事实上,几年以后,在国家的同一部分地区发生了叛乱并使共和党人失去了宾夕法尼亚——亚当斯再次竞选时所争取的那个州。

“这个老人会是个好总统”

在亚当斯的时代,美国人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一些人期望不久以后,国家会变成一个甚至没有财产权、贫穷白人也有选举权的民主国家。美国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处于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的统治之下,华盛顿毫无疑问的当选和再次当选反映了这一事实。这种神秘的领导魅力是令人敬畏的,并且是超越政治和非难之上的。华盛顿本来可以轻易地连任第三届,甚至更多届,但是他在自己最受欢迎的时候引退,这是一个领导人所能给予他的人民最好的政治礼物。在未来的美国政治中,总统在政治性丑闻中宁愿面对责难、弹劾也不愿意放弃职位。由于亚当斯和制宪者不愿意在新的共和国内仅仅依赖好名声而继续他们的政治生涯,所以华盛顿的选择令他们大吃一惊。

然而华盛顿在 1797 年引退之后对国家产生的影响证明制宪者是正确的。华盛顿不再执政,人们开始自由地表达他们的热情和偏见等情绪,美国的政治以此为开端,人们被亚当斯所说的忌妒、怀疑、竞争、不满、控告等情绪所包围。这样的消极政治反映了民主社会的大量冲突。但是政治包括组织,有组织就有寡头政治执政者。反对亚当斯可能成为下届总统的活动是以人

民的名义展开的，但是实际上却被一个人操纵着，在亚当斯和联邦制由于法国革命、《杰伊条约》，以及“威士忌叛乱”的影响而处于守势时，共和党人的实力却增强了。

源个杰出的人物都有可能成为华盛顿的继任者，亚当斯、汉弥尔顿、杰伊和杰斐逊。汉弥尔顿受人尊敬，但是他远离政治的冷酷风格不受人欢迎，杰伊的机会在与英国签订条约的争议中失去了，美国的选择是在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为竞选作积极的准备，但是他们的支持者却都行动了，这些行为在 1796 年的大选中被证明是卑鄙的、不正当的。杰斐逊的支持者指控亚当斯是君主主义者，亚当斯曾宣称他的爱是崇高的，这让对手攻击他“浮夸不实”。联邦党人攻击杰斐逊宣扬无神论，并攻击他对革命的法国的友好看法。

法国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杰伊条约》看起来是亲英的，法国五人内阁因而争论是否对美国宣战。不过法国最终决定通过派遣官方官员来干涉美国选举，并支持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和其他一些地方，一些市民开始佩戴巴黎革命者所佩戴的三角帽徽，并有谣言说一支法国舰队正开往纽约。美国北方殖民地的文明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美国其他地方，很多美国人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法国的报道：恐怖、弑君者、断头台、扎克雷起义、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人们不禁要问：法国正在开往我们的海岸吗？

法国人没有来，汉弥尔顿担心的共和党人却来了。他曾经敬重亚当斯并有意在选举中支持他，但是随着对法国的恐慌，他更加敬畏杰斐逊。他担心新英格兰的选民在他们第一次把票投给了亚当斯之后，会在第二轮选举中因为选票分散而浪费选票。这个时候由州选举出来的选举团成员没有把票投给同一个州的

两个候选人,而是把票投给了来自于两个州的两个人。汉弥尔顿让他们选举托马斯·平克尼,一个来自于卡罗来纳州以前的将军,以确保亚当斯被杰斐逊击败。随着两个联邦党候选人选票的不断持平,平克尼有机会击败最受欢迎的亚当斯,而汉弥尔顿更希望杰斐逊胜利。汉弥尔顿的建议被漠视,但是他的行动仍然使亚当斯的票数减少,最终亚当斯仅以 ~~五万多~~ 票的 ~~猿~~ 票领先优势击败了杰斐逊,而平克尼得到 ~~缘~~ 票。

汉弥尔顿的作为更多是出于对亚当斯的忌妒,而不是对杰斐逊的支持。阿比盖尔和这位新总统永远不能谅解这个曾干预新英格兰选举的前财政部长。实际上亚当斯对汉弥尔顿的敌意尤其表现于同一个观点的三个方面,包括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民主的怀疑及对煽动行为的敏感。尽管亚当斯的观点和杰斐逊分歧更大,但亚当斯还是和汉弥尔顿成了仇敌。亚当斯认为汉弥尔顿太注重“财富、好的出身、才华”,太喜欢运用银行和货币政策。汉弥尔顿看起来还有军事冒险的热望,他想使美国卷入与法国的战争,他还寻求军队指挥权,以便能促使美国向被法国和西班牙夺走的西部领土进军。汉弥尔顿“英格兰小商贩的混血儿”的出身,也成了亚当斯的话题。汉弥尔顿从来没有接受作为总统的亚当斯,而且出版了一个粗糙的小册子,把亚当斯描写成“不能领导一个政党或者不能统治国家”的人。两个人都是联邦党的领导人,但作为副总统,亚当斯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而汉弥尔顿,这个前任优秀的军事长官则不能把自己当作华盛顿真正的继承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在他的政治哲学中预言的东西如今果然出现在政治的舞台上:野心、嫉妒、欲望、赞扬、对荣誉的渴求。在那个时候,让人知道你想成为总统会令人看不起。

人们认为,不应该自己去寻求这个职位,而是职位需要你这个人。在理论上,尤其是古代经典理论中,政治和政治活动被认为必然会产生最好的人选,这个人选是他本人努力尽自己做一个公民的责任,和努力为公共利益服务而自然被选择的。但是在美国,在亚当斯的时代,政治有着相反的结果。不断涌现的政治派系没有忠实的传统,朋友和邻居会成为你对立的一方。亚当斯悲哀地说:“没有什么比我看到朋友站到另一派反对我更令我痛苦。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在那个时刻终止了,在 1796 年的选举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作为参议院的首脑,亚当斯发现自己在宣布竞选总统时处于尴尬境地。他不得不写信把他在竞选中获胜的消息告诉身在昆西的阿比盖尔,这时的她正处于大雪围困的冷寂冬天里。亚当斯一家一时间被担忧和喜悦包围着,他们一方面担忧前面的困难,同时又为亚当斯的成功而欣喜。亚当斯甚至在选举结果产生之前就转述了一个北方联邦党人的评论:“这个老人会是个好总统,不过我们要对他不时地进行监督,这就是全部。”亚当斯也知道在就职典礼当天,光荣的时刻是属于离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第二天,亚当斯写道:“我成功当选总统,但华盛顿将军比我更高兴,我想我听到了他说:‘唉,我终于卸任了,你终于上任了,看看我们两个人谁会更幸福!’”

就职典礼和内阁

在就职典礼那天,亚当斯没有像做副总统时那样昂首阔步地走进华丽典雅的参议院。他穿了一件灰白色的西装,没有佩戴珠宝,没有佩戴短剑和帽徽,他谢绝了来接他的马车和欢迎他

的人群,下令使用上届总统的四匹白马拉的马车。亚当斯以最简约的方式,走上了象征共和主义的指挥台。

就职宣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自豪感,亚当斯以他最关心的主题开始他的演讲:国家为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而战,他提醒普通大众怎样打碎一度缚住他们并使他们屈服的枷锁。他明确区分了他的政府体制与旧世界“官服和珠宝”体制的不同,他甚至赞扬了为知识和启蒙而贡献自己智慧和力量的人们——他忘记了在自己著作里他曾对这些思想表示过怀疑。他认为只有具备好的判断力、沉着坚定和正直的人,才能使人们接受宪法。华盛顿带领国家度过了不确定的时期,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同历史上其他的就职宣誓相比,亚当斯所主张的调和政策吸引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和宗教团体,并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在外事中,他致力于维护和平,对联邦党亲英分子的行为感到惊愕,为共和党天主教徒而高兴。鉴于自己在法国几年的生活经历,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他的愿望是维护民族间的友好。演讲结束了,像其他演讲一样,最后他感谢上帝保佑美国。

演讲获得了国会议员雷鸣般的掌声。亚当斯离开讲台以后,华盛顿走向他,祝愿他的政治生涯“愉快、成功、荣耀”。做事谨慎的亚当斯怀疑自己是否对国会夸赞得太多了,关于自己也说得太多了。当好战的联邦党人抱怨他对共和党人太好时,亚当斯若有所思地对阿比盖尔说,他也许应该辞职把权力移交给华盛顿。

如果说华盛顿的光环照耀了亚当斯作为副总统的愿年时光,那么杰斐逊的阴影则笼罩了他作为总统的源年历程。亚当斯仅仅是一位以猿票胜出的总统,位列第二的杰斐逊出任副总

统，他拜访亚当斯并祝贺他，但是没有留下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位新任副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对手，其中暗含了要和解的意思，但是亚当斯没有看就把信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筒。

杰斐逊把亚当斯看成是汉弥尔顿实现其野心的一个障碍，在信中他警告亚当斯说，亚当斯应该会预料到他在纽约州的那个重要的朋友会耍诡计，这些把戏会使政府失去民众的信任。他把信给麦迪逊看，麦迪逊认为这可能会招致不良后果，因而反对把信给亚当斯看。麦迪逊指出，当共和党组织反对政府时，总统会公开这封信，让公众知道他们怎样背叛了当初承诺的信任和友谊。两年以后，在 1796 年亚当斯执政期间，麦迪逊确认了他对总统的怀疑，他认为亚当斯是一位草率、冲动的政治家。同谨慎的华盛顿相比，亚当斯表现出更多的热情，而这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所谴责的。

亚当斯背着被人怀疑的重担上任，汉弥尔顿又无法忍受亚当斯会成功的连任，共和党人也无法忍受去想像亚当斯或是汉弥尔顿成为下一届总统。在联邦党人杰出人物的名单中，汉弥尔顿不在总统的备选之列。

在美国历史上新的总统通常要重新组阁，前任内阁成员在新总统到来之前早就已经离开，但是亚当斯没有先例可寻，他决定保持内阁人员不动。那些为华盛顿工作的人是非常平凡的，因为对政治的憎恨使那些有才华的人都远离了费城。一个旧时的历史学家碰巧成为杰斐逊的支持者，写出了这种尴尬的处境，“即使是阿里巴巴在 100 个强盗中的处境，也没有亚当斯与他的内阁相隔绝的处境更值得人们同情”。亚当斯没有 100 个内阁成员，三个主要的成员已经足够了。

在 这个人拒绝了接受国务卿这个职位后，亚当斯任命了皮

克林。他是个官僚，一个对外交策略几乎没有什么耐心而喜欢为琐事争执的人。在亚当斯的任命下，他作为密使去往塞内加尔部落。他做事情相当积极和公平，包括和美国土著签订条约，但是他却被他的反共和党的热情所毁了，他几乎无法和下属好好相处。这个国务卿还斥责亚当斯自我感觉公正的中庸政策——他认为自己比总统更正确。

奥利弗·沃尔科特，亚当斯的财政部长，他脾气很好但是不太诚实，比皮克林还直接。谨慎的他宁愿被告诉做什么，而不会主动去做什么。和皮克林相比，他处在金融压力之下，不得不依赖他的政府工作：自以为是的他从来不会想到要主宰政治大船，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宁愿讨人喜欢也不愿意挑起事端。很显然，亚当斯的内阁缺少他自己所期望的那些东西：拥有自我质问的态度和创造性的张力。

国防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是个性格随和的爱尔兰人，他很有魅力，常能给人带来快乐。他在爱尔兰接受教育，是个诗人。他在革命期间做了外科医生，并在军队勇敢地服役。在华盛顿严肃的工作氛围中，他常能打破僵局给政党带来生气。作为国防部长，他是否称职，历史学家还有争议。当1793年战争危机爆发时，一些联邦党人说他对工作不负责。两年以后亚当斯打发了他，尽管不是因为他不称职。

这三个主要的内阁成员成为亚当斯政府的一条龙。他们是被亚当斯任命的，实际上却是汉弥尔顿的傀儡。他们致力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效忠汉弥尔顿而不是自己的总统。他们甚至在一些争议中公开反对亚当斯，但他们又不肯辞职，而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反对政府的政策。直到今天，历史学家还无法确定亚当斯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内阁成员对

他不够忠心。他之所以保留这些内阁成员，是因为他希望与前任华盛顿政府保持连续性，并且，他还希望建立国内服务的专业团队，这些团队成员的任命不能是政治上心血来潮的产物。但是亚当斯不像华盛顿，他仅仅把部长的看法当成不同的观点，因为他不信任部长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中的能力。为了保持传统，亚当斯征求内阁成员的书面意见，但是他早已知道他们的意见充满了党派成见，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来的结论。亚当斯更喜欢自己作出决定，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宣布，这样的策略是要他付出政治代价的。两党成员对于他事先不通知就自己决断的行为都感到不满，亚当斯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往返于布伦特里时，他还“天真地”以为内阁会执行他的政策。但是亚当斯仍然沉浸于泰西塔斯、马基雅维利和博林布鲁克的著作中，并对强制的领导形式大加赞赏。亚当斯在 1789 年写道：“统一、果断、严守秘密、政府的权威和灵活性，这些对政府系统来说是基本的构成部分，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和平、秩序、自由或社会的主权。”亚当斯在尽力维护他所看重的启蒙君主的领导权，和他更注重的现代共和的自由之间的平衡。他甚至看到了在即将到来的民主社会里，灵活的领导策略是很重要的。

一个“痛苦”的总统

在 1792 年亚当斯搬进以前华盛顿住过的费城的总统府后，他极其忧虑地写信给阿比盖尔说，他发现“公用的家具状况很差”。总统不仅要支付房子的费用而且还要支付租马匹和租马车的费用。国会批准了 1 万美元的费用用于购买新家具，而

亚当斯的薪水一年仅有 10000 美元。当总统警告阿比盖尔要注意必要的花销时,他感到很“痛苦”。亚当斯写道:“没有一把椅子能坐,床和被褥用品都糟透了,仆人们也把空屋子弄得从来没有过的乱七八糟。”

房子在其他意义上是空的,阿比盖尔必须马上来。亚当斯写信给在昆西的阿比盖尔说:“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需要你的建议和帮助。”阿比盖尔正和亚当斯年老的、已经生命垂危的母亲在一起,第二个月,她动身去了费城。阿比盖尔发现在总统府的生活是辛苦吃力的,她不得不一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接待客人,尽管要费劲地止住呵欠,但是也要耐心地倾听客人们的谈话。毫无疑问,她明白了华盛顿总统为什么那么盼望卸任。

在亚当斯最初执政的时期,他发现自己被寻求工作的事务包围着,华盛顿也曾处理过大量的类似信件,大多数是来自革命时期的老兵的要求。这些寄到亚当斯手中的信来自各类美国公民:贫困的家庭、一对需要为孩子提供教育经费的父母、没有存款的年老夫妇、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只有一封信最让亚当斯高兴,这是他儿子约翰·昆西写给阿比盖尔的,他儿子保证说他永远不会恳求在政府任职,因为他有个当总统的爸爸。这封信给阿比盖尔带来了喜悦,她把信给亚当斯看,亚当斯又给其他人看并说道:“它是我读过的所有信件中最优美的文字。”不久以后,阿比盖尔高兴地得知年轻的约翰·昆西坠入爱河,她劝说约翰·昆西在去葡萄牙之前结婚——亚当斯已经任命他为葡萄牙大使。

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成为美国第 5 任总统,像父亲一样,他执政前后都有非凡的成就。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被证明

是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他的重要演讲至今仍旧被外交系的学生和现行推行门罗主义的人奉为经典。门罗主义让欧洲执政者知道，西半球要受美国的影响。卸任总统后，约翰·昆西在国会工作时领导了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作为律师，他在阿米斯塔德事件中为参与起义的非洲裔美国人辩护。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骄傲地宣称，反对奴隶制像是遗传基因一样在整个亚当斯家族传了下来。约翰·亚当斯身处美国废奴社会时期，但是父亲和儿子在总统任职期间都没有直接发表过有关种族主义的观点。阿比盖尔也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当她回到昆西时，她写信给约翰时提到过下面的事情：

阿比盖尔认识一个黑人小孩叫詹姆斯，他是个仆人，阿比盖尔把他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很快，邻居凡克森来拜访阿比盖尔，并警告她说如果詹姆斯继续留在学校，其他的孩子就要退学。

“凡克森先生，这个小孩做错了吗？”

“哦，不。不是这个原因，”他回答道，“只是……”

“哦，他们不反对和詹姆斯一起去教堂或一起跳舞，为什么会反对他去学校？”阿比盖尔坚持说。

“不是我反对，是其他人。”凡尔森说道。

“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为什么他们不来？”阿比盖尔尖锐地问道。

这个不知所措的、无助的凡克森不得不站在美国总统夫人面前，听她发表关于美国意义的演讲：

“这是在攻击每个人都应该被赋予的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一项平等权利，作为一个自由人，詹姆斯拥有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权利，黑色皮肤并不能成为阻止他进入学校的理由。”

“哦，夫人，您是非常正确的，”凡克森让步了，他眼睛盯着门

说道,“我希望没有太冒犯您。”

“一点也不,先生,把这个男孩送到我这儿来……我不认为把他带到我家里由我教他读书识字是什么有失尊严的事,告诉他们,先生,我希望我们一起去天堂。”

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妻子,第二位第一夫人,她是第一个知道生活远远不像烘制曲奇饼那样简单的人。

第五章 法国：朋友还是敌人

“绅士——它是钱” 载在事件

约翰·亚当斯在 1789 年 9 月 1 日宣誓就职，这个马萨诸塞农民的儿子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最高领袖。通常，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就职后的一段时间被称做“蜜月”，因为竞选前的所有纷争都结束了，想像中的一切终于可以成为现实，这会让人高兴不已。亚当斯本该和阿比盖尔，而不是和政治世界一起度蜜月。可是，在成为总统不久以后，他不得不开始处理来自欧洲的麻烦。新的法国政府的五大执行委员会首脑，被称做“五人执政内阁”，拒绝接受美国派往法国的外交使节平克尼呈交的国书，并要把他驱逐出法国。法国对《杰伊条约》——这个美国在法国革命期间打破与法国联盟而宣告站在英国一边的条约——感到不安。法国在美国对英国的斗争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罗开姆比尔、拉法叶、迪格瑞斯成了 1789 年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曾经与华盛顿并肩作战。亚当斯在法国生活了好几年，他了解法国的敏感，他不希望看到美国与老盟友分裂。

亚当斯决定派使团去巴黎。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组成了美国使团，他们的使命在于传递友好的消息和请求法国赔偿在加勒比海岸劫掠美国商船对美国造成的损失。

三个小组成员就细节问题同法国外事部长泰利伦交换了意见。泰利伦的助手一个是荷兰的银行家,另外两个在我们今天称做“基金筹措者”。一个助手带平克尼到一个私人房间里,低声告诉他关于五人内阁的消息。他说法国政府已经被亚当斯激怒,但是如果亚当斯在未来的演说中态度软下来,并且给法国 1000 万荷兰盾的贷款,再给泰利伦 5000 万英镑的贿赂的话,事情还可以商量。

外交使节被这样的建议弄得很迷惑,这件事后来被称为“载沣在事件”。其中一个人告诉美国人,这些钱对于泰利伦来说只不过是律师的事务费而已,但是只有将这笔钱交给法国,才会使五人内阁接受美国。当泰利伦和美国人在私下里打交道时,他威胁说,如果美国拒绝提供帮助即贷款给法国政府,那美国将被法国看作是敌人。美国人开始抱怨。一个泰利伦的助手声称:“你没有说到点子上,是金钱,是希望你提供金钱。”平克尼说他们已经讲了这个意思,“不,”代理人反驳说,“你没有,你的答案是什么?”一个著名的回答帮助了平克尼,它就在历史教科书上:“百万是为了辩护,但没有一分是为了供奉。”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大使对国务卿传达的意思是:“不,不,远便士也没有。”

由于被行贿的念头所侮辱,美国大使可能更关心法国对美国放弃中立声明的要求。弗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和其他杰斐逊的支持者告知五人内阁,亚当斯并不代表民意。泰利伦和他的助手只能诉诸恐吓,“再就代表了对美国人赤裸裸的恐吓。他们说如果还没钱送来,那么就将以全部武力对付美国。年轻的共和国,还不到 100 年的历史,却有可能重蹈威尼斯共和国从历史上消失的命运。泰利伦知道美国宪法不允许大使个人谈判签

订贷款条约，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他的条约，称没有比热那亚和日内瓦更值得美国考虑的了。美国大使甚至收到警告，让他们不要对美国政府披露任何关于交换条件的信息。如果他们抱着统一国家的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努力将是徒劳的，因为一个优秀而又精明的法国外交使节会因为失败的谈判而指责亲英政党（联邦党），并给亲法政党（共和党）以全部的支持。

美国大使只能表达悲伤和不安。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法国表示友好态度的国家，现在却发现仅仅因为自己拒绝满足法国的索贿要求而受到威胁。泰利伦没有耐心再浪费感情，让他的助手通知公使说，他已经致信给他们的政府，信中说专员们不合作、不友好、虚张声势。平克尼和马歇尔离开了法国，格里留在巴黎，因为他害怕如果不及时阻止，两国很有可能发生战争。

在听说谈判破裂以前，亚当斯已渐渐失去了对法国的耐心。随着共和党人不断地称赞法国，一艘法国私掠船“胜利者号”驶进了查里斯敦船泊场，劫掠并焚毁了英国的商船，这是对美国最高主权的公然挑衅。据说在加勒比海岸有 ~~还到~~ ~~愿~~ 多艘法国的私掠船扣押了众多的美国商船。法国政府下令拦截那些来自英国或在船上储存有英国货物的美国商船。~~员~~ 1793年 苑月，来自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的“沙莉号”帆船被法国截获，并扣押了除大副以外的所有船员，~~苑~~ 个法国人开走并处置了这艘船。一周以后，这艘船上的大副用棍棒一个个杀死了留下他性命的法国船员。这个年轻男子使帆船平安地返回美国，消息传得很慢，但是年轻的共和国是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这个公海上发生的英雄故事被广泛地传播着。

当 ~~载~~ 再在大灾难的消息传来时，两个亚当斯的内阁成员建议

他请求国会对法宣战。亚当斯确信战争不可避免，写下了关于美国误信法国革命原则的看法。他说，美国容忍的异端学说是假的，并且是不光荣的，这个异端学说即是相信两种革命的原则是相同的。“我们的革命是抵制革新，他们的革命是革新自己，我们没有权力去责难或称赞他们。”但是亚当斯认识到，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上，美国远远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共和党人也会反对战争。国会里有关谈判的谣言又起，说总统已经打算派人前去谈判。亚当斯在 1793 年国会上的演说犹如一枚炸弹，使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尽管亚当斯已经尽力把事情描述得不那么严重，但是国会还是出离愤怒了。全国人民都震惊于法国的索贿和威胁的暗示，这是对美国的侮辱。

然而杰斐逊却说亚当斯的演讲是荒谬的，他坚持认为亚当斯夸大了 载在事件，造成了对法国大革命的不信任（事实上，在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下，美国对法国革命的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全体国民站到了亚当斯的一边，亚当斯成了真正的民族英雄，而且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成了他所在党派的偶像领袖。行政部门堆满了支持总统的请愿书，建立了国家军队作为国家防御的象征性表示，并募集了上千万美元用来建立海军。反法行动影响了各阶层的生活，包括工匠、农民、商人、机械工等。年轻的男子都志愿去当兵。回顾起华盛顿时期的公民纪涅事件，人民以为法国再一次企图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并想分裂美国。法国现在的行为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法国曾经在美国的困难时期站到美国一边，但是 载在插曲却证明法国现在迷失了方向。马萨诸塞的立法者说：“她曾经为自由而战，现在却在为争夺统治权而斗争。”

亚当斯与泰利伦

历史学家斯丹利·埃尔金斯和埃里奇·麦基特里克写道：“亚当斯的整个执政时期，都被外交危机所困扰。与其他总统相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也可以这样说，亚当斯的政治哲学都集中于国内政府处理单一问题的理论，以避免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危机。有人说亚当斯的早期著作反映了他并没有作好直面国际关系的准备，但事实上正相反，亚当斯的早期著作和思考使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游刃有余，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亚当斯关于政府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类本质的表象和人类行为产生的动机。竞争、嫉妒、怀疑、复仇、骄傲、需要赞赏，这些情绪在外交关系中的强烈程度要远远大于在人类关系中的强烈程度。“你知道产生对英国有利的巨大的交易差额的原因吗？”亚当斯在1785年这样问杰斐逊。亚当斯认为，出于失去殖民地所产生的怨恨情绪，英国将他们的货物充斥着美国的市场，并不断骚扰美国商船。“他们怨恨其他人，甚至一艘船和一个船员，这种忌妒最后将使他们迷失自己。他们现在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害怕美国的船和船员，他们对我们航海事业的忌妒是如此强烈，他们甚至不惜冒着引发流血冲突的危险来实施复仇。”不管是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外交关系上，人类的行动总被一种动机所驱使着。亚当斯在把握这些事件的原因时，很少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第二个原因，亚当斯的早期著作中关于怎样处理权力现象的论述，已经为他接受外交的各种挑战作好了准备。亚当斯惊奇地发现，在国际政治世界中是没有理性和善意而言的。他在

《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写道：“对权力的欲望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因为人们的感情是无法满足的。”感情本身是被欲望驱使的，只能用来解释行为，而不能用来控制行为。因此权力有它自己的目的：扩展、扩张、统制和控制。权力和自由一样，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亚当斯相信，“自由政府的本质是对竞争的有效控制”，这就意味着用竞争控制竞争。因此，开明的外交政策的本质在于，对权力政治世界领域内超出国家或民族界限的竞争行为实施有效的控制。亚当斯不仅提倡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而且他还认识到“弱者就是狼爪下的羊”。革命的美国是羊，英国是狼，殖民地人民求助于法国，期望议会政府击败君主主义政体。

亚当斯认为行政部门的重要角色是在民主制和君主制之间，在“轻信盲目的多数”和“精明有主见的少数”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这不太像后来由奥托贵族俾斯麦发展出来的权力均衡理论。这个德国宰相相信，权力如果是以三权而不是以两权来操纵就会比较稳定。因此他确信，一个国家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不能通过与另一个国家联盟来反对第三个国家，而只能通过维持另两个国家的平衡关系来衡量自己力量的大小，以及自己在他们中间处于什么位置。很奇怪的是，亚当斯的后人，亨利·亚当斯，在19世纪研究科学时发现了“熵”的现象和使宇宙杂乱无章的热力动力学第二法则。但是在看待静力学的可能性时，亚当斯的观点和物理学家牛顿及哲学家詹姆斯·哈林顿相近，这两种并列的理论相互影响并且力量均衡。所以亚当斯说，在自然的事物中如果没有三种力量就没有平衡，如果政治和自然界一样只有两种力量，那就意味着一方最终被另一方所消灭。同样在国际关系中处理政治集团力量时，第三种力量也能形成三

角平衡力。亚历山大教皇以他的洞察力发现，冲突的热情是无法消除的，只能用一个冲突抵消另外一个冲突。亚当斯也期望实现俾斯麦的观点：一个国家可以利用推行不结盟主义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干扰。他在 1788 年 5 月给国会的信中说：“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世界上的航海和商业势力都会把美国看成是欧洲权力平衡的一杆秤。这种看法不会和我们的利益相抵触，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抛向任何一边的话，就会对另一边产生不利影响。”

可笑的是，泰利伦认为美国将进入强权政治的现代世界，他把美国视作是一个像日内瓦那样弱小、孤立的国家，不懂得权力如何发挥作用，也不懂得金钱如何代表一切。

当泰利伦发现美国没有被勒索、恐吓所吓倒时，他一定很惊讶。泰利伦和亚当斯之间的冲突，显示了松散的天主教徒和严格的清教徒之间的差异。他们一个人认为犯罪使罪犯腐化，另一个认为犯罪可以避免。泰利伦在美国生活过两年，在那里他与政治界的名人交往，也做投机生意。他和亚当斯都认为最好的外交藏在关着的门后面，谨慎是更好的美德。尽管法国革命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五人内阁的外交却是秘密的、官僚的、喜欢既成事实的。但是两位名人的品质不同，他们的经历也不同。当亚当斯不能第二次担任总统时，泰利伦看起来似乎能永远保住他的职位。他是个幸存者，经历了法国革命，逃离了恐怖，为拿破仑·波拿巴做过事，直到 1802 年波旁王朝复辟和 1814 年路易·菲利普上台。

泰利伦制造了国际关系的困境：一个为国家工作的外交官却在为个人谋私利，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却有道德缺陷的人。正如荷兰历史学家彼得·马里茨堡盖尔所说：“他是一个不能抵

制口袋里的诱惑的人，一个对国际政治和征服的虚伪性有着清晰观察和敏锐思维的人。”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不确定泰利伦是否曾用他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或者允许五人内阁依靠他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也许二者都有。

美国公众对 1793 年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观察到的，他们误解了泰利伦的意图，其实泰利伦同情美国人，还把亚当斯看作是与华盛顿对法国人更友好的总统。泰利伦和他的助手在美国的投资也因为与美国维持和平而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把自己当作美国和法国五人内阁中间可靠的调解者。泰利伦设法取得了五人内阁对在西印度群岛驻军的一致赞同。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一直试图恢复在 1789 年到 1793 年的血腥大清洗中失落的法国外交使团的职业水平。

泰利伦和他的助手也很感激亚当斯对法国的通融。亚当斯期望和平，这与他在国会的军事演说中指责五人内阁“寻求传播无政府主义和企图分裂美国”的言论有矛盾吗？五人内阁是被冒犯了，但是泰利伦知道亚当斯的演讲只是为了安抚联邦党人。尽管法国政府在 1793 年大选中支持杰斐逊，尽管法国思想家也知道亚当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敌对态度，五人内阁却没有过多地干预美国政治，也没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与支持杰斐逊的共和党人共事，以削弱亚当斯政府的力量。泰利伦甚至建议，五人内阁应当与亚当斯及他年轻的共和国进行正式的谈判。

因此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泰利伦：一个是实行索贿，靠欺骗而脱离困境的、有魅力的、欺骗的、散布威胁并下了最后通牒的泰利伦；另一个是在幕后的、狡猾的、自负的、被规则制约了的、对结果比对攻击更感兴趣的泰利伦。我们会知道泰利伦是美国真正的朋友，还是专横的敌人吗？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得

知，他对美国的赞誉是非常少的。他写道，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人民知道怎样开始革命，怎样进行战争，怎样取得胜利，但重要的是法国不知道怎样结束战争。

亚当斯希望对泰利伦有关谈判的议案进行回应，但是来自于他所属的反对法国的联邦党人的压力使他颇为谨慎。更早的时候，当准备选派三个代表去法国时，亚当斯想任命杰斐逊，但是杰斐逊拒绝接受这一使命。亚当斯在努力争取使代表中至少有一个共和党人，但是最后他失败了。因此亚当斯的建立一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努力只好屈从于党派政治，甚至是他自己的内阁。无论是联邦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支持他代表两党所做的外交努力。

汉弥尔顿和主要的联邦党人

虽然亚当斯明智地避免了与法国开战，但是一场政治战争已经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展开了。在国家首都费城，两伙人发生了争斗，一伙佩戴法国的三色帽徽，另一伙佩戴华盛顿骑兵的帽徽。这场灾难使亲法和反法的两个党派分裂了，到处弥漫着怀疑和怨恨。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富兰克林的孙子，共和党杂志《曙光》的编辑——家的门窗被破坏，房间也被堆满垃圾。有传言说，法国代理人要放火烧城，因此武装的士兵不得不在晚上巡查全城。亚当斯在总统府前也安排了哨兵站岗。

共和党把 载耳在事件看作是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说是一场为巩固亚当斯的位置而在国外蓄意制造的危机。他们说道，我们怎么知道政府没有误传泰利伦和他的使团的观点？法国是“姐妹共和国”，法国政府在对抗五人内阁煽动的对美国宣战的言

论。杰斐逊还为五人内阁辩护：“当葡萄牙大使企图诈骗时，五人内阁监禁了他，以避免腐败行为的产生。这和他们通常的行为一样，都是高尚的，不料却使他们自己被人怀疑。”

共和党不遗余力地挫败了亚当斯进行军事准备的企图。华盛顿政府通过了法令，禁止在和平时期武装商业船只。亚当斯请国会撤销这个禁令，杰斐逊站出来反对，他坚持说撤销法令是违反宪法的。他劝诫亚当斯说，法国真正的敌人是英国而不是美国。令亚当斯不安的是，大多数公众都支持杰斐逊的反对任何自然防卫的努力。但是亚当斯还是说服国会同意建造能带 12 门炮的快速帆船，让这个曾经梦想用“森林墙”作为国家堡垒的总统很高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建立一支拥有 10 艘军舰的海军。但是亚当斯建立真正舰队的请求却被拒绝了，美国人的常规军也被缩减到 1000 人。

在古典的共和主义理论看来，常备军是对自由的威胁。共和党人仅仅怀疑联邦党人对建立常备军等政策的支持是他们具有贵族统治和君主制倾向的证据。常备军队使大家恐惧，因为它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军队都已经全副武装且完全由政府精英来领导。由于有这样一个欧洲暴民的形象在心中，杰斐逊既反对建立常备军队，也反对建立海军。结果，在以后 10 年的战争中，美国发现自己没有可供派遣的军队。

亚当斯在执政之初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的上任，是以我和法国的误会为标志的，我在努力寻求和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接受太多的侮辱。”约翰·昆西虽然年轻，但已经作为最出色的外交官与其他公使一起被派往法国。最初亚当斯对于任人唯亲的指控太敏感，因而不敢任命约翰·昆西。随着第一次外交活动的失败，总统需要新的人员去与五人内阁进行沟通。

在亚当斯执政时期,美国与法国的关系处于“准战争状态”。双方都作出武装对抗的姿态,法国袭击美国的商船,美国准备军事演习。法国仍然从美国贷款并同英军作战,并且声称既然美国同他们的敌人英国签订了条约,那么他们就有权掠夺美国船只,没收美国的货物,扣押美国的人民。共和党人在议会中占大多数,他们不愿意给亚当斯太多的海军力量去保护加勒比海岸的美国商业。幸好,用最新火力和航海技术武装的快速帆船表现很好,它们成功地摧毁了一些法国战船,让世界人民大吃一惊。

可能发生的战争并没有促进国家的统一,直到战争爆发。在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痛苦地发现自己分裂了。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人相信,同法国开战会使美国与英国靠近,他们认为亚当斯有把美国带入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嫌疑。英国用它强大的海军统治着海上,共和党因而认为英国将给美国的商业和自由带来巨大的威胁。

亚当斯领导的联邦党人和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北方联邦同盟盟员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财政联系,一些美国家庭与英国财政界的人有关系,汉弥尔顿也在热切地寻求伦敦银行家的支持。南方也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种植园主的烟草、稻米和其他商品的大部分市场都在欧洲。英国也为种植园主提供进口货物和贷款。因此,南方发现他们在战前处于最好的位置,而现在则成了伦敦银行家的债务人。他们因而把英国看作是“店小二之国”以及贪婪的银行家和信贷者的国度。这种对英国的指控引起整个南方的响应,共和党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甚至在亚当斯自己的联邦党内也没有一致的外交口径。重要的联邦党人大部分是反法而亲英的。亚当斯的国务卿

皮克林领导了观念上的圣战，以对抗雅各宾派的威胁及其无宗教的信仰和无政府的信仰，这就使美国和英国联合在一起。另一个联邦党创始人乔治·卡贝，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害怕亚当斯会成为杰斐逊的工具，怕他被亲法分子说服。这位联邦党创始人怀疑，亚当斯在做和解的就职宣誓时态度就软了下来。最极端的怀疑者是威廉·柯伯特，暂时住在美国的英国雄辩者，当时担任某杂志编辑。他攻击英国流放了汤姆·潘恩，他还警告不要让法国人在爱尔兰移民的帮助下入侵美国。他曾因为殴打妻子而被判入狱，他还巧妙地使自己有机会与总统及第一夫人一起进餐。更有影响力的人是费舍·艾姆斯，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他不相信民主及其推动力，担心宪法是个脆弱的结构，怀疑共和国能否走进 19 世纪，并同意汉弥尔顿所说的“先生，你的人民是刁民！”

尽管汉弥尔顿是反法亲英的，他却不是战争鹰派人物。厌恶战争的国防部长麦克亨利提出建议说，国家及众议院议员还没有做好宣战的准备，这也是汉弥尔顿的意见。但是汉弥尔顿已经重返政治舞台，其目标是建立一支成熟的军队。谁来领导军队呢？汉弥尔顿曾与华盛顿沟通，建议他与法国公开断交，这将使人民重新由华盛顿将军领导并取得胜利。然而，华盛顿怀疑当时的形势不可挽救，因而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皮克林想看到汉弥尔顿领导军队，并让华盛顿推荐他。但是华盛顿将军提醒内阁大臣说，最后的决定应由总统来做。华盛顿推荐了三个人，由汉弥尔顿做副指挥官，第一指挥官则由亚当斯自己决定，但亚当斯没做任何任命就回到了昆西。

亚当斯的离开让决定这个重要职位的权力落到了内阁成员手中，他们支持汉弥尔顿，汉弥尔顿因而取得了军事指挥权。这

种情形对亚当斯来说是很没面子的——作为国家最高领导，却没有军事决定权。亚当斯不否认汉弥尔顿有做军事领导的天赋，但是他和其他人一样疑惑：汉弥尔顿真的需要他的军队吗？与法国的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一些联邦党人感到很不安，因为共和党人格里仍留在法国交涉，其他人则谣传说法国将要入侵美国。亚当斯不再是英雄，他看起来很不高兴，并生气地回到昆西。当麦克亨利劝他返回华盛顿时，他以妻子生病为由仍然留在昆西。他补充说：“军团的花费在不断增加，却没有明确的目的。现在仍然没有法国军队来袭的迹象。”

亚当斯在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很受爱戴，在那儿他的名望很高，当革命到来时，他的名望如花岗石一样坚固。人民知道，亚当斯在遇到法国的欺骗和英国的嫉妒时从来没有动摇过。亚当斯和阿比盖尔深深地被波士顿街边人们的欢呼声感动着，但在其他地区，特别是费城，人们的反应是冷淡的，甚至是残酷的。贝克的《光明报》刊登了在载有事件中泰利伦的叙述，声称亚当斯歪曲了谈判的本质，总统被描写成“老的、吹毛求疵的、秃头的、瞎的、跛的、没牙的亚当斯”。对丈夫的攻击激怒了阿比盖尔，她争辩说反对派在歪曲事实和毁坏政府声誉方面走得太远了。她说道：“什么都无济于事，直到国家通过《惩治叛乱法》。共和党人的愤怒应该发泄到热心人头上。”当然，她是指发狂的共和党编辑。对杰斐逊来说，新闻媒介至少在反映他的观点，也没有冤枉他，“如果这些文章失败了，共和主义将彻底被清除”。杰斐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这样说道。

杰斐逊曾经评论说，如果让他选择是要一个没有新闻报道而有政府的国家，还是要一个没有政府而有新闻报道的国家，他宁愿选择后者。与党派相结合的新闻报道就是杰斐逊打倒政府

的手段。他说一旦他成了政府的代言人，他会把政府还给人民。他作为总统，要做的仅仅是人民让他做的和需要他去做。当亚当斯问他，什么领导和机构能在总体上代表人民时——人民自身内部也有分歧，杰斐逊回答说，民主是一致的、和谐的。因此，如果亚当斯因为怀疑而不高兴并产生自我质问，那么杰斐逊仅仅是因为自认为合法而充满自信。但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和《为美国宪法辩护》的作者都相信，只有谨慎地制订宪法才能控制分裂人民的“激情”和“利益”。相反，杰斐逊却认为人民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优秀的、团结的。“上帝的选民”缺乏的不是美德，而是自己的声音。

第六章 战时手段、自由演说、国家权力

《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

1793年的夏天,亚当斯政府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但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的衰落。载舟事件使亚当斯成为人民眼中的英雄,共和党人反对派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国会抱着这种心理满足亚当斯的任何要求,甚至赞成建立海军部,由能干的本杰明·斯坦得领导,他曾经领导武装船只去攻击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法国商船队。由于共和党人的退却,国会批准了《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这是第一夫人一直要求的,亚当斯自己对此并不热衷,但出于政党政治的原因,亚当斯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系列后来臭名昭著的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个重要的总统在其执政时期都会留下深深的遗憾,一个本来应该避免的行动却发生了,这样的行动效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为对手的把柄。总统回忆录有时充满歉疚,或否认行政部门和政治灾难有必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诚实的”亚当斯也说《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与他的政治纲领没有任何关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亚当斯没有任何参与“制定法律条例”的记录。早在美英交战的时候,亚当斯也曾发表自由演说为这一点辩护过。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不管亚

当斯怎样抱怨新闻媒介对他的攻击是近乎“毁谤的”，他们都相信是因为亚当斯而形成了产生罪恶法律的舆论环境。

国会通过并由亚当斯签署的法规有四个。《移民法》意在增加外侨成为国家公民的居住年限，从要求在美国居住 5 年增加到 10 年。立法者不仅担心与法国战争的可能性，他们还因为美国存在政治避难者而不安。一些法国人来自巴黎或圣多明哥，他们还带着对吉伦特派或雅各宾派或保王党人的依恋。其他人来自于英国，如不信教的科学家约瑟·普瑞斯特里，他带着对宗教的憎恨加入了反宗教团体，竭力瓦解基督教会。还有毁谤的制造者，记者托马斯·凯林德，一个“笔触污浊的记者”，他向人们讲述了关于杰斐逊和他的黑人情妇沙莉·海明斯的故事。像杰斐逊在昆西遇到的赛马者一样，许多逃亡者在革命时期的美国把自由人看成是野蛮的，说他们准备好攻击一切象征权威的东西，毫不惧怕断头台、斧子、绞绳、巴士底狱和法庭。

法国革命的五人内阁不遗余力地劝服爱尔兰人，说美国已经为怎样脱离英国统治树立了典范。为了摆脱英国的残酷压迫和改变乡村艰苦的生活状况，爱尔兰移民涌入美国。他们不像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更像激进的同情法国的共和党人。一个比较早的到达者是好斗狂暴的马修·里昂，他是以契约仆人的身份来到美国的。在革命期间他参加了战争，在投机的土地上成为富人，后来成为弗蒙特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当康涅狄格州的罗杰·格利斯沃尔德藐视佛蒙特州的军事实力时，里昂站起来朝他脸上吐了一口痰。几天以后格利斯沃尔德斥责了里昂，并用山核桃手杖不停地击打他。里昂跑到礼堂的前面抓起一枝壁炉的火钳，两个人互相谩骂并扭打起来，直到打得头破血流才被拉开。在费城，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阿比盖尔抱怨道，应该“驱

逐这个可恨的人”。里昂作为一个亲法分子来到新世界，他想尽力从英国人手中把美国挽救回来。对于这个发狂的共和党人，亚当斯一定曾经这样想过：“谁将从爱尔兰人手中拯救爱尔兰？”

《国籍管理法》的目的在于控制法国的一些政治逃亡者在没有宪法允许，美国也没有明确对法国宣战时登陆美国，同时，打击由来美国的政治避难者组成的政治反对派因背叛共和国的行为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在法律上更有争议的是《外侨管制法》、《敌国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外侨管制法》赋予总统驱逐那些被断定对国家安全和和平有威胁的外侨的权力。《敌国外侨管制法》允许总统在战争期间下令驱逐那些来自敌国的侨民，总统有权反对他们留在美国，并限制他们的自由。最有争议的《惩治叛乱法》则规定，对有严重不轨行为者将处以罚款，数目不超过 5000 美元，并且入狱时间不超过 5 年。这个法案针对所有违反美国法律的人。该法案还规定，任何写作、印刷或出版虚假的、丑闻的、意在毁谤、反对美国政府或国会的人，都将遭到强制的镇压。

阿比盖尔欣喜若狂，有了这样的法律，美国将能除掉像来自佛蒙特州的里昂那样的暴民。作为第一夫人，阿比盖尔对曾经攻击她丈夫的报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击。“让这些阴险的人停止狂吼，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他们会用自己的毒药毁掉自己。”阿比盖尔这样说道。她还寄给姐姐一份报业攻击亚当斯的材料，并说：“政府需要武装自己来对付这样的暴行。”18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政治居然使最文雅的女士也变得如此强硬。

至于亚当斯总统，他的确签发了逮捕令，要逮捕《纽约时报》的编辑约翰·达恩，还有《费城光明报》的编辑威廉·达恩——两个人都在阿比盖尔要还击的名单之上。但是逮捕最后没有实

施。亚当斯与联邦党创始人、现任国务卿平克尼不同，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他在形成法案和促使国会通过法案方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平克尼则忙于打击反对派的报纸。随着 1798 年选举中联邦党人的失败，这两个法案在他们最后的两年期限内就中止了，没有一个外侨被驱逐。

“国家领袖受伤了”

《惩治叛乱法》违反《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了吗？《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曾特别指出，国会不具有制订任何有关限制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方面的法律的权力。亚当斯坚持认为，正如林肯在 1861 年的内战中所经历的危机那样，国家处于要分裂的状态中，政府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人民，而这些保护会被那些图谋颠覆共和国的人所破坏。据估计，在那时有 3 万法国人在美国，还有上千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都是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逃难者。毫无疑问，很多人对美国和美国的政治机构是忠诚的，但是有很多人也同情法国革命。实际上，《外侨管制法》的威胁给法国泰利伦的助手敲响了警钟。按照杰斐逊的意思，他们安排了一条船，把有着不满情绪的、绝望的调查员送回了巴黎。这些人最后发现，美国人不会为了取悦法国五人内阁而起义反抗美国政府。

关于宪法的争议像一把剑一样刺入亚当斯政府的心脏，尤其是从一个敬畏法律规则的总统看来更是这样。在阐明法案时，国会的联邦党人搬出了不成文法的英国传统，根据这种传统，对在出版之前的表达自由“没有事先限制”，但是那些发表了可能煽动犯罪言词的人最后可以被提起公诉。实际上，美国的

条例被证明比不成文法还要温和一些，它不需要意图进行颠覆活动或实行叛乱活动的证据，出版物本身就可用来定罪。美国的法律允许将毁谤情绪存在的事实考虑进来，不仅仅是观念的表达，而且还包括它的内容和动机，这些都可以提交给法官用于裁定案件。

《惩治叛乱法》使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分歧，正如它使 18 世纪晚期的党派产生痛苦的分裂一样。斯丹利·埃尔金斯和埃里奇·麦基特里克相信，亚当斯的对手这样严格地阐释宪法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是为了否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采取措施的权力。反对派表示，如果能够禁止政府实施某个人反对的一系列措施，他们愿意放弃一定范围内积极行动的机会。这个争论和通常一样，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的。近似的，大卫·麦克卡洛夫同意亚当斯的《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是“战时手段”，尤其是在恐怖和不安全的时期应该想起它，利用它。培治·史密斯也提醒我们，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战争，是唇舌纸笔和愤怒诽谤之战。鉴于反对党的压力，亚当斯不得不接受现实，正如史密斯所写的那样：“可能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历史上最狂暴和最恶毒的事情。”

共和党人则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1794 年 7 月，阿尔伯特·盖林特，杰斐逊的顾问，站在国会议员的立场来解释联邦党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把权力从外部转移到中央，从州政府转移到联邦政府。盖林特声称，所有的政府都具有自我保护的权力，但是管理外侨地位和他们言论自由的法律属于他们各自所在的州。盖林特和其他共和党人区分了国外的和国内的事务，一方面是国际商业和战争防御，另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事务，如税收的争议和西部领土的分配问题。在国内事务方面，宪

法必须被严格地阐释,应该削弱总统权威。联邦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国际事务中才能被广义地阐释。很显然,共和党人和亚当斯一样,并没有把《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看作是“战时手段”。相反,他们加入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论,认为言论自由的司法权单独归属于州而不是国家政府。

但是在理论的细枝末节之外,政治仍然保持了它的现实性。共和党人指责联邦党人的所作所为,就如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共和党人一样——用准战争的威胁来达到政治的目的。盖林特声称,《惩治叛乱法》“仅仅是执政党才可以使用的武器”,是一种攻击国内自由权力的方式,是摧毁共和制把美国变成君主制国家的第一个步骤。而联邦党人则相信,反对法案的力量来自于那些力图使美国接纳法国革命中的凶手和法国革命中的街边游击队员的人们。

最后,生死攸关的不是党派政治,而是直到流血的内战爆发才解决的巨大的争议:主权到底在哪一方?《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引起了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回应,他们让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对这项法案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国会否决权和使法律无效的权力是违反宪法的。《惩治叛乱法》宣布,1798年的《弗吉尼亚决议》是“可怕的权力的产物,是对州主权的重创”。亚当斯的对手,不再争论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事情,而是更多地关注州的权力,即州政府在裁定什么是扰乱治安和诽谤方面的权威性。

这样的处境对麦迪逊来说是很尴尬的。1798年,在关于宪法的早期争论中,他站在反对的立场,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州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杰斐逊也无法决断主权最后的归属。在他成为总统之前,主权属于各州;他执政之后,主权属于

联邦政府 现在,主权由一个在没有宪法授权的情况下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并且禁止自由贸易的人控制。但是在亚当斯执政期间,关于法案的激烈争论与党派政治是一致的。

关于《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的争论,构成了美国政治哲学的基础。亚当斯和联邦党人都认为,一个有着监督和平衡能力的强有力的政府是自由最可靠的保证。杰斐逊和共和党人则认为,自由的最好保证在于各州和各州与人民的紧密关系,人民需要更少的监督和平衡。

同时期的历史学家,一些杰斐逊主义者,美化了共和党的争论。彼得斯·奥努夫和莱昂尔·萨多斯基写道,《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进一步证实了“行政权和立法权都落入了对共和国很不利的力量手中”,因为该法案承认“在完美的共和国中,无法保留受保护的空间”。另一个历史学家,理查德·罗斯菲尔德,指出亚当斯的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政府,一个由于《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把国家置于战争和自由的垂死挣扎边缘的政府,它带来了一个“恐怖时期”。

“恐怖时期!”一个由法国革命引起的特定时期,它跨越大西洋来到了美国。共和党人说道: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在军队没有行动之前,一切流血的审判、所有的斩首都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展开。“一定要用暴力去控制人民”,这是杰斐逊一直在鼓吹的陈词滥调。更难以让人接受的论点是:在亚当斯执政期间的法案,没有为共和国生存留下一点受保护的空间。毕竟,在所谓“恐怖时期”,法庭继续起作用,陪审团的审判仍然有效,权力的分离仍然原样未变,新闻出版没有受到限制,民主政治照常运转,外侨的生活很好,更多的本地反叛者获得了自由(卡伦德和里昂除外,他们被判入狱一个月,这个判决和亚当斯没有任何关系),选

举照常进行，联邦党人甚至被击败了。一个被猜测为了把国家带回君主制而削弱了共和制的政权，又怎么可能没有声响，没有啜泣，甚至没有一点点的害怕和一滴眼泪，也没有进行政治抵抗就让渡了手中的权力？

州对国会法令的拒绝执行与国家主义

如果说《外侨管理法》和《惩治叛乱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它们不受欢迎，并且对国家统一毫无作用，有很多人还成了法案的牺牲者，那么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也一样。但是二者还有一点区别。联邦国会的法案马上被与亚当斯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的起因，是谁在幕后操纵，又是为了什么目的。杰斐逊的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他安排了肯塔基州议会下院的议员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共和党的核心力量给人们制造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决议是正确的、民主的，并且反映了人民群众自发的热情。这些决议第一次明晰了州对国会决议的否决权，州有权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行使主权，而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未经许可的，因此也是“非权威性的、无法律效力的、没有约束力的”。

杰斐逊有一种亲近倾向，他确信近的是最好的，远的是叛逆的、不可靠的。他期望州对国会法令的拒绝执行，将会激起公众的热情，并为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共和党人赢得全国的支持。但是邻近肯塔基和弗吉尼亚的各州仍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并拒绝赞同这个决议案。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共和党人几乎不反对《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这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如果说亚当斯高估了在美国发生叛乱的可能性，那么杰斐逊则

低估了国家主义者强烈的感情。

阿比盖尔·亚当斯斥责道：“《佛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案》就是疯子的行为。”她和她丈夫知道是杰斐逊在幕后吗？美国自己的副总统已经制订了分裂共和国的方案。如果美国人知道杰斐逊是一个不实际的分裂主义者，杰斐逊可能就没有政治未来了。亚历山大·汉弥尔顿是杰斐逊的死敌，他没有立刻得知结果的背景，他几乎对杰斐逊政治运作的秘密活动没有任何怀疑。汉弥尔顿出于政治上的不明智而反对《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但是他对法国仍然保持着坚定的敌对态度，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图，并坚持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坚定立场。然而亚当斯不是一个能被吓倒的人，即使是一个有着强烈意志特征的汉弥尔顿也不行。

在联邦党人中，美国同法国关系的紧张是由于埃里布里奇·格里造成的。这个马萨诸塞州的前任议员，反对汉弥尔顿的措施，也不为自己的政党所信任。让联邦党人惊愕的是格里住在巴黎，仍然抱着希望与泰利伦进行接洽。他首先获得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向他父亲保证，法国无意对美国宣战。但是回到家以后，他才知道泰利伦已经操纵了格里。“那是泰利伦的阴谋。”阿比盖尔写信给他的女婿威廉·史密斯说，“我怕我落入他的陷阱，他太狡猾也很有魅力，能让大家都喜欢他，也能很容易地打败他的对手。”格里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头脑里总是存在着错误的缺陷。

当格里于 1793 年 5 月 1 日从法国回来时，正处于《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争论的中间阶段，他遭到了波士顿的联邦党人的斥责，他们怀疑格里在法国是单方面地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分裂了美国使团。当格里骑着马去昆西与总统商议事情时，

他发现亚当斯很容易地接受了他讲述的关于如何与泰利伦交涉的经过。但是总统成了众矢之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反对党的报纸《光明报》指责亚当斯在制造和延续与法国的危机,即延续 1793 年在事件的不良影响,却赞扬格里是“和平的预言家”。曾经有人建议亚当斯说,“现在对法国进行赔偿要比先和她开战,然后再进行赔偿更好一些”,亚当斯宁愿去购买和平也不愿意去为战争付出代价。然而他的政党却被激怒了,国务卿皮克林喊道“真是可耻”。在欧洲的美国大使把格里描述成一个自认为谈判能力不错而显得很傲慢的人,说他关于和泰利伦讨论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所以没有必要给予理会。约翰·昆西·亚当斯寻求与法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但是也有他自己的怀疑,他告诉约翰·亚当斯,法国使格里变成了一个“害怕与法国断绝来往胜过害怕不光彩”的人。因此法国人会迫使格里接受任何措辞,包括在国内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东西,这些言词会煽动美国的分裂。亚当斯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汇报,排除了个人的诡辩和政治热情,谨慎地做出了正确的政治决定。但是联邦党内的领导人仍然很固执地保持着很早就对法国持有的敌对和怀疑的态度。当 1793 年战争危机扩大时,亚当斯表现出很明显的优柔寡断,且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作为总统,他坚信进行权衡选择是最明智的,他站在独立的立场并单独行动。

“联合,我们站起来;分裂,我们倒下去”

外交事务分裂了联邦党,国内政治则使共和党更加分裂、更加沮丧。杰斐逊的关于“州对国会法令的拒绝执行”的概念比《外侨管理法》和《惩治叛乱法》看起来更令人怀疑,引起的分裂

也更大,尤其是因为在弗吉尼亚,除了当时的政治,并没有事实能作为其理论基础。阿比盖尔不是唯一一个对于杰斐逊当选总统后的行为感到迷惑的人,现在她在争论亚当斯曾支持但遭到杰斐逊反对的关于行政权威的问题。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执政的末期,杰斐逊写信给阿比盖尔并骄傲地告诉她,他是怎样使用总统的权力去消除《惩治叛乱法》遗留下来的影响,“因为我考虑到现在这个法律是无效的,好像国会已经命令我们倒下去并去崇拜一个金色的雕像那样绝对和明显。我的责任就是在各个场合阻止它的实行,并且把那些因为拒绝崇拜雕像而被扔进火热的炉子里的人解救出来。”

杰斐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拯救者,他将拯救美国于有着总统独裁倾向的联邦党人的手中。毫无疑问,阿比盖尔相信她的丈夫的能力比杰斐逊强。当杰斐逊在任和不在任时,她都与杰斐逊保持联系,尽力去解释一些事情,她很纳闷为什么一个人会那么怀疑另一个人,但是她相信丈夫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杰斐逊被认为是“美国的斯芬克斯”,他使用了约瑟·坎托里斯的分类理论,坎托里斯是一个藐视理性的政治哲学家。杰斐逊在寻求保护美国共和的纯粹的完整,但是他在关于主权概念的立场上的转换很容易就削弱了他所追求的东西。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期间,杰斐逊在最高法院任职,并不比立法者逊色多少,他有权力否定国会的法案和其他行政部门的法案。然而在他自己执政期间,当司法部的决议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时,他会支持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否决。他的理论基础在于,只要是他不赞成的想法或行动,无论他们来自少数精英阶层那里,还是来自于民主的大多数人,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消除掉。因此,对与杰斐逊来说,主权在于国会,或是最高法

院,或是独立的州。然而在共和的理论上,议会或者国会是权威的最高层,它的决议是无可争议的,无可指责的,不能抗拒的。亚当斯了解到国会也会有错误之处,但是仍坚持共和的定义是“法律的规则而不是人的规则”,那也就是说“赞同会使法律更具有约束力”。亚当斯察觉到杰斐逊支持者的左右为难,他们无法解决这种在自然权力和普遍主权之间的张力问题,也无法解决个体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力和被选举出来的各个政府部门的代表采取措施以保证国家安全的重任之间的张力问题。但是杰斐逊不顾权力和主权之间的争论,仅仅把主权带到他所需要之处,似乎主权是归他私人所有而且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因此在 1794 年 1 月,杰斐逊领导南方试图在他的家乡弗吉尼亚种下州主权的种子。弗吉尼亚州已经通过了谴责《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决议,并且准备听取州对国会关于承认无效法令的案件的证词,这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国会的分裂和弗吉尼亚州退出国会。但是乔治·华盛顿对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公然抨击国会深表遗憾。华盛顿不相信他的弗吉尼亚在 1794 年还极其拥护政府,但是现在却要抛弃对政府的忠诚。令华盛顿难过不安的是,弗吉尼亚已经选举了州议会下议院的候选人,这个人反对联邦政府。绝望中,华盛顿敦促亨利参与这场政治战役,并尽力在国会或州的立法院获得一席之地。热情的亨利成了一个联邦党主义者,但是他年纪太大,身体虚弱,承受不起委员会斗争的劳累。尽管他承认他在州议会竞选中失败了,亨利还是于 1794 年 1 月,在沙罗兹维的一个乡村酒店里发表了他最后的、很值得纪念的演说。

亨利告诉人们,当他看到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时,他和他们一样感到沮丧。他与弗吉尼亚一样抵制中央集权,但是现在我

们必须承认，一些事件已经扭转了历史的方向，人们不应该让自己的愤恨掩盖正义。如果弗吉尼亚人民无法忍受压制，他们当然有权力推翻政府，但是，这样的行为必须等到所受的侵害已经非常严重，并且传统的政治手段已无法发挥作用时才能实施。“联合，我们站起来；分裂，我们倒下去。让我们不要站在将会毁灭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联盟的党派那边去吧。”如果弗吉尼亚人反对联邦政府，他们不得不面对华盛顿，华盛顿会领导军队反对他们。有“敢举起自己的手，反对自己祖国的美国人吗？”“不，你不敢，这是杀害亲生父母的企图，武器会从你无力的手中跌落。”

这就是“~~1776~~1776年精神”的再现。弗吉尼亚人 and 新英格兰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站到了一起，亚当斯要亨利加入到法国的使团中去，但是这个 ~~1776~~1776年的老英雄，伟大的演说家，他曾经发表过脍炙人口的演说“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死亡”，却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婉言谢绝了总统的任命。但是，他对亚当斯最坚定的支持已经在酒店的演讲中传承了下来。

第七章 美国的风景画

一个没有脊梁、充满惰性的国家

约翰·亚当斯的强敌不仅有杰斐逊、潘恩和共和党的亲法分子,还有美国的地理环境。18世纪 80年代晚期的美国自然条件使得地方主义超过了国家主义。尽管美国旨在统一国家宪法,但是国家本身是没有支柱、没有脊梁的,国家是一个没有精神核心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没有强有力的中心结构的松散的系统。美国人民选择了这种形式。

1787年的制宪会议规定,政府立法部门“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确切的副本”。既然社会作为一个有不同部分价值和意义的整体而存在,那么权力必须是分散的,主权也是部分的。在费城起草宪法时,约翰·亚当斯在伦敦为了保护宪法写了三卷本的政治哲学著作,但是由于起草者忙于制订分配权力给联邦政府的计划,亚当斯只好自己单独去阐明政府部门重要性这个论点,并说明总统作为一个机构,能使国家统一、有凝聚力和团结在一起。大多数起草宪法的人都害怕行政部门,并把它看成一个潜在的专政根源,是君主制的同义词。对于众多的美国人来讲,行政部门就如近代殖民时期不列颠的君主制那样具有威胁。他们害怕行政部门的权力和中央集权,如同在我们的时代人民害怕经济

全球化一样。看看美国的地理情况，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这种忧虑的原因。

美国的自然环境特征，使美国人很难从国家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在亚当斯执政时期，美国有这样的人口调查数字：1790年，美国有390万人，其中150万是黑人奴隶，150万是爱尔兰人，150万是法国共和国民众。但是相较于其他基于民族、历史关系、共同的语言和相对高级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而建立的国家而言，美国则是由各种新移民浪潮汇成的大海——英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荷兰人、苏格兰人，所有的人都在这片未开发好的、充满野性味道的土地上共同描绘着美国的风景画。这时的美国只有三条主要供车辆行走的路：一条横穿宾夕法尼亚的阿勒格尼山脉，另一条在波托马克河边，还有一条经过弗吉尼亚和卡罗莱娜。这些路至多只清理了路上的灌木和荆棘丛等障碍物，旅行是沉闷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从首都费城到纳斯韦尔要花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当亚当斯从费城到昆西时，他以最快的速度还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报业在抱怨糟透了交通运输条件，据估计，在北方各州长途汽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 9 英里。

乘驿站马车旅行本身就是一次痛苦的折磨。50 人挤进一辆马车，行李堆在周围，车颠簸在不平坦的路上，行人还要担心夏天的洪水，而且只能靠车顶和侧壁上的皮革去防暑和驱寒。在北方，旅行途中人们不得不与山路、泥泞、路滑对抗，而在南方则是与洪水与河流作斗争。杰斐逊在从他家到曼特萨楼的旅途中写道：“从这里到华盛顿之间共有 100 条河流，其中 50 条河流上没有桥或渡船。”

水路旅行或许舒适一些，但是通航的船却很少，多数的河流都是独立的，并不汇入另一条河流之中。革命英雄汤姆·潘恩设

计了桥,亚当斯和汉弥尔顿都认为帆船是美国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试图建设这样的工程,但是没有人支持他们。美国人严重缺少关于船运的科学知识,他们更多的依赖潮汐而不是技术。1864年,一个愤怒的费城人在从纽约开始的旅行途中写道:

在边城,我们搭上了第二艘船,船上食宿的条件非常糟糕。大约下午 5 点,我们从特拉华开往费城,行驶了 100 英里。船长是一个 15 岁的男孩,他很富有煽动性,他和他的同伴雇用了 5 个或者 6 个搬运工。在途中,我们三次与逆流而来的船相撞。在船上,妇女和儿童整夜地睡在船舱光秃秃的木质船板上。我们在周三早晨大约 8 点钟到了三角形街码头,这时我们已经行驶了 5 个小时,却只前进了 100 英里。

旅行的艰难和危险把美国人民隔绝开来,国家的报纸、邮政系统就像四轮马车或平底船那样缓慢。送一封从缅因到佐治亚的信需要 10 多天的时间,在阿勒格尼山以外,能与其他地方联络简直就是奇迹。每个地区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身份证,他们所在州的居民都是分散居住。大多数政治人物都认为他们只代表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整个国家。亚历山大·汉弥尔顿是个例外,他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加勒比海岸。亚当斯认为共和国是一个整体,他的责任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但是他发现,他在波士顿比在巴尔的摩更受人们的欢迎。

尽管 1864 年到 1869 年是亚当斯当政时期,但是实际上他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段时期处在杰斐逊主义的影响之下。

美国不能作为一个整体站起来，它是无脊梁的、没有支柱的。它有惰性，不愿意接受大胆时新的事物。今天，美国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而在18世纪80年代，西欧引领世界潮流，美国却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赶上它，甚至不想去跟随它。

美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仅仅因为土地资源丰富而略显宽裕一些。但是因为缺乏舒适健康的生活条件，那儿的生活是原始的、粗糙的，甚至可以说是贫穷的。利考特在穿过弗吉尼亚旅行时写道，种植园主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修缮他们的马厩，而不是建造他们自己的公寓上。在新英格兰，木房子又小又窄，难以适应当地的气候。由于饮用水出了问题，肺病、伤寒病、猩红热、白喉等各种传染病肆虐。有一部分纽约人感受到了金融和商业的繁荣，并从中获益；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只是靠家庭劳动，维持着基本的温饱，无论他们生产出什么——自制的亚麻、奶酪、鲸油——都运往国外。虽然纽约铺设了供水管道，但是大家仍然没有享受到清洁的饮用水。1793年，黄热病席卷了整个城市。很多欧洲来的旅游者惊讶地发现，美国人竟然生活在这样简陋的、让人沮丧的环境中。他们的饮食习惯尤其让人反感：每餐都有咸肉，用水冲一下就伴着酒咽下去。一个法国人说道：“我冒昧地说，如果要选出哪个国家的食物对胃、牙齿和健康最有害并给以奖励的话，当选的应该是美国。”

约翰·亚当斯很注意他的饮食习惯，但是他也患上了伤风感冒、胆结石和痛风。亚当斯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他的健康得以保证应该归功于本杰明·拉什医生，拉什给亚当斯送过很多的药，甚至包括镇定剂。美国虽然有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致力于科学的人，但是科学水平仍远远落后于欧洲。

美国有几个具有发明天赋的工程师。奥立佛·伊文思发明

了火车蒸汽发动机,罗伯特·富尔顿后来也制造了一个。但是富尔顿在他日记中写道,他的建议遭到了抵制甚至嘲讽。

更富于悲剧色彩的是约翰·费茨的经历。他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钱的机械师,他设计了一个蒸汽发动机和渡船上的桨。这艘船的航行很成功,以至于费城的人整个夏天都在注视着它在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当时的潮流。然而当富尔顿的船试航成功时,他的公司却倒闭了,他筹集不到更多的钱去挽救他的公司,民众拒绝用他的船,也不给他任何经济援助。亨利·亚当斯写道:“公众不需要也不相信它,他们的侮辱让他心碎。”费茨同失败作着斗争,想挽回局面,他又发明了另外一艘使用螺旋桨带动的船,但是东部的民众对此仍漠不关心。他来到肯塔基州,试图在西部的水域碰碰运气。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在那里遭到的冷遇和在费城与纽约一样。最后他试图醉酒自杀,但是过程太慢。他又从医生开的药中积攒了 50 个鸦片丸一起服下,最后在一个清晨死去。

亚当斯的时代,美国并不缺少技术天才,但是民众不愿意支持有关技术改造的活动,甚至海军都被看作仅仅是基于对法国的担忧而建立的。富兰克林的静电实验早在 1752 年就进行了,但是直到那个世纪末,电力工程仍然维持在早就被利用的照明用途的领域内。杰斐逊鼓励富兰克林和另一个费城的科学家大卫·瑞特豪斯致力于有益社会的实验的同时,又劝阻他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公共服务设施上。

在 19 世纪末,道路的建设、路面税收、公共航空运输、水运网络、蒸汽燃料动力的螺旋桨的应用、水力发电都尚未发展起来,直到 1890 年后辉格党兴起时才逐步得到重视。在亚当斯的时代,这样的发展是与旧世界相联系的,人们不仅需要交养路费,

而且还要支付修道院、教堂及王室的费用和他们奢侈的开销。已经逃离旧世界一切负担的人把自由看成是“追求幸福”，这意味着享受没有限制、没有责任的生活。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似非而是的论题：杰斐逊时期的美国遗留给国家的对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力的庇护，实际上是赋予自由主义本身以价值，因此只对现状采取保守的态度。科学家们在努力把美国引向未来，但是正如亨利·亚当斯观察到的那样：

可能富尔顿和费茨，像其他发明家一样，夸大了公众的冷漠和公然蔑视，但是无论改革的精神多么热切，保守主义还在统治着世界。经验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他们确信曾经存在的将永远存在着。在 18 世纪将要结束时，没有什么能保证美国可以解决物质苦难。极端激进主义分子托马斯·杰斐逊和阿尔伯特·加兰蒂也仅把目标定在美国能够建立起没有欧洲恶习的简单的欧洲共和社会形式。即便如此，他们的反对党也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已经比旧世界向前跨了一大步——他们已经同意用同一个共和体制去拥抱半个大陆的实验。不过，他们对成功却不是很有信心。杰斐逊也不认为这种想法有多重要，他不会把美国的前途押在新的实验上。他在 1793 年写道：“我们是保持在一个联盟之内，还是形成大西洋和密西西比联盟，我相信这对于任何一方的幸福都不是很重要。”

杰斐逊对亚当斯和共和党人的反对，体现了民主社会里普遍的对新事物的排斥的情绪，包括银行、蒸汽发动机，甚至包括为国家防御而征收的税。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世纪以后，当

科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一起在美国起飞时，“经验”一词不是意味着以前已经经历过的事物，而是意味着现在和将来必须面对和进行试验的东西。在后来的工业化的美国，人们欣喜于变化和改革。然而在杰斐逊时期的 18 世纪晚期的美国，经验意味着相反的东西——不是应该试验并试用的东西，而是为现存的事物寻找证据。我们倾向于把自由主义和政治改革及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在亚当斯的时代，敌对情绪在共和党人中间弥漫，杰斐逊为了复职的目的而抵制改革和变化。杰斐逊对科学家说，你可以对空气和光好奇，但是在政治中，好奇会像对新鲜事物的幻想一样危险。因为即便是偏离一小步，都有重蹈君主制和古老的税收暴政的危险。因此，一场反对新事物的叛乱更有可能发生在保守的农村。

弗莱斯叛乱

收税者，他们来了！在 1795 年夏秋两季，亚当斯政府听到了很多反对政府的怨言，这些怨言出自东南部宾夕法尼亚一些善变的德国人和阴晴不定的英国人之口。到了冬天，这些抗议者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联邦政府的税收。税收是为了使国家收支平衡、政治稳定，它是任何政治环境下都存在的东西。古代共和国的哲学家就看到了国家税收的必要性。“税收是国家的原动力。”西塞罗这样说道。但是在美国历史上，人民反对税收的情绪很强烈，以至于曾有一个总统告诉他的支持者说，你们仔细听好了，永远不用担心政府加收新税。然而结果并非如此。亚当斯却从来不欺骗人民，他知道征收税款会使杰斐逊高兴，杰斐

逊也乐意看到政府进一步失去权威。但是,当美国发现自己处在准战争状态并且不久国家真的卷入了战争,急需武器和船只,因此这样的税收对国家来说就变得非常必要。1795年夏天,亚当斯政府和国会制订了第一个税收体系《直接税》。

当亚当斯就职时,美国的经济形势良好。来自船运的吨税和来自酒业、盐业的消费税等财政收入使美国经济每年都能达到收支平衡或者有些节余。但是外交关系——载舟事件,没有公开的同法国海军的作战,以及联邦党人怀疑五人内阁在向美国传播革命的消息——使得国会和政府增加了军事开支。在亚当斯当政的后两年,联邦国会征收的税款数量为 1500 万美元,几乎是他执政之初正常支出的两倍,而且增加的一部分税款里还包括政府还美国银行贷款的利息。一些新增的特种税收,类似 1794 年前使美国革命步伐加快的《印花税法》。许可税、契约税、遗产税和移民税等被用于商业贸易中,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最有争议的是涉及到私人住所的房产税,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制订明确的向私人征收的税收项目,这在过去是仅由州或当地政府执行的税收。

这项税收政策经亚当斯批准由汉弥尔顿和财政部长奥里夫·沃尔切特施行。他们远离了不切实际的评估财产的办法,不是以一所房子有多少玻璃、多大空间为基础,而是尽量做到公平收税。房屋和土地估价低于 500 美元的按 1/10 的比例缴税,即每 500 美元交 50 美分,而超过 500 美元的则按照每 1000 美元 1 美元的比例征收。“土地和房屋税”是进步的,它为战争提供了经济支援,它仅仅建立在对所有人财产的估价上,大多数人还是支付得起的。

巴克斯的居民和东宾夕法尼亚的居民对这种税收有自己不

同的看法。他们回想起几年以前导致威士忌叛乱的税收,那次的税收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冲击了一部分州单一的经济。他们还把此次征税与汉弥尔顿努力弥补美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债务联系起来,一些人靠购买廉价的美国债券而发了财。同样令人怀疑的是,财产税与一些银行发生了关联,这些银行很慷慨地贷款给土地投机者,但在有关普通纳税人的财产赎回权方面却很苛刻。很多宾夕法尼亚人修改了西塞罗的名言“税收是州政府的偷窃行为”。

1793年 11月,东宾夕法尼亚的居民开始干涉财产估税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辱骂、攻击,有时甚至把热水泼在他们身上。反抗者召开会议,起草决议,请求国会撤销税法。两个月以后,政府派遣联邦警察,以干扰财产评估为由逮捕了起义者。12月 29日,当政府准备将犯人转移到弗吉尼亚联邦法庭时,从巴克斯和邻近各地来的民兵聚集在伯利恒的阳光酒店,也就是犯人被抓的地方,准备起义。民兵由约翰·弗莱斯领导,他是一个经历了革命战争的老兵,他指挥 1500人的部队,大部分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一些是骑兵,另一些是步兵。弗莱斯是一个拍卖师,看过很多财产抵押品赎买权的取消过程。他宣称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他的同胞应该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法庭审判。他为几个犯人取得了保释权,使他们能在自己的法庭上,由自己的人民来审判。在短暂而激烈的僵持之后,联邦法院执行官释放了犯人,法庭外的人群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自动解散了。但法院执行官却说,犯人是被狂暴的暴民抓走的。弗莱斯自己悄悄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几天以后,当局逮捕他时,他正在进行拍卖。

弗莱斯叛乱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无论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还是亚当斯的政敌,对这件事的影响太过于夸大

了,这直接导致了亚当斯在 1796 年的大选中落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当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在 19 世纪 80 年代散布激进社会思潮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和联邦党创始人在对弗莱斯叛乱的看法上意见一致,而这些联邦党人在 18 世纪 90 年代领导了保守的社会思潮。他们都认为在宾夕法尼亚发生的事件是激进的、有组织的、没有被压制的,是美国转向革命的先兆。弗莱斯和他的跟随者描写道,我们被告知“世界翻了个儿”。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自由遍地开花,犹如 1793 年加里昂埃尔·普沃斯领导的弗吉尼亚的奴隶起义一样。激进的社会历史学家和联邦党创使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把宾夕法尼亚的不满和抱怨看作是真诚的并且是正当的,而后者则把它看作是虚伪的并处在偏执的边缘。他们同意把弗莱斯事件看作是反政府运动的开始,认为这次事件对社会秩序和共和国的权威都产生了威胁。甚至在事件中一直保持冷静的亚当斯后来也无法再冷静,他告诉杰斐逊说,弗吉尼亚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极端主义,因为弗吉尼亚从来没有过谢斯起义和威士忌叛乱。“你一定从来没意识到弗莱斯的恐怖主义有多可怕。”

在美国历史上,“税收叛乱”——无论是 18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叛乱,还是 19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叛乱,都应该被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来看待。那不是一场激进的变革社会秩序的叛乱,而是一场保守的抵制为公共设施而交税的行为,无论是该交的还是不该交的。不像那些美国的历史学家,法国历史学家李·罗伊·拉里尔更有判断力地看到,反税收和反政府的活动可以从 18 世纪的法国一直追溯到《加利福尼亚十三宪章》,它所展示的是对几乎从不纳税的贵族复仇的渴望。因此法国举出名著和罗马政治家的例子,“在每个共和国时

期或帝国时期，贵族都要纳税。他们不考虑富人和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一律按照财富和土地的多少征税。”法国人举出他们的例子：“加图给珠宝上税，塞拉卖掉了庙产，罗马议员用四轮马车载着铜币去交税。”

雅各布·艾玛，一个支持弗莱斯的部长，他警告集会的人说，如果他们允许新税收政策实施，那么宾夕法尼亚的人们“会像欧洲人一样生活得很糟糕”。税收是同旧世界的君主制和有特权的贵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贵族阶级一般不用纳税。但是在美国没有贵族阶级，亚当斯的目的也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税收政策。在联邦党内位高权重的人，如汉弥尔顿和皮克林却把弗莱斯看成一个必须消灭的阶级敌人。如果贵族制度不存在，普通市民会想出一个办法使逃避税收合理化。联邦党人把普遍的逃税看成是导致扎克雷起义的第一步，并且尽力劝告亚当斯说，美国现在似乎就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亚当斯的顾问实际上是阿列西斯，他后来给美国上了一课，他使美国人明白：国家面对的不是一个冲突的环境，而是和谐的环境。在这里，财产是安全的，不会被民主的混乱所威胁。对税收的反叛昭示着财产的神圣，而不是脆弱无力。

惩罚还是原谅

大多数时候，宾夕法尼亚都是联邦党人的大本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弗莱斯事件的发生。弗莱斯的同情者戴上三色帽徽，在“自由柱”下载歌载舞，向权威宣战，并斥责联邦党人是“亲英派的势利小人”，还宣布他们对杰斐逊和共和党人忠诚不二。杰斐逊自己对于弗莱斯事件保持着很冷静的态度，甚至比两年

以后在弗吉尼亚面对布埃尔·普奥瑟领导的奴隶起义时更冷静。为了确认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事件与法国革命是否有关联性，杰斐逊不得不在世纪末到来时再次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然而在 1793 年，即弗莱斯叛乱的那一年，是西方世界普遍骚乱的一年。大不列颠这个反革命力量一向很强大的国家处在崩溃的边缘，英格兰银行的钱耗尽了，爱尔兰的反叛非常猖獗，英国海军在斯宾塞得、那热和公海的其他地方发生叛乱。加勒比海岸也发生了骚乱，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在争夺苏格岛的控制权，美国商船在努力逃避法国海盗船。在很多方面，“准战争”像我们后来的所谓的“冷战”。一时间，美国人感到很不安全，但又辨别不出谁是真正的敌人，找不出国家的威胁是来自于国内还是国外。善良年老的约翰·弗莱斯，礼貌地邀请联邦的征税员到他家里共餐，这真的是使国家处于危险境地的事情吗？

许多联邦党创始人对于这是危险的事情毫不怀疑，柯贝特的《箭猪报》呼吁召集一支“临时军队”，准备“国内战争”。汉弥尔顿、皮克林和费舍·艾姆斯，以及其他共和党人看到了在宾夕法尼亚的阴谋，尤其是当他们听到了一些抗税者相信亚当斯总统让儿子与大不列颠国王的女儿订婚，“华盛顿将军抑制美国是为了取信于英国”时，他们总结道，“应该建立军队，玻璃税应该照收”。这是法国传教总会的工作吗？可能不是。但是，共和党人的支持者告诉人们，联邦党人的税收政策将把人们的财产充公，并使他们处于欧洲无产阶级的境地。

对于联邦党人来说，整个争论是关于法律的，而不是关于社会的。联邦党人召集军队不是为约翰·昆西·亚当斯戴上王冠铺路，而仅仅是为了镇压叛乱。1793 年 9 月，亚当斯启动了《最后军队条例》，国会通过法律允许输送常规军去对抗可能的由法国

煽动的叛乱。汉弥尔顿已经建议国防部长“政府无论什么时候显示它的武力,都必须像海克里斯一样”,足以吓退敌人。由下层群众迅速组织起来的军队,更像是一支暴民军队,毫不费力地就镇压了宾夕法尼亚的叛乱——其实不需要军事力量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仅仅诉诸于法律和命令,并不能使联邦党人满意。抵制税收的行为,挑战了国家政府在行使自己的权力上的权威。亚当斯被他的内阁劝说颁布法令,审讯弗莱斯和他的随从。“我被劝说去做背信弃义的事情”,于是亚当斯离开首都回到了昆西,留下了一些法律事务让他的内阁去处理。

源月初,这个违法者因为叛国罪或其他罪行被带到费城地区受审。政府在审理约翰·弗莱斯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为其他法院做出了先例。这场轰动的导致了死刑的审判,一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也使政治上出现了两极分化。

对支持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来说,审判象征着政府不经人民同意就强行征税是错误的;同时,用集权的意志对抗地方社会,用被任命的司法机构代替正常选举也是错误的。对支持汉弥尔顿的联邦党人来说,审判象征着国家权威的命运和普通民主的无规则、不合理的本质。联邦党人想让弗莱斯受到严厉制裁,因为他们确信华盛顿总统对参与威士忌叛乱的人的宽厚仁慈是错误的。对于民主暴行的回答应该是死刑。皮克林在写给亚当斯的信中说:“对于这个想法,我感到很痛苦,就像要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我感到平静和满意之处在于,有机会执行法律公正的裁决,去扑灭反叛的精神——如果不毁灭这种精神,它将按它自己的轨道走下去并推翻政府。”

检察官确信犯人有罪,并在《箭猪报》上发表言论说:“起义的原则必须被根除,否则,无政府主义将会泛滥。”他们认为,弗

莱斯以如此叛逆的态度干扰法律应当受到惩罚。两个辩护律师亚历山大·达拉斯和威廉·路易斯否认弗莱斯和他的同伴有意“发动征税战争对抗美国”——一旦犯人被营救，民兵就自动解散了。一审历时 8 天，最后宣判被告有罪，但是一个陪审员却说，他们已经参与了这个案子中的审判，并决心做一次无效审判。在二审中，首席大法官是塞缪尔·蔡斯，一个忠实的联邦党人，他决心要看到弗莱斯再次被判有罪。他与陪审团交涉，并征询他们的意见。从政治意义上讲，结果是注定的——弗莱斯被判处死刑，并将于 1790 年 9 月 22 日被绞死。

亚当斯没有因为政府对弗莱斯的惩罚而内疚不安，但是弗莱斯的行为在他看来并不像原告律师说得那样严重。他向他的内阁成员提出了 5 个问题，目的在于确定叛国的罪名是否也适用于去年在伯利恒阳光酒店发生的事件。内阁大臣都认为弗莱斯和另外两个人有罪，应该执行死刑。但是亚当斯有自己的想法，他得出结论说，弗莱斯和他的同谋者是出于反抗的目的，而不是叛乱。他还反问道：“建立这样一个反叛乱法应用于每个由于政治争论造成的突发的、无辜的、考虑得不周全的事件中，难道不是很危险吗？”总统原谅了弗莱斯和另外两个同谋的叛国行为，而其他很多的人也被从轻发落。

宾夕法尼亚人欢迎亚当斯的原谅，但是损失已经产生了。在巴克斯和其他地方人民的眼里，派遣部队和起诉本身就使联邦党人应该遭到诅咒。共和党人赢得了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的支持，因为他们都不信任英格兰人，现在德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总统的原谅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宝贵的品质，也是一种在美国选举政治领域少见的人道和慈善的行为。

在 18 世纪 90 年代晚期的美国土地上，一场艰难的反抗税

收的起义,证明美国像一个苹果派和热圣代冰淇淋。但是那个时期的政治与文明是冲突的,巨大的分歧代替了一致的认知和在美国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共和党人认为弗莱斯是为自由和荣誉而战,他们为他欢呼,向他致敬;联邦党人则斥责他是对君主制可鄙的投降。两个党派都被另一方威胁着,几乎没有人认为它们之间有共同的东西。约翰·弗莱斯被认为是一个正直的颠覆者,他企图毁灭美国的政治文明,他是罗纳德·里根的先驱者。里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总统,他告诉美国人,税收和政府是手挽手一起前行的,因为两方面都是问题所在,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问题的解决答案。很显然,里根时代美国历史上的英雄是托马斯·潘恩,他和我们同时代的理论激进者一样是反政府的革命英雄。亚当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竭力去让美国人理解政府的重要性和合法性。他原谅了弗莱斯,而他自己的党派却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第八章 战争与和平

亚当斯在家里 魅力和悲剧

当 1800 年夏初国会休会时，亚当斯和阿比盖尔马上回到了昆西。费城在仲夏时爆发了流行性黄热病，城市里一片恐慌。总统和第一夫人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悄悄地离开了，但是人们还是知道了他们的行踪。每到一个城市，亚当斯和阿比盖尔都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欢迎。一路上，他们参加了无数次宴会，总统也在很多人的集会上进行了即兴演说。当他们到达昆西时，阿比盖尔病了，高烧不退，身体变得很虚弱。当医生被请来时，屋里一片静默，总统抛开所有的事务待在妻子的身边。“亚当斯夫人病得很厉害，生命可能有危险。”医生告诉皮克林。女儿娜布赶来照顾妈妈，她写信给哥哥约翰·昆西说：“我们的妈妈生病了，脸色不好，没有她愉快的笑容，这似乎不像是一个家。”

八月，亚当斯沮丧地返回了费城。阿比盖尔的身体好了很多，但是仍不能支撑她返回首都。亚当斯想念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阿比盖尔、娜布和现在的小外孙女——“那个活泼、招人喜爱的卡罗琳”。在昆西时，卡罗琳在亚当斯的眼中是一个可爱的苹果。

但是并不是亚当斯所有的家人都能让他高兴，其中有一个

是他的儿子查理斯。查理斯是哈佛的优秀毕业生,却长时间地酗酒和挥霍无度。他荒废了法律业务,又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整天忧心忡忡。查理斯觉得站在他地位显赫的父亲和两个有成就的哥哥面前,自己就像侏儒一样。哥哥约翰·昆西是个年轻的政治家,另一个哥哥是聪明杰出的外交家托马斯·汤米。在去纽约的路上,总统的脑海中始终挥不去查理斯的影子。这个让他操心的查理斯终日酗酒,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不管不顾。当儿媳萨莉原原本本地把查理斯的状况告诉他父亲时,亚当斯向阿比盖尔倾诉道:“我同情他,我可怜他,我万分悲哀,我要放弃他。国王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有抱负有进取心,而我的儿子只不过是没出息的人。”查理斯曾经最想拥有爸爸那样的抱负,在各个方面都想努力超过他。他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他的聪明才智使得他备受家人的喜欢。但是现在父母却看着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毁掉而无能为力,总统没有与他的儿子联系就离开了纽约,带着无比沉重和悲痛的心情回到了政府所在地。

因为黄热病的蔓延,政府机构从费城迁移到新泽西州的特伦顿。亚当斯到达特伦顿时,患了严重的感冒。他临时找了一个地方住下了,只有一间很小的起居室和一间卧室。房东是两个女孩,这两个女孩因为有总统光临寒舍而显得格外高兴,并负责照顾亚当斯的病情。阿比盖尔很为亚当斯的身体担忧,她知道只有她才懂得怎样照顾好亚当斯的身体和他的精神。

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阿比盖尔仍然没有恢复好,所以不能去帮助丈夫处理一些事情。亚当斯不得不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昆西,把家当作临时的行政办公室。当在阿比盖尔的病房守护时,亚当斯不得不回复大量的信件:要求任命的、请求赦免的、各个职能部门首脑的汇报、需要签署的文件,当然不可避免地要与联

邦党人一起讨论政治事件。

阿比盖尔又在病床上躺了 3 个月，疾病和死亡的气氛笼罩着南部各州。黄热病袭击了主要的城市：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特别是费城，在那儿有 2 万人撤离了城市，1 万人死于瘟疫。由于妻子身体不适，亚当斯偶尔提一些慈父般的建议给他的孩子们。他写信给托马斯，对他的婚姻大事给出一些警告，同时告诉他法国革命对美国将来的政府机构的影响。“革命的根源、民主、雅各宾主义……消除了一系列真正的家庭权威。如果一个政府对国家没有明显的母子或父子般的隶属关系，那么，这个政府将不会长久。”但是亚当斯又告诉儿子，要他保守住这个秘密，它“仅限于你我之间”。如果阿比盖尔知道他的这种想法，她一定会认为这是像海洛因似的异端学说，“它必然引起一场叛乱”。接着亚当斯转向有关婚姻的话题，他告诉儿子他也年轻过，知道怎样去爱，“我和你妈妈从来不命令你们去做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谨慎一些，不要被一些狂热善变但却短暂的激情所左右”。

在 10 月份，阿比盖尔和亚当斯迎来了他们结婚 30 周年纪念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阿比盖尔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能够和娜布及卡罗琳一同去费城看望亚当斯了。不久，亚当斯让妻子陪她去了首都新址，在博托马克河的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华盛顿。它是哥伦比亚的一个行政区，居住条件超乎想像的原始和简陋。路还没有铺好，总统大厦，就是后来的白宫，仍没有完全竣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荒芜着的框架，孤单地矗立着。新总统府的简陋，使亚当斯比任何时候更怀念昆西。

不久前，在去费城的路上，阿比盖尔在纽约下车去看望了萨莉·亚当斯。这个被查理斯抛弃的儿媳妇吃惊地发现，查理斯回

到了家,但是已经生命垂危。查理斯见到妈妈觉得自己很丢脸,并开始呜咽起来。阿比盖尔望着她曾经最英俊又最爱笑的孩子,如今竟是这样的悲伤和绝望,心都快碎了。查理斯还不停地发抖,模糊不清地喊着什么。更糟糕的是,在亚当斯听到了 1800 年大选结果的那个晚上,他也得知了自己“曾经最爱的儿子的死讯”。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以坚毅的信念,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没有什么要说的,愿上帝永在!”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

美国和“激进的黑人政治家”

在亚当斯执政的最后两年,国家经受住了黄热病的考验,却感受到了战争的高烧——汉弥尔顿和联邦党人想同法国开战。战争不仅威胁到了美国,而且迅速扩散到被法国和西班牙控制的北美洲的西部和南部。国会制订了税法,建立了一支由华盛顿领导的陆军,汉弥尔顿是副指挥官。一些共和党人害怕联邦党人领导的军队会被用于政治目的而来反对共和党。在华盛顿于 1799 年 8 月逝世以后,共和党人的这种恐惧更加强烈了。汉弥尔顿试图通过亚当斯的内阁成员麦克亨利和皮克林去影响亚当斯,他们都认为亚当斯总统没有能力为国家发动战争做好准备,也不可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可能是这样吧。但是亚当斯更喜欢海军而不是陆军,在每次战役中美国军舰的力量都得到了增强。

在亚当斯执政之初,美国商船在对抗法国海盗船时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加勒比海岸也有其他的美国船只被他国俘获。但是足智多谋的海军部长斯丹德不断增强海军的力量,并改进了美国的帆船。他开始从高中和大学学生中招募海军士兵。

1781年9月，在奈维斯岛海岸附近，“星座号”遭遇了法国最快的战舰“反对者号”。很早的时候，“反对者号”曾装载着30门大炮，打败并赶走美国和英国的战船。但是它现在遇到了真正的对手，“星座号”向它发起猛烈的攻击，重创了这艘法国军舰，并俘获了它。“星座号”的船员和船长托马斯·塔克斯特成为美国的英雄。

每次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重大胜利，都与亚当斯和国务卿皮克林处理与圣多明哥的关系有关。这个岛处在六股力量的争夺中：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美国和这个岛上的本土力量。这个岛就是后来的海地。在它的海域，法国海盗船和西班牙运宝船发生了不少次海战。更早的时候，伏尔泰曾描述过法国对海地的抢劫，他们依靠的是被称作海盗或强盗的诺曼底水手。海盗们主要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走私的赃物。与私掠船相比，海盗船持有特许证，并与法国政府一起分赃。在法国革命以前，海地是一个发达的殖民地，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地方。法国控制了海地的一部分，英国和美国与它进行商业贸易，那里盛产糖、咖啡和棉花。

1789年，海地突然爆发了一场奴隶起义，引起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参与者有黑人奴隶和当地几个部落的人（包括黑白混血儿）。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并考虑了五人内阁的建议，派遣人员携带武器装备去支援哥德普洛的前方基地，准备夺回海地。到1793年亚当斯执政时，英国和西班牙已经与图森特·欧沃特签订了停战协定。他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机警的军事首领。他在国际政治权力游戏中的地位，有点像显赫的马基雅维利。皮克林看到了图森特地位的上升给美国权力带来的优势，建议亚当斯抓住时机。亚当斯劝服国会实行

对法国岛屿的禁航。海军部长斯丹德命令约翰·巴利上校把他的军舰驶到海地岸边,并升起星条旗,以示向图森特将军致敬。皮克林让南方国会议员相信,图森特对美国的利益没有威胁,也不会参与带奴隶入侵牙买加和其他岛屿的活动。

但是杰斐逊非常惊恐,为什么美国开始与反叛的图森特领导下的黑人奴隶有了贸易联系?下一步该怎么办?“黑人船长……外交使节进入南方各州?图森特对于杰斐逊来说,就像弗莱斯之于汉弥尔顿。“如果这次大骚动和任何往常的混乱一样在我们中间发生,”杰斐逊警告美国人说,“我们不得不对它有所警惕。”

美国公开与海地建立联系,一定会得到皮克林的赞许和亚当斯的支持。尽管联邦党人主要关心的是与海地在商业上的利益关系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权力的使用,但对杰斐逊来说,与一个处于叛乱中的岛屿建立关系,就意味着太多的事情,他想要看到革命在法国处处胜利,而在美国海岸边上则节节失败。图森特是一个危险的激进者吗?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西印度出生的博学的学者 援 砸 詹姆斯,把图森特描述成“黑人政治家”,一个革命者。图森特的人民比那时的任何工人都接近于现代的无产阶级。詹姆斯甚至把他看成是和列宁和托洛斯基一样的革命先驱,认为他能加勒比海岸,甚至是西欧范围内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并唤起他们的阶级斗争意识。但是这样的称呼对图森特是不适合的,因为他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更深。准确地说,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寻求革新的世界革命者,而应将之看成是一个力图帮助人民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起义者。像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哥伦比亚的西蒙·波利瓦尔和古巴的琼斯·马昂

一样，图森特也是一个解放者。

但是杰斐逊却不这样认为。当他被选举为总统时，他断绝了与圣多明哥的联系，并支持拿破仑重新恢复岛上的奴隶制。“没有什么比用一切武装军队和舰队更容易的了。”他安慰法国部长说，“要把图森特饿死”。而图森特最终被诱骗落入圈套，并被逮捕，最终死于狱中。杰斐逊对拉法叶说，《独立宣言》与南美无关，世界的一部分是无法建立并保全自由政府的。亚当斯的国务卿皮克林永远不会原谅杰斐逊，杰斐逊认为加勒比海自由战士有罪的唯一理由是，“他们的肤色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因此用饥饿可以使他们屈服。皮克林在 1795 年担任马萨诸塞的议员，他责备杰斐逊总统说“救救你的国家吧，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不要让它遭受羞耻和奴役”。

亚当斯总统和大部分联邦党领导人都是北方人，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关于奴隶起义的看法与杰斐逊的南方支持者大不相同。杰斐逊的支持者把美国黑人的起义行为，看作是自家后院起火。但是美国同圣多明哥和图森特的关系不仅仅是种族上的。这个事件是值得深思的，因为美国在 18 世纪错把起义者当作是革命者，混淆了反殖民统治的战争和反强权统治的自卫战争。图森特被遗弃是悲剧，人们可以想像，如果自由主义的美国没有背叛自由主义，西部印第安人的历史将会多么的不同。

结束准战争

在 1795 年早春，总统向议会传达了一条像炸弹一样的消息。他任命威廉·万斯·莫雷，一个海牙的外交官，作为美国对法

国的全权代表大臣。莫雷经常向亚当斯传达有关欧洲发展的消息。皮克林“完全惊呆了”，其他联邦党人也不相信亚当斯会在事件后重新寻求与法国进行谈判。联邦党人感到震惊、愤怒、仇恨，并开始竭力制止这件事情，甚至对莫雷的能力提出质疑。那时，亚当斯正在昆西，他暂时推迟了派莫雷去巴黎。

一些历史学家越来越认为，亚当斯不在职位的半年，他不明智地容许汉弥尔顿的内阁接管政府，这使他再也无力控制局面。但是历史学家史蒂芬认为，亚当斯延缓他同法国的谈判是英明的，这样就为美国克服弗莱尔叛乱所引起的国内危机争取了时间，直到法国形势变得明朗，美国海军力量大大增强。1793年11月，法国五人内阁倒台，拿破仑·波拿巴取得了政权。这个大胆的将军以迅捷的速度在从澳大利亚到埃及的土地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使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

新的法国当权者认为，如同在事件一样，法国的使团一定会被亚当斯接受而不是被拒绝。1793年秋，美国的三人使团到达巴黎并与法国签署了和平法令，被称作《1793年协议》，因为它在本质上更像是调解协议而不是正式的条约。可是这个协议是在亚当斯输掉竞选之后达成的。不过，亚当斯——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将签署《1793年协议》和在革命期间赢得了荷兰的贷款并与英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看作是他最大的成功。

历史学家福瑞斯特·麦克唐纳有一个更具批评性的观点。“当结束准战争的条约最后到来时，”他说，“美国已经不再是法国的对手，只好重新运送重要的货物给法国，而且耗费了人民大约1000万美元。作为交换，法国仅仅停止了让美国无法容忍的敌意。”这种苛刻的感情重申了汉弥尔顿的观点，即莫雷和他的

使团与法国外交官的交涉工作是不力的，他们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美国政府承担和支付了与法国对抗带来的损失。毫无疑问，如果亚当斯的使团能够利用准战争给法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并且考虑拿破仑面对英国完全制海权的不稳定情形，他们会取得较好的结果。在历史上的那一时刻，法国更需要与美国保持和平。在签订条约后的几个月里，拿破仑的军队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马伦戈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揭开了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覆灭的序幕。回顾过去，关于亚当斯的法国使团可能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但是，“实际上，它却是历史上所有的谈判中最幸运的一个”，历史学家爱德华·强尼看到，在和平时期，“拿破仑与英国停战了一年或两年，海面因而对法国和西班牙本土人民开放。如果美国此时仍与法国发生冲突，又失去了英国舰队的保护，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了。”由于英国的撤出，亚当斯的三角平衡理论不再奏效了，但是即使是亚当斯和其他人也不能预料到拿破仑控制下的欧洲在 ~~美国~~ 后的力量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拿破仑对欧洲和为欧洲所做的事情——取消封建主义制度和古代政权，使“职业对所有人才开放”——是美国人没有必要做的。像托马斯·杰斐逊一样，拿破仑·波拿巴认为，为了自由而寻求世界安全和为了奴隶制而寻求安全是并不矛盾的。

亚当斯关于奴隶制的观点和亚伯拉罕·林肯很相似，他极度抱怨这种制度的“邪恶、无人性、残忍、无耻”。亚当斯想起了自己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在我的一生中，我对奴隶制深恶痛绝，我从来没有一个黑奴，也没有任何其他奴隶”。但是他像林肯一样，认为“把奴隶制最后从美国根除一定要谨慎，以免造成南方脱离联邦和国家内战的发生”。

~~美国~~ 年，在对法国的关系上，亚当斯寻求和平，反对战争。

这与奴隶制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与道德和权力政治有关。亚当斯深深沉迷于古典政治哲学之中,他认识到,对古代传统的尊崇,使现代共和国仅仅有两个选择:冒无知之险追求简单或冒僭越之险追求强大,和平或是战争。亚当斯在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中说道:“在以前的时代,商业国家从来没有对由于贪欲而带来的普遍的道德败坏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而是用树立雄心去对抗它。军事的荣耀激起了人们与贪欲作斗争的雄心,直到它堕落成世袭的高贵。”

亚当斯在做华盛顿的副总统的时期,他就多次抵制用军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1799年12月,亚当斯在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提到他哥哥,一个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者,“我的哥哥永远不会投支持战争的票,我知道他只有到了非常必要的时候才会,不必要的战争是最大的罪恶”。作为总统,亚当斯几乎不能认同古典信念的观点,即战争能带给共和国荣耀,并能维持人们的道德现状。由于怀疑汉弥尔顿是一个渴望荣耀的军事家,亚当斯认为,既然军事和政治都要服从同样的道德标准,那么战争就不是政治的答案。他写信给阿比盖尔说:“我不应该害怕一场正义的战争,但是非正义的战争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厌恶和憎恨。”

1796年选举

在1796年选举中,亚当斯是作为一个攻击力很弱的竞争者出现的。亚当斯因为派使团去法国并原谅了弗莱斯,造成他和自己党派的疏远;又因为出台《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并允许汉弥尔顿领导国家军队,激怒了对立的党派。由于亚当斯总是手持橄榄枝代表和平和正义,亚当斯对保守的联邦党人太

手软。由于他代表国家权威并用强制力维护国家安全，亚当斯对自由的共和党又太强硬。

亚当斯的一些内阁成员想要抛弃他。财政部长沃尔切特对费舍·艾姆斯这样评价总统：固执、骄傲、易怒，更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国家，年老体衰，伤风发颤，牙齿都掉光了。亚当斯感觉到他的内阁更倾向于效忠汉弥尔顿而不是他，亚当斯下令让国会解散汉弥尔顿长期期望的军队。当乔治·柯伯特听说汉弥尔顿正在控告亚当斯，他想起联邦党人在费城的政党预备会议上支持亚当斯和平克尼。汉弥尔顿没有在平克尼那里遇到问题，但在国防部长麦克·亨利的刺激下，他公然在媒体上声称：“这就是亚当斯阴险的行为，一位美国总统的绅士行为。”

被激怒的汉弥尔顿对亚当斯的爱国主义和正直提出质疑，并指责他违背了华盛顿的建立一支永久的军队的愿望，并且派使团去法国结果使国家蒙羞。汉弥尔顿认为，他有责任让人们知道总统“不具备管理政府的天赋，并且有着严重的品质缺陷，这些使得他并不适合做政府的领导人”。

共和党人听到这样的报告非常兴奋，亚当斯、汉弥尔顿和平克尼在公众面前争吵，互相攻击，以至于损害了自己党派的形象。杰斐逊似乎成了唯一合适的候选人。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仍有一个隐藏着的候选人，比杰斐逊还要隐秘，那就是亚伦·伯尔。

这个英俊勇敢的伯尔曾为革命而战，并在追求女人与奢华生活的同时获得了上校军衔。这个后来的阴谋家和恶棍，在杰斐逊总统执政期间成为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开枪打死了汉弥尔顿，又因为企图把西部从共和国中分裂出去而被指控犯罪。在更早的时候，他的野心更大。由于有些政治天赋以及对权力的

贪欲,他在 18 世纪 90 年时成为纽约的议员以及国会议员。在选举的过程中,他利用反对党使汉弥尔顿的岳父菲利浦·斯卡勒没有获得席位。他有效地控制了纽约的选举,作为回报,他获得了提升,成了共和党人提名的副总统。伯尔在 1796 年选举中的角色,可能是所有候选人中最显著的。但是,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弄清楚,他脑子里到底想着美国还是他自己。亚伦·伯尔的时代是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它甚至藐视亚当斯对人类动机的判断。伯尔的敬慕者戈尔·维写道:“他总是充满神秘。他去一趟理发店,就像在计划一项推翻国家的阴谋。”

1796 年的总统竞选严格来讲是计算选举团票数的选举,这就意味着控制议会的政党而不是人民将决定州竞选的结果。计票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在第一周,亚当斯和平克尼的票数领先于杰斐逊和伯尔。可以断定马萨诸塞和新英格兰支持亚当斯,弗吉尼亚和南方大部分地区支持杰斐逊,但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是属于共和党选举势力范围内的。最后的结果是杰斐逊 73 票,伯尔 33 票,亚当斯 35 票,平克尼 29 票。在亚当斯选举失败的当天晚上,他接到了他儿子的死讯。

1796 年,联邦党人把失败归咎于亚当斯总统,亚当斯因为税收政策失去了宾夕法尼亚,但是《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看起来对选举没什么影响,因为亚当斯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的得票要比 1792 年多。区别在于纽约,亚当斯由于伯尔的阴谋和纽约的汉弥尔顿拒绝支持他自己党派的候选人而落败。事实上,汉弥尔顿更喜欢扮演国王缔造者的角色。在秘密的选举之后,选举僵持着,汉弥尔顿把伯尔当作一个危险的蛊惑人心者而不信任他,但却劝说联邦党国会议员加入共和党,选举杰斐逊为总统。杰斐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把他的对手说成是超级禽

兽，而亚当斯则什么也没说。

阿德利·史蒂文森，民主党候选人，曾经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竞选中两次输给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理解亚当斯的感受。“当我进来时，一些人问我在路上有什么感受。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我的市民过去常常讲的故事——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史蒂文森说起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位政治先驱，“他们问他竞选失败后有什么感觉，他说就像一个小男孩在黑暗中被绊倒了。他还说，他太老了不能哭泣，但是伤得太重也笑不出来了。”

无论他怎样用欢乐去代替怨恨，亚当斯深深地感受到生活不再和从前一样了。但是作为一个几乎不关心政治权术和政治交易的人——阿比盖尔也是这样，他们回到了昆西。亚当斯写信给他最关心的儿子托马斯说：“我的肩头卸去了重担，现在感觉轻松极了，余下的短暂的时光将是我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亚当斯退休以后，待在昆西的时光远远不是短暂的。但是在离开首都之前，他忙于处理与法国的关系，打发不忠诚的内阁成员，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任命新法官。批评亚当斯的人称这些努力为“午夜任命”。一个最后的即将卸任的总统做的最冒险的事情把审判体制推到了共和党人面前。但是亚当斯一直相信政府的审判部门应该是独立的，并且在最高法院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任命了约翰·马歇尔做首席审判长，这个弗吉尼亚人曾反对过《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

1796 年 9 月 1 日，亚当斯在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总统府。那天中午，杰斐逊飞奔到首都拴好自己的马，进入议院，宣誓就职。亚当斯曾被批评没有留下来参加继任者的就职仪式。为了体面的缘故他可能应该留下来，但是他没有先例

可循。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亚当斯是否收到过杰斐逊的邀请。

“兴奋的路线”在昆西的生活和信件

亚当斯坐四轮马车走了 ~~缘~~英里,遭遇了一些猛烈的暴风雨,终于可以停下脚,在昆西自己的农场上休息。他在谷仓发现了 ~~万~~磅海藻,那是土地的重要肥料。作为一个 ~~还~~岁的人,待在家里是很好的。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经常回想他的得失。美国人民拒绝了一个曾为国家贡献了自己政治生命的人,但他可能忘记了人民并没有给杰斐逊大多数选票,当然也没有给伯尔。亚当斯经常告诉朋友和邻居们,他很喜欢在昆西的生活。

这所房子现在被叫做“亚当斯大厦”,有朋友、亲戚、来访者、孩子和外孙子们经常来,所以变得热闹起来。查理斯的遗孀萨莉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托马斯的妻子安妮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来到了这里。被一群孩子包围着,亚当斯很高兴。孩子们的好奇、淘气、活泼,使他摆脱了无聊和轻微的沮丧。与阿比盖尔相比,他更能对孩子们的嘲弄和取笑给予回应。

亚当斯没有什么钱,仅有的一点存款也在伦敦银行的投资中损失掉了。好在阿比盖尔以她的名义购买的有价证券还赚了一些钱。在他这个年龄,他不想重操法律旧业。亚当斯把他的精力都放在他的一大片土地上,播种、浇水、施肥、驱除果树上的虫子。在自然世界中劳动使他的思想更接近哲学世界,他思考着:显微镜是增加了知识还是限制了知识,昆虫是诅咒还是恩赐,仁慈的上帝会不会接纳这个不幸的世界?

亚当斯醉心于散文和诗歌，他会渴望写他的自传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版商会拿着 15 万美元的合同站在卸任总统的门外等候，而且很多传记都是虚构的。但在亚当斯的时代，写传记被看作是在追求私利，或是唯利是图，甚至就连卸任后非常贫穷的杰斐逊也不会为了钱而写什么或说什么。亚当斯真正考虑的是，写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的自传。但是他意识到，无论他怎样不在意写作的顺序，对于他所经历的事情的思考和整理都是非常痛苦的。他坦白地对约翰·昆西说：“凭记忆写东西是需要技巧的，对我来说这种做法实在太痛苦，因为我不得不去回忆我经历过的场景。”

但是如果亚当斯丢弃了散文，他就不得不继续考虑政治。他没有思考他的职业生涯，而是在思考政治本身。亚当斯的后辈亨利·亚当斯认识到了在政治中“熵”这一现象所引起的混乱，他看到了一贯的模式和大致连续的交替。如亚当斯建立了政党，他掌权了 5 年，但更自由的政党接替了他，并当政了大约 10 年。由此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反应：“我们的政府是两党之间相互跳跃的游戏，一个在大约 5 年的时间里从后面跳到另一个前面，从而上台。”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家小施勒辛格发展了一种“周期性”理论，说美国历史是沿着同样路线向前走的。

亚当斯喜欢对政治和哲学进行思考，但这并没有使他冷淡他的家人和朋友，他没有减少对他们的关心。在他离任后的 5 年时间里，在他 80 多岁进入人生晚期的时候，亚当斯所认识的人都面临着死亡。阿比盖尔的好朋友，玛丽和理查德·克瑞奇，经历了病痛的折磨后去世。女儿娜布做了胸部手术，不久得了癌症也走了。本杰明·拉什死于伤寒。亚当斯的最忠诚的支持

者盖瑞在其他几个朋友去世之后也撒手西去,留下亚当斯一个人沉浸在悲伤中。现在和他同时代的人几乎都不在了。女婿威廉去世的时候,亚当斯的女儿在其身边陪伴。约翰·亚当斯和阿比盖尔比以往更孤独。阿比盖尔去世以后,家庭最后一根纽带也断裂了。阿比盖尔在 1798 年 5 月 10 日受了突然的巨大打击后就不会说话了,也不能动,在 5 月 10 日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她的儿子和外孙子都在身边。亚当斯遭受了巨大打击,在他们 25 年的婚姻生涯中,阿比盖尔一直都陪伴着他。现在她不在,亚当斯似乎也不再关心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死亡,这个可恶的掠夺者对人类如此残忍,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亚当斯悲伤地写道。

大概造物主是仁慈的,亚当斯的朋友本杰明曾推测到,造物主这样安排人的生命:让人的能力随着衰老而逐渐丧失,直到死亡来叩门的那一刻。将死的人感觉不到死亡的可怕,但是拉什的朋友杰斐逊知道,死亡对活着的人是更大的考验。他致信给亚当斯表达他的悲痛,并提起他们两个“必须在内心里为遇见朋友而欣喜,无论是爱过的还是失去的,还有我们仍爱着的和永远不会失去的。上帝保佑你,并在你极度悲伤时支撑你。”

这封信给亚当斯极大的安慰,他和杰斐逊通信将近 20 年了。几年以前,由于拉什的建议,他们开始通信。拉什是为了让两个他敬仰的政治家和解,并把分歧放在一边,减少误会。但是阿比盖尔早在她丈夫之前,就已经和杰斐逊通信了。对于阿比盖尔来说,她和杰斐逊之间没有误会,对于那些不讲道德的政治行为,她要杰斐逊做出解释,而且强调他们的通信必须保密。她要求知道为什么杰斐逊要在卡伦德和其他记者的支

持下攻击她丈夫。杰斐逊合理地解释了自己对卡伦德的经济帮助,就像“我对自己门外的那些乞讨者给予帮助一样”。尽管杰斐逊并不关心钱的用途,历史学家埃里斯和麦克拉夫得出结论说,杰斐逊否认提供给媒体金钱来与亚当斯对抗是“狡诈的”。

但是当阿比盖尔无法原谅杰斐逊时,她的丈夫却与杰斐逊开始通信往来。当两个人都面对死亡的时候,带着一种爆发的感情进行交流。但是他们的书信读起来像是永远没有结尾的辩论,尽管两个人都在寻找他们都同意的观点。亚当斯认为,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不让杰斐逊因为这些而想到别处去。杰斐逊认为人的本质是和谐的,所以他不会停止交换冲突的观点。我们一般都认为差异开始于骄傲而结束于愤怒,而对亚当斯和杰斐逊来说,他们结束于爱。

这些通信的内容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基督教精神的真与假、科学的希望、美国人对神的观念、名著的切题与离题、道义和德行的起源、法国哲学的智慧和愚蠢之处、考古发现的有用性、自由和命运之谜、平等的主张和特权的现实性、自然的和人为的贵族社会、每一代人的责任,以及杰斐逊说他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政府本身。这些话题可能引出亚当斯对杰斐逊导致的很多历史发展上的错误的责备,从他想认可的法国革命,到他想避免的**美国**内战。但是更多的时候亚当斯抑制住了自己,除了偶尔会问一下:“杰斐逊先生,你怎样看待恐怖主义?”

亚当斯与摩西·奥蒂斯·华伦及约翰·泰勒也有大量通信,这两个人都写过书称亚当斯支持贵族制,说亚当斯任由革命道义走向腐化。“腐化,夫人,”亚当斯写信给华伦说,“你为什么

这样认为,证据在哪里……这是我不能也不会接受的指控——从我在摇篮里时起一直到此刻。”没有人能回应亚当斯,甚至杰斐逊也没有。但是亚当斯和杰斐逊的通信,是有关美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在他们暮年,很多前任总统,像年老的勇士将军,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但是亚当斯의思想和著作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当我们今天阅读它们时,仍然能够感觉到它们散发出的永恒光芒。

当亚当斯 85 岁高龄时,他发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甚至拿不起一枝笔来。拉法叶来看望他,亚当斯几乎认不出这个曾经是一个起义者现在却如此衰弱的老人。但是 1800 年晚些时候,亚当斯再次关注总统竞选的发展情况时,他又恢复了活力。那一年,他儿子约翰·昆西击败了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亚当斯敬慕杰克逊这个新奥尔良战役中的英雄,东方银行家怀疑的边疆开拓者,他是汉弥尔顿的恩人,也是亚当斯的毁灭者。

亚当斯理所当然地支持他的儿子,约翰·昆西成了美国第六任总统。很快,杰斐逊致信给亚当斯,对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父亲表示祝贺。杰斐逊没有儿子,他的信很打动人,“祝福你平静地度过生命中剩余的白天和夜晚”。亚当斯高兴得哭了,他告诉杰斐逊,把约翰·昆西当成是“我们的儿子”,是所有 18 世纪那一代人的继承者。他在信中继续说道:“你的每一行字都让我精神振奋,并给我最大的快乐。我又沉浸于对那些黄金岁月的回忆,那时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像亲兄弟一样并肩战斗着。我希望不久以后,他们会说金子般的时光又回来了。”

1800 年 9 月 1 日,亚当斯变得很虚弱,他的精神有些紊乱,不久陷入昏迷状态。在这之前的一天,他被问及《独立宣言》

缘周年纪念的感想。“我会对你说，独立永远。”他回答。这就是全部，几个简单的词已经足够了。苑月 源日，亚当斯和杰斐逊，一对曾经并肩战斗，又因为政治而成为对手的朋友，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

结论 政治中的道德主义者

“1776年革命”的神话

约翰·亚当斯被看作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可以因为诚实和正直得到赞扬的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美国总统,但却是一个失败者。乔治·华盛顿的政党领导了 18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亚当斯的政党在 1796 年失败后,却再没有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在美国历史上,联邦党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它是一个没能继续存在的派别。人们想起亚当斯就会联想到失败,可能是高贵的失败,但是,那仍然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

对亚当斯否定的评价基于三点。第一,美国见证了“1776年革命”。杰斐逊在竞选中胜出,共和党为他欢呼。根据推测,国家陷入了困境,在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一种政治理想战胜了另一种政治理想。第二,通过公平的决战,杰斐逊战胜了亚当斯,弗吉尼亚获得胜利。第三点建立在上述两点之上。在 1776 年之后的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事实证明是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更好地抓住了现实的本质,并把握了历史的方向。逐渐走向衰败的联邦主义,在证明着共和主义的智慧。

这三点——第一个是建立在冲突的前提上,即不相容的两种政治理想之上。第二个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尽管杰斐

逊需要汉弥尔顿，他仍然不愿意用阴谋取胜，而宁愿公平地战斗。第三点建立在未来会证明过去的前提上，这是美国历史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这些假设使亚当斯处于落魄的境地中，没有关于他在政治上的死亡和被埋葬的记录，甚至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人调查亚当斯在政治世界里死亡的原因。我们只能接受亚当斯在 1793 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信中的讽刺话语，他说联邦党人自杀了，“自杀并杀死了国家的总统……一枪致命，然后愚昧而恶毒地指控我是杀人凶手”。谁杀了谁？研究一下发生在亚当斯身上的事情，可能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寓言，也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状况。

“1789 年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更多地启示人们要重视选举和骚动之间的区别。1789 年选举是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尽管共和党人不着要领地向法国革命致敬，并没有意识到法国革命的高度中央集权只能导致恐怖弥漫，但 1789 年选举第一次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和平转移。外部手段代替了内部手段，没有枪炮、战火、刺刀，也没有让原保罗·马拉浴室里的屠刀，这象征着理性的自由的诞生。我们应该记住，真正的社会革命现象发生在一种压迫环境下，那时除了诉诸暴力没有其他的办法。当 18 世纪的思想家详细叙述这些政权时，他们对这些政权的短暂和用血腥暴力方式推翻政府的行为感到吃惊。下面是亚当斯引用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的一段文字：

人们在恢复了自由之后，比保卫自由时更加残酷，这时发生的残酷和野蛮的行为对人类来说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人们坚持认为一些人应该被交出去，包括父亲和儿子，这些人被交到他们的敌人手中。尽管儿子还不到 15 岁，但是他

的年轻、无知、幼稚都不足以保护他,使他免受狂暴的大众的伤害。许多人在他们生前无法接近他们,在他们死了以后却用剑刺向他们。这还不够,人们还用手指和牙齿把他们的尸体撕成碎片。人们所有的感觉都被复仇情绪充斥着,在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看到他们的伤口,触摸到从他们的骨头上撕下来的肉和流出来的血后,似乎还不够,还要一起分享同样的味道和再次满足自己的感官。

当亚当斯回顾过去时,他想知道当今街上发生着什么事情。共和党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但也是野蛮的、残忍的、狡猾的,甚至病态的历史,同时也是短暂的、悲剧的、有限的和死亡的历史。在 1787 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强调了共和国的繁荣,并力图避免使之走向消亡,制宪者担心政体的思想逃脱不了枯萎的命运。1789 年以后,在 1794 年,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繁荣并且稳定地存在着,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反对党得以上台执政,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宪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联邦党人的设计加上亚当斯的保守,使宪法不需要经历革命仍能成立。杰斐逊可能相信自由的未来有赖于州的统治,但是他自己在 1794 年的胜利却依赖于代表国家的是一个整体的宪法和议院。当上总统的杰斐逊,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亚当斯留给美国的政治工具。

在更多的方面,美国的未来取决于亚当斯而不是杰斐逊。杰斐逊很自信他能使民主政体中的大多数人确信,无论他站在哪里,或代表什么,他总能代表大多数人。当杰斐逊看到人们脸上的表情时,他看到了自己。而当更痛苦的亚当斯在观察人们时,他看到的是模糊不清的东西,听到的是杂乱的声音,没有有凝聚力的民意,只有庞杂无序的大众行为,没有单独的一个人或

者机构能够代表国家。相反，杰斐逊寻求的是整体一致性，他还建议共和党人把他们彼此的争吵转移到同联邦党人的争吵上，并且把新英格兰人看作是无根的犹太人，永远的少数派。应该指出的是，在后来的通信中，亚马斯耐心地向杰斐逊解释，他为什么替犹太人“反常的性格”辩护。这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萨缪尔森所证明的那样：希伯来人的信仰是很有智慧的。但是更直接的问题是，反对杰斐逊的人都被定为少数派，即便是他所创立的州的主权学说，也假定南方是少数派，南方人是为自己的生存同北方和西方作战。在杰斐逊的时代，弗吉尼亚被看作是多数派，因为美国那时是一个农业社会。但是美国的发展使杰斐逊落后了，今天以农业为主的州代表着逐渐减少的少数人，他们只在议会中保留着权力。那些反对杰斐逊的人，都依赖于亚当斯。

如此讽刺性的转移，似乎使历史编纂工作面临着困惑。随着权力由亚当斯向杰斐逊的转移，1796年成为焦点，也使那一年更加动荡不安，也更令人感到痛苦。在总统竞选的角逐中，共和党人指控联邦党人压制自由、背叛共和。前总统亚当斯打算让他的儿子娶乔治三世的女儿，因此共和党人提醒美国人民，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突然发现，美国继承了君主制，并且再度同英国联合。联邦党人则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指控共和党人的颠覆和反叛行为。杰斐逊被指责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和没有道德的人，他把国家交给了堕落的法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被警告，如果他们投票给杰斐逊，他们的学位将被取消。在夸张的指控和诽谤中，1796年把美国的政治推进了炼狱。在就职当天，总统需要佩带宝剑，联邦党人的报纸报道说，首都被一大群带着枪和棍棒的人占领，被一群“由野蛮人领导的部落组成的混乱的群体”占

领。“他们的目的是为总统带来荣耀，”《公报》对此嘲弄道，“向他们致敬！！！！！”雅各宾派来了！

亚当斯时代和新的历史

在亚当斯执政末期，美国遇到了似非而是的论题：稳定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面对猛烈的政治情绪。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许多历史学家都不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力量，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由于恐惧和指责带来的情感和猜疑。这些给我们的暗示就是，时代的歇斯底里要比所图谋的事情还要真实，对亚当斯的指控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毕竟很多人相信这样的指控。这种看待过去的方法源自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关于过去的一些主题，比如亚当斯，在研究时参照的不是他本人的想法、他的感觉、他所写的东西或所做的事情，而是参照他怎样被描述，怎样被卡通式的可视媒体所宣传。通过研究那个时代的语言，看用什么样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去描述他。当历史学家研究亚当斯时期的政治语言时，他们看到了处处蔓延的不一致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尽力解释，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如此分裂和冲突的政治文化。

这种分裂有几个来源。在 1796 年，美国仍然固守着贵族荣誉的观念，包括决斗的传统。因此在这个时期，名誉成为被公开地侮辱和毁谤的攻击目标，对于统治方式的争论则更多是私人的而不是公开化的，这时异议已成为不忠不义的同义语。除了粗鲁的环境外，亚当斯时代的政治环境是，国外的事件远比国内的问题麻烦。而且这是一个旧的权威系统消退的时刻，君主制、特权制、贵族制都随着旧秩序一起瓦解了，但却没有新的民族统

一的表征出现。一些历史学家用后现代的概念——异类，去证明以前的殖民者如何成为可疑的人，或是与他们自身不同的人。小党派很排外，他们把其他党派看作是危险的异己者，而他们自己则服从于君主制或雅各宾派的统治。在这个方面，亚当斯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统一，建立起一种使所有的美国人都感觉到自己和别人是统一的整体感觉。

毫无疑问，美国在 18 世纪 90 年代缺少“关键中心”，暴民要用贿赂的方式才能被安抚，政治家开始遍地开花。甚至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如果杰斐逊输给了亚当斯，那么国家就会发生内战。在选举那年，各地区的共和党人组织的军事武装在森林边出现，准备和汉弥尔顿武装好了的军队作战。看起来，《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认为，不信任会使国家处于一种怀疑的平衡之中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是共和党的领导者，而不是联邦党人的总统在指责他的对手对共和原则不忠诚。为什么指责亚当斯应该对美国的道德状况负责任？汉弥尔顿认为亚当斯太不可靠，因而不应执政，杰斐逊认为亚当斯太不忠诚而不能管理国家。

在新的历史篇章即将翻开之际，我们应该回顾一下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语言及其积极的形象。阐释的困难在于，线索是那些并没发掘出来的、深藏在怀疑和指责后面的动机。亚当斯不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杰斐逊也不是激进的政治家，尽管两个人后来都被叫做“旅游同伴”——指那些认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适合外国但却不适合美国的人。埃尔金斯和麦基特里克的著作例外，他们对亚当斯时代的阐释更多地集中于对共和主义语言的解释。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斗争，就像古老的英格兰政治中“法庭”和“国家”的对抗。权力和阴谋是一方，而人民和道

德是另一方,就像“腐败的法庭和廉洁的国家”。这种解释忽视了亚当斯在《为美国宪法辩护》一书中所引用的修昔底德斯的话,它告诉我们政治语言是由语言政治决定的。当杰斐逊指责亚当斯是君主主义者并把联邦党人看作是“犹太人”时,他是在使用“矫饰的修辞”,但是他的目的何在呢?1796年竞选是第一次两党竞争的民主竞选,一方为了当政,而另一方则是为了继续执政。两者谁都不拥有舆论和一致的讲台,相反他们却夸大了彼此的对立。一旦选举结束了,胜利的一方就会促使国家忘记过去的争议,开始声称自己是统一的,并说我们是一体的,是相同的——包括“所有的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

如果美国真的见证了“1796年革命”,人们可能会听到反对革命的抱怨,至少会听到反对派的声音。相反,联邦党人看到,共和党人成了舆论的复制品。亚当斯使财政有了结余,杰斐逊也兑现了削减支出和税收、废除军队的私用制度、削弱司法部的权力的承诺。但是,银行系统原样没变,政府的权威提高了,甚至超过了亚当斯在位时期。这主要是因为杰斐逊成功地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并在新英格兰实施禁运,使美国实现了拥有绝对权力的民族国家的梦想。这些使年老的、纯粹的共和党人约翰·泰勒·卡洛林感到绝望。在美国历史上,这不是唯一一次执政党依靠它曾经反对的政策取得胜利。

回顾过去,在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之间的竞争是如此的痛苦和紧张,不是因为时代立场不同而产生了分歧,而是因为他们隐藏了每个党派都在追求的东西——权力、统制和控制的满意程度、怎样免于不安和怀疑等。但是怀疑所告诉我们的比怀疑本身还要多。杰斐逊不相信亚当斯,因为他确信亚当斯是个君主主义者。他宣称,这样的证据能在亚当斯自己的著作中找到,

那是一本对所有人都公开的书。在 1786 年 7 月 16 日的信中，亚当斯直接向杰斐逊证明自己的清白：

实际上，我的《为美国宪法辩护》和《关于达维拉的谈话》是不受大家欢迎的原因。而你对民主原则的捍卫，和你对法国革命一贯的支持，是你无限受欢迎的原因。这等于光荣的通行证。

现在，如果你能在《为美国宪法辩护》和《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找到一点支持在美国实行君主制或者贵族政治的痕迹，我就会惩罚我自己。我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支持和巩固美国宪法。

杰斐逊拒绝接受亚当斯的挑战。为什么不拒绝呢？反正对亚当斯的伤害已经形成了。事实上，亚当斯为了保护宪法，提供给美国的不是绝对君主主义信条，而是政治制式主义的学说，“政府机器”及它的监督和控制。但是如果耻辱能够击败教义的话，亚当斯的命运也会证明曲解能够战胜学说。

约翰·亚当斯经常被称为“权威哲学家”，而杰斐逊则被叫做“自由倡导者”。但是在 1796 年选举中，这样的概念却模糊了，不仅因为当杰斐逊成为总统时他行使了更多的权威，而且因为他对自由的热情使他对自身能力权限范围之外的任何权力都表示怀疑。波特兰·鲁塞尔观察到，“人们渴望被统治，但是又害怕这种不公正的统治会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对于那些寻求统治权的人来说，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并没有被人发觉。杰斐逊害怕这个为“英格兰的娼妓”而丢了魂的变节的总统。他反复警告共和国要提防共和国的君主制化，说亚当斯已经被王位“荣耀

的光芒’蒙蔽了眼睛。同时,汉弥尔顿知道亚当斯不是君主主义者,他比君主主义者还要糟——亚当斯的软弱将会使美国政府遭到颠覆。他认为,亚当斯是一个没有野心的总统,对和平比对战争更感兴趣;对于反叛者,亚当斯更倾向于原谅而不是惩罚。在美国历史上,恐惧、怀疑、指控的政治根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90 年代的弗吉尼亚所发生的事件。当时反对派的政治言词没有规则可循,其言论也没有现实基础。回顾过去,在约瑟·麦卡锡图谋不轨的时刻,在汉弥尔顿作为联邦党的第五纵队成员(指内奸),支持共和党去反对自己政党的领导人继续连任总统的时刻,美国历史出现了骚动。

杰斐逊不能回答亚当斯问题的原因

亚当斯和杰斐逊的观点需要仔细的研究。除了林肯、麦迪逊、约翰·昆西·亚当斯、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亚当斯和杰斐逊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有思想的”总统,是很少几个努力使美国更好地理解自己及它与世界关系的总统。尽管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大量通信充满着兄弟般的情谊,但是他们都在面临着生命消失的威胁,这些数量极多的通信像他们的生命一样,充满着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的分歧一直存在着,美国要回答的问题就如我们现在被问到的两个问题:我们应该相信人民还是相信制度?美国是处在冲突中还是处于一致和谐的状态中?

美国真的需要亚当斯的机械的和控制的政府机制吗?杰斐逊是否真的看到了亚当斯没有考虑到的事情:宪法没有必要去控制民主,因为人民自身对自由和所有权不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美国真的存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由各社会阶层构成的阶级的现象，正如阿列西斯·托克威尔后来所指出的，“混合政府”的思想就不能起作用。实际上，亚当斯设想的宪法，即参议院代表富裕的少数，而众议院代表多数，在国家没有消除阶级分化的情况下，这种宪法形式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的迹象。亚当斯希望行政部门的独立，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这又是不现实的，他担心美国的政治会被“贪婪的道德腐化所影响”。

亚当斯和杰斐逊最害怕的就是腐败，他们一个认为腐败是由金钱和贪欲所萌生出来的，另一个则认为腐败是由君主制和贵族制所引发的。对于杰斐逊来说，人民自身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因此他告诉亚当斯，罗马共和国被“腐败的恶习和唯利是图所浸泡着”，因为腐化的参议院使道德和自由的复归成为了遥不可及的事情。对于亚当斯，他认为一旦一个政府开始面对未来并开始现代化，它似乎就不可能再恢复公民的道德，古典的传统也不会再回到它最初的原则上去。“你能告诉我怎样阻止财富对节制和勤勉产生影响吗？”亚当斯在 1788 年曾经这样问过杰斐逊，“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阻止财富导致的奢侈吗？你能告诉我怎样防止奢侈带来的优柔寡断和夸张的恶习，以及过度的愚蠢吗？”

杰斐逊没有回答亚当斯，因为他的目光锁定在旧世界的制度上。那时的美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把过时的制度统统抛在身后。杰斐逊可能是不得不面对未来，但是他的恐惧却植根于过去。亚当斯恰恰相反，他害怕的是未来。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民主的大多数人将会在财富上与上流阶级匹敌，消费的文明也会赶上共和的文明。在传统的美国历史记述中，杰斐逊对亚当斯的胜利被看作是自由潮流的前行，是民主制度对

贵族制度的胜利。但是亚当斯怀疑,人类本质的变化也会像政治更迭一样频繁。他对经济行为的洞察力,预示了后现代思想家对我们的警告:民主制有勇气承担来自方方面面的嫉妒,并且也把金钱撒向王位。

杰斐逊没有回答亚当斯的问题,也因为他自己酷爱奢华。作为一个欲望很强的消费者,他负债很多,并且憎恨银行。法国人特别提到他急切地想购买路易斯安那,他的眼睛还盯着加拿大,这使法国人把美国总统看成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贵族。杰斐逊、潘恩和其他的共和党人拥护法国革命,认为这是君主制的覆灭,但是他们却对到处充斥着金钱的新生活没有丝毫的不适。正如埃德蒙·巴尔克指出的那样,革命没收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使法国成了一个巨大的赌场。在这里,所有投机者和赌博者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这里每个靠运气和机会生存的人的“激情、冲动、怀疑”都得到了很好的宣泄。今天,美国人终于忍不住诱惑参与了进去。他们在股市投资,当输光最后一枚硬币时,也会吵嚷着说这是血腥的谋杀。没有财产的自由,值得称道吗?君主制的破产使金钱都流向令人喜悦的民主制政府,当杰斐逊在经过努力后终于买回了他的声望和信誉时,亚当斯则省下了他口袋里的每一个便士。

但是,无论亚当斯怎样多次地阐述他的世界观理论,他也没有能够赢得胜利,因为《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使人们认为他对财产有着强烈的热望。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是维护财产的贵族,而实际上亚当斯是道德主义者,他恰恰是在警告着人们不要那样做。过多的财富无法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而且是罪恶的象征。

但是当理解了美国人的个性之后,有人站出来反对对亚当斯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那样严格的限制。亚当斯看到了财富和职

业没有关系,这种看法后来被叫做“清教徒的个人道德准绳”。结果他看到,在他设计的用来平衡权力的政治结构下,并没有产生尊重财产的道德情感。联邦党人和亚当斯都更相信宪法对于控制冲突是很必要的,但是使这个系统运作起来的却是整个国家关于劳动与财产关系的普遍认同。美国人民都相信,只有艰苦朴素才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这样的心理状态构成了美国早期殖民主义的基础。因此,亚当斯在早期美国的历史上不恰当地欣赏着新教徒的个人道德准绳时,他就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的思想家所预言的事情:由于理性被权力和贪欲所驱逐,旧道德渐渐衰退了。这是自然法则的一个方面,就如同18世纪人们的世界观一样,它仅仅是人们尽一切可能期望和寻求的东西。

这也是后来的西奥多·罗斯福所面对的形势。罗斯福意识到,美国需要宣布国家的权威,以对抗那些拥有财富的恶人的权力意志,尽管他不得不用汉弥尔顿的方法去对付汉弥尔顿的支持者。完成亚当斯心愿的罗斯福总统是个国家主义者,他攻击杰斐逊的美国应该拥有无海军的外事政策的思想,赞成亚当斯的关于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的观点。罗斯福对于权贵阶级给予了同样的蔑视,因为他们给美国带来的更多的是优柔寡断和奢侈的毒瘤。

然而,当我们考虑到亚当斯和杰斐逊热切地相信美国有责任帮助其他国家时,我们遭遇了讽刺。亚当斯坚持说,历史的教训是应该设计一种政治体制去解决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冲突。杰斐逊则认为,历史的教训是应当把美国革命当作摆脱压制和专制统治的方法。为什么美国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去控制旧世界的阶级体系呢?为什么《独立宣言》也适用于那些在被占有之前并不拥有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国家呢?亚当斯错误地认为欧

洲是美国的根基,而杰斐逊也错误地认为可以把美国人的想法运用于欧洲,运用于那些绕过了封建主义和没有古代政权的缺少了特殊条件的国家。

当拉法叶告诉杰斐逊,他认为法国遵从亚当斯的想法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是明智的,《独立宣言》的撰写人回击道:“我反对起源于对自由权之爱的民主。”法国人在疑惑:自由权不是自由的根源吗?对杰斐逊来说,不是这样。他认为,民主所意味的不只是自由基础上的机构,也不是通过监督和平衡才能长久存在的体制。民主必须是直接的、自发的,没有体制的调节、直接来自于人民。而在亚当斯看来,这样的民主是不切实际的。

依靠普通大众或者是依靠机制平衡,亚当斯和杰斐逊对为自由而斗争的其他世界的人民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因为美国革命在历史上是所有阶级联合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我们的第二任和第三任总统都没能更好地理解独立、自由和平等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从亚当斯和杰斐逊的时代起,美国即在努力处理好社会冲突,但是美国对革命感到很困惑,因为不管法国、俄国、古巴,还是越南,都没有遵从美国的模式。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曾意识到,美国的舆论对于革命是空前一致的,那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西,也是一个政治奇迹,因此,其他国家无法简单地复制或引入其革命模式。

亚当斯相信,冲突不是来自于阶级体系,而是来自于人的本性和对于被承认的渴望,愤怒的冲动使人们陷于竞争之中。为什么亚当斯不能把他对社会理论的洞察力应用到美国的政治上呢?在《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他提醒人们,政治和社会关系依赖于表述、印象、形象、任何形成公众观点的意见,不管它是促进

还是毁坏名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第一个认识到媒体在形成观点上的力量。在 1789 年初，汉弥尔顿在《卡特拉斯》一文中领教了杰斐逊的政治技巧，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在报纸上的。在亚当斯为管理好政府而努力时，汉弥尔顿和杰斐逊都在阴谋反对他。最终，在建立银行、审判制度、军队和国家权威问题上，杰斐逊与亚当斯争吵的时间比亚当斯与汉弥尔顿争吵的时间要短。然而，杰斐逊不是不会回答，而是不能回答亚当斯在证明自己不是在把国家引向君主制和贵族制问题上提出的挑战。当发生在巴黎的事件证明了亚当斯的智慧后，杰斐逊几乎不能再继续对亚当斯的指责——杰斐逊曾说亚当斯对法国革命的怀疑将导致美国人民对总统的怀疑。然而共和党作为反对党，汉弥尔顿作为亚当斯的联邦党内的奸细，他们的指责毁了亚当斯，使亚当斯在第二次总统选举中落选。当政治变得污秽时，任何事情都不再是公平的了。

亚当斯卸任前的骄傲

是什么样的印象增加了共和党人的利益？是由于在 1796 年大选中获胜而使共和党人的政治观点开始流行，联邦党人的观点则进入了黄昏末路吗？实际上到 1794 年，在 1789 年的战争结论基础上，杰斐逊主义从世界上消失了。学者盖瑞在他的著作中，很准确地概括了杰斐逊的继任者麦迪逊的情况。美国在战争中胜利了，

但是共和党的政策真的胜利了吗？如果反对中心化、联邦的权力、国家主义是他们关键，那么不妨借用约翰·

伦道夫的说法：他们赢了，却丢失了自己的灵魂。杰斐逊所反对的国家银行、国债、海军、常备陆军、美国制造业、在世界权力中的角色、军事荣耀、扩张的对外政策、宪法的松散建设，以及对联邦政府的归属等问题，都在战后一一浮出水面。

当威尔斯看到拥护杰斐逊的共和主义者失去了历史力量时，他也看到了联邦党人对美国没有什么要求，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内战滋长了过度的国家主义，然而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则相反，他们成为掌握州权力的政党，他们反对杰斐逊的禁止航运贸易的政策，因此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了反对当前历史的立场上。第二，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是，美国欢迎现代化也欢迎国家主义，而联邦党人固守旧世界的传统和宗教等级制度，不去寻求技术和贤能统治的新世界。

国家主义和现代化无论哪一个范畴都不能单独用于亚当斯，因为他对两者都欢迎。与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不同，亚当斯在哈特福特的政党提名大会上反对分裂主义，他支持杰斐逊、麦迪逊和美国内战。作为前总统，亚当斯主张斋戒几日。他曾经一语双关地说，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应该去“吸鸦片”。但是他的非宗教的和现代的观点实在是后现代的，在他的观念中，政治不能依赖哲学、宗教或者道德。政府不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而是一种制度结构，权力在这里接受猜疑心理的检验。亚当斯关于权力实质的思想，和尼采、尼布尔所说的无情的现实性相似。在《关于革命》一书中，汉纳·阿德特表达了对亚当斯的崇拜。她认为亚当斯是 18 世纪少有的一位思想家，他看到自由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自由在宪法中被限定了，它就像无根的花一样

枯萎了。“为什么权力增长了？”亚当斯问道，现代主义者尼采和尼布尔同样怀疑理性的作用，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把权力看作是影响的总和，或者被个人的意志力呼唤而来，或者由政府机构控制。亚当斯在 1789 年说了和林肯在 1862 年同样的话：宪法对于保护人民是非常必要的，它被用来对抗人民最坏的敌人——也就是人民自己。

怎样看待 18 世纪亚当斯的思想，在今天仍有争议。在学术领域信奉杜威哲学的人声称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人民，而在于精英。华尔德·李普曼的拥护者则认为，我们的问题不是专家而是大众。两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徘徊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反对杰斐逊时，亚当斯说问题在于少数人，而反对汉弥尔顿时，亚当斯认为问题在于多数人。对两种人都要警惕，亚当斯的《为美国宪法辩护》就是同时针对两个阶级的。

令人悲哀的讽刺在于，多数和少数两者——即汉弥尔顿和杰斐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亚当斯。在 1796 年大选中，为了把亚当斯从执政位置上驱逐下去，美国的政治良心已经消失殆尽，从而使美国走向罪孽的深渊。大选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你能为自己做什么，而且还要显得合理而恰当。亚当斯写道，我们奉承我们自己说，我们的目的是纯洁的，然而实际上却是罪恶的。我们把罪恶的动机放到别人身上，并且接受了“言词对抗证据”——在这个世界里，那些欺骗我们的人正是“那些喜欢欺骗自己的人”。

后来，有人指责亚当斯，说他有关于“君主制的邪恶的动机”。亚当斯要他们拿出证据，但他没有意识到亨利·亚当斯曾说的话 政治没有时间去寻求事实。很多反对亚当斯的人都接受了“言词对抗证据”，当他们放弃了道德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他

们却认为自己是在使美国摆脱君主制。亚当斯是尼采所说的“非道德社会中的一个道德主义者”的案例，他相信荣誉支撑着理想，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政府机构”的想法并不需要这些。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是倾向于罪恶的，他还确信总统不能把理想作为行动的动机。因此，他怀疑能否在人民的身上找到他一直要求自己要具有的政治品性。

带着怀疑的态度，亚当斯批评了古典共和制的概念，尤其是马基雅维利。当马基雅维利向市民们灌输关于爱国主义的“虚伪的陈词滥调”之时，他既欺骗自己，也欺骗了佛罗伦萨的市民。这就像杰斐逊用赞扬人民具有真诚的高尚品德的方式，来安抚美国人民的自尊心一样。马基雅维利不是说出真相、谴责丑恶，而是讨亲王的欢愉，迎合人民的意愿。杰斐逊颂扬了大众的辨别能力，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社会”，他认为应该听任大众自治，而政府自身只需要使社会环境处在和谐的状态中。

亚当斯总统一直在设法让美国人民知道政府的重要性。然而亚当斯相信，如果政府机构运转协调，它的管理和政治运营就不会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带着这种假设，我们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作为总统，这一局限性是亚当斯失败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亚当斯相信，马基雅维利并不知道为什么共和政体一直难以存在，他同时也相信，如果美国的共和制度会存在的话，杰斐逊也不会明白为何政府是必要的。也许意大利哲学家本来能够教会美国总统怎样处理好当今时代的争议，从而获得在任职岗位上的成功：一个精明的政治领袖，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应该总是征求建议，而且应该是一个“出众的调查人”和“耐心的听众”，避免出现拒绝与他人交流的行为。

自傲的过失使亚当斯在执政期间犯了很多错误，当他作决定的时候，他很少让别人知道他的想法。他很喜欢单独行动，也很少采纳别人的意见。在公众知道了他要派使团去法国时，他的决定成了最有争议的事情。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最强硬的总统之一。由于他醉心于诗歌和哲学，他的思想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而这一点在政治领域里对一个总统来说是毁灭性的。亚当斯在学术领域是成功的，他写出了伟大的著作，总结了过去的教训。然而，政治立足于现实，存在于交易、曲解、策略和机智中。对一个思想家来说，采取什么措施来处理突发事件几乎和管理人民时怎样分析权力的运作一样不具有吸引力。亚当斯没有去消除怨恨，而是默默忍受了怨恨。“一个人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他就该忽视自己所受的侮辱。”亚当斯对国家的热爱，并没能帮助他战胜杰斐逊和汉弥尔顿的攻击。这些攻击更多地伤害了阿比盖尔。最糟糕的两件事情是，亚当斯既没有像政治家一样行动，也没有像商人一样行动，既没有因为考虑到下次竞选而取悦于他的政党，也没有屈尊对公众兜售他自己和他的政策。

亚当斯能敏锐地感知社会心理，这使他能够很容易地控制舆论、获得声望，成功地与对手进行斗争。他本来能够摆脱诽谤，并去怀疑他的对手。曾有传言说他的对手有一个十几岁的黑人情妇，而且还鞭打他的奴隶，宣称美国的制宪者和种植园奴隶主是“上帝的选民”。亚当斯是个道德主义者，他不会为了自己的成功，去做那些别人看起来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情。他又是个现代主义者，他无法作出容易的道德判断，并宣称自己了解上帝的意愿。

因此，一个看重政府而憎恨政治的人，输给了一个憎恨政府却又愿意屈尊于政治的人。亚当斯声称他蔑视对手的行为，如

果那意味着加入政治党派,他宁愿选择不去天堂。杰斐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清除不存在的幻想体制的人,亚当斯则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施不存在的荣誉道德的人。胜利者声称他成功地挽救了我们,使我们免于滑向君主制的泥潭。失败者则说他尽力使我们免于沦为乞丐。卷入政治中的杰斐逊,热情高昂地否定政治和政治党派,即使他使用政党和媒体去与亚当斯总统对抗,他新形成的共和党是“一个结束多党政治的政党”,一个国家的政治努力就是使共和接近他对“全体一致的探求”。

如果说全体一致是可能的,政治就会消失,政府也会从舆论一致的云层中消散掉了。但是亚当斯对于历史的敏锐感知能力使他相信,冲突曾经存在而且将来也会存在,政府的目的是要控制它。一个政治中的清教徒,亚当斯,他把政府行政部门看成是承担责任的部门,正如哈利·杜鲁门提出的那样:这个部门是“责无旁贷”的。亚当斯由于从内心深处拒绝支持民主而犯下了政治错误,他遭受了批评。然而亚当斯并不指望民主提供善恶是非观念。确实,在 1789 年之后,政治已经失去了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因此,在政治选举中,理论与实践并无多大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当政后,去兑现他在竞选过程中所许下的诺言。随着美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力量的增长,政府把事实和道德意识抛在脑后,踏上了权力和私利之路。它在公众舆论后面跑,对它毕恭毕敬,成为托克维尔所称的“看重结果而不是原则的政党”。爱默生简单地称之为的“巧妙的”公民政治文明,是一种欺骗的政治和灵活的管理形象——亚当斯在《关于达维拉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了。但是在亚当斯执政期间,他的责任也在于此。在美国短暂的历史插曲中,关于真理的思考使混乱的政治丧失了体面。

大事记

1780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布伦特里 (后来改称昆西)。

1798 毕业于哈佛大学。

1800 加入波士顿律师事务所。

1804 娶阿比盖尔为妻。

1805 写下《论教规与封建法规》。

1806 波士顿屠杀事件,为普雷斯科特上尉辩护。

1807 被选为大陆会议的成员,写下《诺文格拉斯》。

1808 为了回应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写了《关于政府的思考》。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

1810 成为派往巴黎的使团的一员。

1811 驻荷兰大使。

1812 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

1813 在伦敦与阿比盖尔及女儿重聚,同一年返回巴黎。

1814 在伦敦格罗维诺广场安家,作为公使去圣·詹姆斯法庭。

1815 女儿嫁给威廉·史密斯上校。

开始写作《为美国宪法辩护》。

1816 1817 马萨诸塞州的谢斯起义。

《为美国宪法辩护》第一卷在纽约和费城出版
(后两卷在 1818 年出版)。

1780 返回马萨诸塞。

被选举为副总统。

1786 出版《关于达维拉的谈话》。

托马斯·杰斐逊攻击托马斯·潘恩的《人类的权力》。

报纸战在费城开始。

1789 再次当选为副总统。

1790 威士忌叛乱。

华盛顿派约翰·昆西·亚当斯部长去海牙。

1792 当选总统。

1793 杰斐逊 载再在事件。

1794 颁布《外侨管制法》和《惩治叛乱法》。

1795 弗莱斯叛乱。

拿破仑在法国掌权。

1800 在总统大选中输给杰斐逊。

儿子查理斯去世。

1801 与法国签订《和平协定》。

返回昆西。

1802 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

1803 麦迪逊当选总统。

1804 美国向英国宣战。

1805 开始与杰斐逊通信。

1806 女儿娜布去世，对约翰·泰勒写的《问题》作出答复。

1807 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

1808 詹姆斯·门罗当选总统。

美国 妻子阿比盖尔去世。

美国 约翰·昆西·亚当斯发表《门罗宣言》。

美国 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总统。

美国 去世。